新建設

第二卷 第五期

（總第十七期）

HOOVER LIBRARY

關於學習及寫社會發展史的幾個重要問題　徐特立
魏晉思想之歷史背景與階級根源　侯外廬
當今年畫與我國古畫人物之比較　徐悲鴻
東北雜詠　沈鈞儒
秧歌的歷史　張其春譯
談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　芮沐
馬恩列斯論婚姻和家庭　吳家麟輯
蘇聯對國際公法的偉大貢獻　薛謀洪
怎樣認識工商業稅（續）　崔敬伯
中蘇經濟合作與石油開發　王乃昌
中國漁業的發展　鄒文衡
黔苗的生活　張頌甲

新建設雜誌社發行

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三日出版

○、○○○畝，爭取當年受益七○、○○○畝。

羣衆性的水利建設，察南專區淤灌及當年受益畝數爲一二五、○○○畝，匯北專區爲一二○、○○○畝，察北專區爲五、○○○畝。總計三長區共爲二五○、○○○畝。

淤灌護地工程共計爲四○．○○○畝

鑿井及控裝水車計劃：察南專區鑿井一．○○○眼，匯北專區四五○眼。察北五○眼，共鑿井一五○○眼。察南專區按裝水車一、五○○架，雁北專區五○○架，共計按準水車二、○○○架，兩者共可淤灌井當年產益四○、○○○畝。

總計察省今年水利建設工程約爲一六○萬畝，當年產益七○萬畝。

未來察北水利問題

察北去年只崇禮、尙義、商都開新渠十一道，澆地四九六七畝，恢復與擴大舊渠八十七道，澆地四七七一畝，兩者總計渠九十八道，澆地九七三八畝。今年察北也還只能在萬全、尙義、商都舉辦一些小型的水利工程，投資數也只五○萬斤小米，因爲按輕重、緩急來衡量，察北水利問題仍應列入未來的工作程序之內。

筆者此次曾去察北一行，在當地和張家口都曾與幾位學農的朋友和水利工作負責人有過接觸，粗略的了解到察北的情形是這樣的：察北八縣耕地面積約六百萬畝，人口不到七十萬。地廣人稀，每人平均土地將及十畝，只是地勢高在海拔一千公尺至一千五百公尺之間，距海岸線較遠，氣候變差大，無主要河流，地下水位高達二至三點五公尺，通常一下雨就成了澇災，去年便淹壞了莊稼不少，因之排水是將來發展農業生產的重要問題。開溝渠，築水庫，防護林帶的種植等工作是必不可少的。蘇聯曾用這些科學方法改變了自然，提高了農作物收穫量，這便是我們一條明路。

察北目前只一條閃電河，據說，在洪水期河身也不太大，枯水期流量更小，可以一躍而過，可能變形成河流的年限並不太久。將來是否可以以閃電河爲基礎來開展察北的水利建設事業，是須經過詳密調查和仔細研究的。另外，察北湖泊很多，是否有助於「人工湖」「人工河流」設計參考與實際運用，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依靠群衆、訓練幹部、克服困難

回過頭來，再談一談察省水利工作這一艱巨任務，去年是如何完成，今年如何進行的？

一句話、把水利工作變成羣衆性的工作，順應羣衆的要求，相信羣衆，依靠羣衆，加以分析研究，有領導的說服動員與提高羣衆覺悟，造成廣泛的羣衆興修水利的熱潮。

水利人才在中國是很缺乏的，察省缺乏的程度更不難想知，但是不能等把專家培植出來了才去興修水利，於是只有在工作中大量的培植土專家，土專家也只有在實際的工作中才能培植得出來，他們——現在已有將近八十人了——雖然在學理上有很多缺欠，但在實際工作經驗與理論和實際結合一點上却做得十分踏實的。目前的小型水利便是他們接受實際教育的地方，而且成績都很好。

察省水利工作者是那麼樸實，負責的在執行他們職門般的任務。目前工作中最大的困難是察境諸水的水文，流量記載及其他有關材料絲毫沒有，像一位大夫看不到病人的病案，甚至x光或聽診器等醫療器材也不完備，只好自己埋頭下工夫，從實踐中去找尋經驗。但是，不管工作怎麼樣困難，他們是樂觀且具有信心的，他們欣喜於自己獲得這個「爲人民服務」，爲人類幸福和自然鬥爭的機會。

本刊第一卷合訂本出版

本刊第一卷合訂本，現已出版，內容計包括：人民政協・人民憲章（十篇），工運（五篇），國際（十四篇），財經（二十三篇），學術（十篇），政法（八篇），文藝（八篇），蘇於蘇聯（九篇），政法（八篇），文敎（十五篇），史料・史學（五篇），通訊・報導（四十五篇），每本定價人民幣二萬四千元，書訂無多，購請從速。

新建設 雙周刊

第二卷・第四期

負責人　費　青

編輯委員（以姓氏筆劃爲序）

向　達　吳　晗　李廣田　袁翰青　張志讓　費　青　費孝通　聞家駟　雷潔瓊　鄭　昕　樊　弘　潘靜遠　錢偉長　錢端升　嚴景耀

董　事　王艮仲　費振東　潘祖丞

出版者　新建設雜誌社

地址：北京東華門南夾道六十二號

電話：（五）五九六六

上海辦事處：

上海（五）乍浦路景林廬十四號

電話：四○六九六

代銷處　各地新華書店・聯營書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訂閱：本期定價每冊三千元

三個月六期　一萬六千元

半年十二期　三萬二千元

全年廿四期　六　萬　元

東北區　零售每冊東北幣三萬元

訂閱：

三個月六期　東北幣十六萬元

半年十二期　東北幣三十二萬元

全年廿四期　東北幣六十萬元

東北代訂處　東北各地新華書店

北京市軍管會登記證新字第五十號

華北郵政總局登記證第七十二號

華北郵政總局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在歷史上，社會劃分階級，應當做爲一個共本事實。永遠明白瞭解。幾千年來，毫無例外，在一切國家中社會的發展，都顯示出發展的一般性」。（見論國家）那末，一切不同的民族史或國別史都可作人類通史某一階段共同的社會形式發展史。所以寫社會發展史，它的內容仍然是民族史、國別史，例如：寫氏族社會，離開了美洲、澳洲的土著民族，就不能有典型的氏族社會。又如奴隸社會，在巴比倫、埃及、希臘、羅馬等都曾經經過這樣的社會發展階段。但是典型的還是古羅馬，因爲古羅馬經過三個發展的階段，最初是奴隸王國，其次是奴隸共和國，最後是奴隸帝國。它在人類歷史上是一個典型的奴隸社會。至于封建社會，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只有一個黑暗時代的發展，不及中國有一千年以上的貴族式的地方分權的封建，同時還有二千餘年的中央集權無貴族式的封建。它有它的黑暗時代，如西周末，詩經所載的民不聊生之行役諸詩及描寫人民逃亡的碩鼠諸詩。相反的方面，也有它的光明時代，如春秋戰國時代經濟、文化、政治、軍事等均有劃時代的發展。不像歐洲中世紀統稱爲黑暗時代，所以中國的封建可當作人類史上典型的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它開始於歐洲，而德國一直到第一次大戰後才廢除了封建殘餘的地方王侯，只有英、法是典型的發展。在經濟上英國經過手工作坊、手工工場、大機械工廠，如果寫產業革命只有英國是典型的。寫政治革命只有法國大革命是典型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形式，蘇聯是唯一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形式，只有中國，因爲新民主主義這種過渡的複雜性、產生的長期性，超過歐洲新民主主義國家。因此，要找新民主主義這一階級的過渡形式中國是典型的。同時我們不要否定那非典型的重要意義，因爲不平衡的畸形的發展，正是辯證的發展，是一般中的特殊性，這在人類史和自然史都存在着的。這種畸型的東西跟典型的東西結合寫來，才能眞正表現社會形式辯證的發展。

如每一個國家當要寫自己的國別史時，必須了解人類一般的發展，才能得到歷史共同的規律，這個共同的規律就是歷史的科學性。每一個國家國別史的性質是不會離開共同規律的。但這個發展不平衡性由于個別國家、個別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特點，這就是所謂民族性。研究歷史是要把民族性和科學性結合起來。社會發展史必須和國別史聯系起來。

社會發展史如果使他民族化，就要根據它來整理民族的史料，這同時也就是社會發展史，如果不着重採取自己民族的史料，這種社會發展史就不能夠看出民族的特點，民族的血肉關係。但是任何民族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都不是直綫的進行，一方面常受外來民族的影響，而起跳躍作用，如中國還沒有成爲資本主義，現在就已經向社會主義邁進，因爲它受到十月革命的影響。這是一個。另外，發展時期的長短問題，并不是任何國家任何民族都是一致的。有後來居上，有時代落伍，這也是一個歷史曲線發展的規律。例如：歐洲資本主義，它直接承繼的文化，不是中世紀的，它的自然科學，是希臘的文藝復興，它的政治法律，是繼續奴隸社會羅馬的。羅馬落了伍，地中海的文化，自己沒有繼承發展，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是地中海，而是大西洋，大西洋諸國變成了後來居上。以上的這些特點，并不否定社會發展之一般，不過更使一般的發展，添了些新的花樣。因此，寫社會發展史，離開具體國家，具體民族，不獨是不能寫出特點，反而會寫成一個非科學的（因爲科學都是具體的）非辯證的無生氣的歷史。

又如果某一個國家寫他們的國別史，還應該採用其他國家典型的發展，補本國歷史所沒有經過的階段。當作發展不平衡的這些民族史做參考，發展平衡的民族也可以做補充，或當作發展不充分的非典型的階段。

過去的歷史，無論是通史、斷化史、國別史，無論是典型的或非典型的發展都是社會發展的記錄。但不能稱之爲科學性的發展史，只有經過唯物史觀的方法來寫的歷史，才算是科學的社會發展史。過去寫歷史的人們其目的在從歷史中取得教訓、取得行動的範例，而不是找歷史發展的時代性，這是主觀要求的歷史而不是客觀必然性的歷史。

四、關於唯物史觀和社會發展史的補充

唯物史觀及社會發展史，這是無產階級的科學。資產階級社會以前的任何階級，都沒有這樣的歷史的科學。但關于唯物史觀和社會發展史他們有直覺的片斷的這樣的觀點，這是在馬克思寫唯物史觀以前的歷史文件中，可以找到，如關于上層建築的思想問題被經濟決定，管子曾說：「倉廩實而後知禮節，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孟子說過：「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同時在今天極大多數的人談到國家社會問題，也常常暴露唯物史觀的點滴。但是他們是直覺的唯物的社會觀，而不是歷史的唯物觀。這個觀點沒有反映到歷史上去，也沒有能認識到這是解決社會科學的問題。如：我們中央來京時，市民有如下的反映，基本上都是談到政治和經濟的相互關係。有的認爲要解決經濟問題，才能解決政治問題，如「物價要下落，社會秩序才能安定」，有的認爲要解決政治問題，才能解決經濟問題，如「保護工商業，使藏金變爲生產基金」。這種對待政治和經經的相互關係，如果用在歷史上來看問題，就變成了唯物史觀。但祇反映一時政治和經濟的關係，這僅僅是唯物主義在一定時期的反映，而不是拿歷史來看問題，這種經濟基礎的社會觀，任何時代都存在着，但變成歷史發展觀，這是無產階級唯一的學說。

對于社會發展史的片斷，見之于周秦諸子者，如商子上說：「上世親親（是血緣社會），中世上賢（正如希臘的英雄時代），下世貴貴（正是封建的貴族制）」又如禮運分大同，小康，所謂大同，就是「貨不藏于己，力不爲已，」這是表示原始共產社會的共同財產共同勞動。至于小康，是「貨利爲已，世及爲禮」前者是說明財產私有，後者是說明財產繼承權。又說「以正君臣，以篤父子」，這就表現君權產生與父權產生。總起來說，私有財產產生，就有父權制的家庭產生，及以君爲主的國家產生。以上所指的材料，都是二千年以前的東西，可能他們直接看到這種社會存在以及從舊的今天不存在的著述中如世本，在唐人作六經之疏，還引用世本，司馬遷作史記，世本也就是他的藍本。那麼，禮記及周秦諸子所根據的藍本，當然比世本更要多，這種社會發展，當然不是憑空來的。中國舊有的著述，我們也不可忽視。

本刊第一卷合訂本出版

本刊第一卷合訂本，現已出版，內容計包括：人民政協・人民憲章（十篇），工運（五篇），國際（十四篇），財經（二十三篇），學術（十篇），文藝（八篇），關於蘇聯（九篇），政法（八篇），文教（十五篇），史料・史學（五篇），通訊・報導（四十五篇），每本定價人民幣二萬四千元，書訂無多，購請從速。

9200
0210.10

關於學習及寫社會發展史的幾個重要問題

特立

一、爲什麼要學歷史

不學歷史，或學了歷史，而不用歷史觀去對待社會問題，就要犯嚴重的錯誤。甚至做反革命的俘虜和應聲虫。譬如對野蠻民族和對文明民族，就有兩種相反的看法。一種是歷史的看問題，認爲野蠻民族是人類歷史最初發展的一個必經階段，野蠻社會雖尚未進到文明，并不是不能進到文明社會。人類的歷史發展是從野蠻進到文明，野蠻是文明的前身，文明社會是繼承野蠻社會的遺產。沒有野蠻社會的遺產，就沒有文明社會。恩格斯說，沒有奴隸社會，就沒有資本主義，也就沒有近代的社會主義。這就叫做歷史的看問題，承認野蠻文明在不同的社會階段上各自起了自己的歷史偉大作用。此外，還有一種非歷史的看問題，把野蠻文明不認爲是歷史發展的階段，而認爲是人種特點，民族特點，文明與野蠻，似乎是天生的，永遠不會變化的，這是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民族優秀論，以便利它有理由的侵略政策。野蠻民族和文明民族同時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原因是由于各個民族發展的不平衡，有後來居上，和有時代落伍，如中國的封建約三千年，還沒有成爲資本主義，做了時代落伍者。但現在就已經向社會主義邁進，典型的新民主主義，已經是社會主義的預備階段。對充分發展了英美的資本主義不能進到社會主義，中國是後來居上。由於歷史發展不平衡性，因之，在近代資本主義時代，就同時存在着澳洲的野蠻民族，美洲的半開化的印第安族以及舊大陸的封建的和資本主義的文明民族，因此，就被資產階級利用來歪曲歷史的發展，做爲資產階級反動派的辯護論。凡是辯護論，就是要孤立的來看問題，但是如果用科學的看問題，必然是歷史的。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上說「唯一的科學是歷史學」。列寧在「論國家」中也曾強調歷史發展的重要意義，他說：「社會從奴隸制度過渡到封建，最後又過渡到資本主義必須把社會發展的基本的特點，經常牢記在心裡，因爲奴隸制度時代、封建時代、資本主義時代，都包含着幾十和幾百個世紀，而且有那樣多政治形態，有樣式繁多的政治學說、意見與革命，因此，只有把社會的階級劃分和階級統治形式的變更，當作主導的綫索，牢固地掌握住它，並根據這個觀點，去分析一切社會問題——經濟的、政治的、精神的、宗教的等等，然後才能理解這極其複雜極其多樣性的全部問題。」

二、學歷史從那裡着手

我們研究歷史的人，首先是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唯物史觀。因爲唯物史觀是一個歷史的科學。自有人類寫歷史以來，從沒有人能把史料整理成爲科學的。只有唯物史觀出來，歷史才能用科學去整理。如孔子的寫春秋，其史料是史官的紀錄，事實是齊桓晉文的，但是寫春秋的方法是孔子自己的，其目的在于警告「亂臣賊子」，這是孔子用自己的主觀寫的，即唯心史觀的歷史。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用經濟做基礎。是寫下層基礎與上層建築及其相互關係，如果上下層協調，就正是它的黃金時代。到了上下層極端不相協調以至于束縛經濟的發展就要起革命。所以用馬克思的方法來整理歷史，歷史就變成了科學，這是第一個文件。

第二個文件就要讀恩格斯「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起源」。這個文件是根據唯物史觀寫的。它首先寫財產問題。私有財產是下層基礎，家庭和國家是上層建築。由于財產私有，就有了近代父權制的家庭，就有了國家，他寫的是具體的歷史，寫了歷史的發展階段。列寧曾指示青年讀這本書說：「你們能夠讀恩格斯家族私有財產國家起源，這部著作，其中每一句話，是根據大量歷史的與政治的材料寫成的。這部著作，并不是通俗易懂，閱讀時請不要焦急，立刻就懂，是差不多任何人都沒有過的。但再重讀，也必能懂得大部份，我所以舉出此書，是因爲它給予正確處理問題的方法」。這是第二個文件。

第三個文件就要讀列寧的「論國家」，它寫了社會發展史，寫了從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這是一個完整的簡單的科學的社會發展史。

如果我們祇了解社會發展之一般，則讀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這三個文件就夠了，讀任何歷史，用這個方法去讀，那麼一切歷史，都變成了社會發展史，就不必有另外的社會發展史。

三、怎樣寫社會發展史

馬克思寫的唯物史觀，把歷史發展分爲上層建築和下層基礎及其相互的關係。上層建築是法律、政治、意識形態等；下層基礎是經濟，這在前面已經說過。這個上下層不是一個不變的因素，它是隨着社會不同的發展形式都有它自己的特殊的上層建築和下層基礎。例如以手推磨是封建社會，以蒸氣機推磨是資本主義社會（見哲學之貧困第二章），電氣加蘇維埃是社會主義社會（列寧語）；又如我們的新民主主義社會有公私及合作等五種不同的經濟，就有四個階級協商的政治形式，上面的這些例子就證明唯物史觀的上下層是一個歷史的發展。如果上下層相協調時是一個最健全的社會形式；那麼上下層不協調到一定的程度時則發生革命，所以我們製訂的革命綱領一定要澈底的了解當時的社會形式。

人類社會發展從古至今只有原始共產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五種社會形式，及其過渡的形式，如新民主主義社會，這是人類歷史的共同性。因爲這種共同性，只要是在一個共同的社會形式下，就無論任何民族、任何國家，無論在政治方面、經濟方面、意識形態方面，都有它的共同的社會性。列寧曾說

自我否定，不能不說他是魏晉的先驅人物。

「浮華不務本」之本，即漢以來「强本」之本，這個「本」，本於縣鄉亭制之安固農村自治體，由這一本源處選拔的士大夫賢良方正，在思想傳統上，有一套「師法」「家法」的基爾特規矩，不能踰越。到漢末以至魏晉，這個「本」被農民內亂所打破了，農村自治的組織，離開了安固的一定土壤，游離於大江南北，尤其所謂「衣冠南渡」，僑偷江左，完全依於血統宗族紐帶之相接，來維持門第士族，在意識上就不能不「末求浮華」，此所謂「末」，乃相對於「理平者先仁義」，而「理亂者以權謀」（蒯通對劉表語）之謂。凡一「權」即百權，當是令人所謂魏晉的自由自然主義。然而，要知道，魏晉之對漢師法而權變，是特定的一種思想方便，而不是本格意義的思想自由，今人不識此義，以致附會什麼文藝復興，判案不實，應加糾正的。

漢定儒學一宗，博士滿朝，司馬遷早已說尊儒，不過爲俳優之畜，排演喜劇罷了。在漢末社會的眞正悲劇實現時，喜劇舞台如鴻都門，反而成了悲劇主人翁的逃逋所，據後漢書與魏志言，那裡不是貪鄙惡少，就是避役諸子。一方面是逃離於「本」之金字塔尖，浮華交遊，「合黨連羣，互相褒歎」，而他方面則是逃離於「本」之金字塔以外（竹林之例），巧避現實，任性放達，廢棄禮法。於是乎，形式喜劇的搢紳服裝，就在現實的悲劇暴露之下，被譏爲「何物塵垢囊」，「傾倒衣裳」，發展而爲內心喜劇的麈尾仙態。漢之「本」反映於支配思想以師法家法的名物訓詁爲根據，而在農村自治體其爾特被破壞之時，此師法家法的地基早已失去効力，法禮便成了枯朽的東西，連馬融經師也「學無常師」，鄭康成大師也「依方辯對」了。在魏晉看西漢經師，「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反而要顚倒本末，以漢之章句煩瑣爲末，而魏晉之理趣煩瑣爲本了。孔子第二十四世孫孔融就最早具體地答覆了一個「中國尚虛」的有趣歷史課題：

孔文擧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儁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擧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爲奕世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

——世說新語、言語。參看魏志卷十二

孔子與老子的師資之尊，居然作爲前題理由，使姓李的與姓孔的通好成親，這倒不僅於是聲機有鋒之對，這意義重要的是，不但違背了漢代孔門歷世經師公卿的傳統家法，而且在世族名門的地基上忽然出現了儒道一家通好之答案，實開後來「儒道兼綜」的先河，權變到如此其極，亦猶之乎孔融的小兒子盜其牀頭酒飮之，大兒問曰：「何以不拜？」答曰：「偸，那得行禮？」

因了魏晉「屯田」、「占田」，豪門在大江南北自由圈地侵佔的結果，暫得法律承認，正是「偸、那得行禮」了，這自由是自然主義麼？這裡的問題，首先要明白自然名勝與豪族「名勝」（時人用語，言清談名流）的變化，由閭里農村出來的賢良方正，走了「通經致用」的行徑，而由萍浮世族出來的通達名流，則走了「游亦皆虛」的行徑。後者越和地理自然游離，越會形容山水名勝；實際實物的自然越不可把握，概念形象的自然越能增加語彙；自然的對象越離開認識上的點滴占有，則人類對於自然一般就越在虛處開刀，以至於全人格的活動以天滅人，投降自然。如果拿漢書地理志作爲漢人對於現實世界的占有意識代表來看，則魏晉「慕通達」（魏文政策）者的自然意識有如下言：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廣）問王夷甫（衍）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僕射（頠）善談名理，混有雅致。張茂先（華）論漢史，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戎）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者。」王武子（濟）孫子荊（楚）各言士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太原晉陽）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吳地）嶵巍以嵯峨，其水泙渫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世說新語言論

按此時太原吳地在王孫的心理上只成爲自然的名詞，太原已成胡騎世界，吳國則爲晉人所滅，王姓吳姓諸族，游蕩在意識上的通達，盡是不可捉摸的自然的「美」。老實說：清談是一種概念的遊戲，形式邏輯的玩弄，不過把漢人另一種形式煩瑣（訓詁章句）揚棄，而走向概念形式的煩瑣罷了，前人所謂漢儒實學晉人義理之說，亦皮相的分別，離開地望的諸「名勝」人物，更如下言：

蔡洪赴洛，洛中人問曰：「……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擧？」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殷頑民於洛邑，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

——世說新語言論

以辯才著稱的蔡洪的游戲邏輯，盡敢把郡縣國土的概念，還原於自然地理的概念，詭辯巧辭，目爲名勝，實在是清談的一個典型例子，所謂「絕妙好辭」，這裡面又要知道的是自然主義呢？還是自然投降呢？元帝過江，以寄人國土，心常懷慚，而顧榮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爲家，願陛下勿以遷都爲念」。（同上）這是一路相同的詭辯「通達」。「與時浮沉」，「浮者自浮，沉者自沉」，要在沒有「地望」的自然一般中取得心理上的虛義吧！臥於自然，並非占有自然的自然主義，猶之乎羞於抵抗並非抵抗主義，下面「名言」可以參考：

庾公（亮）嘗入佛圖，見臥佛，曰：「此子疲於津梁」。於時以爲名言。

——世說新語言論

拿「疲於津梁」嘗佛，就有自我陶醉的歷史根據。言正因爲：

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城，江左造創，豪族並兼，或客寓流離，名籍不立。

——世說新語政事註引續晉陽秋

對於現實疲乏了的靈魂，雖然沒有把握着一點自然，但欲在人類的詭辯中浮萍出自然全體。沒有郡國的流離僑姓，懷疑享年的帝王，不防說慕天席地，通古達今，而與自然合一。下面的對話，就是好例：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古今。」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尙不能得，卿迺圖作佛，不亦大乎？」

——世說新語排詞

晉武帝始登阼，採策得「一」。王者世數繫此此多少。帝即不說，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待中裴楷進曰：「臣聞（老子）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帝說，羣臣歎服。

——世說新語言論

空間與時間，數量與質量，都經過還原，一般的離實就虛，一切眞實的對象，都化而爲概念的「浮游。」這種思想傾向，在當時的支配力甚大，其爲後人所最訕議的例子，是嵇康被法，康子紹咨山濤出處，山擧紹爲秘書丞，對紹說「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同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

魏晉思想之歷史背景與階級根源

侯外廬

（一）玄談思想的歷史背景

章太炎的五朝學指出魏晉社會的腐朽現象，在兩漢社會並不例外，以范書崇漢，近於耳食，如果拿抱朴子漢過篇的史料來看漢魏兩晉，則前人以爲晉過者，亦同時可爲漢過，不能以史家盛世衰世的成見，來區別漢晉。這個論斷，在淸末確是新奇之說，對於囿於漢唐威風的史見，亦糾正了偶象判斷之謬失。然而，中古社會一般合法則性的發展而外，更有各時代的特殊合法則性的發展，其特殊法則的支配，並不能完全排除個別的現象，而特點之所以在於質的移行，與前代有種差之區別者，則研史者須盡其把握環鍊之職責，不能用全般而抹殺特殊。故經學之於兩漢，玄學之於魏晉，各有其社會基礎的特別所在，混而同之，齊而一之，對於問題只有曖昧，而無解晰。著者對於章太炎開創中國學術史研究的偉大功績，十分尊敬，而我們不是在淸末時代，沒有師法的束縛，故他的「玄學」理論，應加究明。首先，我們就要從章氏所特別論究的社會史，剝抉漢晉社會之異同，與其所以成爲各代思潮異趣的物質條件。

魏晉南北朝玄學的物質基礎是什麼呢？我們知道，漢末有魏晉的前行現象，而成爲制度法令的，才可以區分時代的劃期性，（如古代的禮器制，秦漢的縣鄉亭制，都是如此），因爲史家莫不以各時代的「法典」形成，作爲某期社會的轉移點來看待的。

兩漢的縣鄉亭制，作爲農村出發點的歷史，爲中國的封建社會打下了難以拔除的法制地基，土斷入戶的强宗地主所謂「强本」之計，爲有漢一代造成了優越的穩固性的物質條件。這種由下而上的土地所有制度的强固原則，反映於學術，政治思想的大一統春秋對策，神學思想的災異讖緯，倫理思想的孝弟力田，經學思想的章句煩瑣，凡在古代第一次以悲劇出現者，都可以在漢代編成喜劇爲第二次的再現。「復古」則以春秋的形式敎條作了藍本，方正博士就披上「搢紳」衣冠，「爲漢家用」。沒有蕭何的法律，就沒有叔孫通的禮樂，沒有武帝的法度，就沒有董仲舒的春秋，沒有光武的安亂纖緯，就沒有白虎通的神權典章，沒有賢良博士，就沒有經學師法，這一切都要在鄉亭制的强本富權方面，尋求物質因果的。

漢末三國的封建割據時代，强固的土地斷戶的組織，代之以所謂「屯田」制度。這種半軍事半生產的游離經濟，由於「豪强擅恣，親戚兼併，下民貧弱，代出租賦，衒鬻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爲通逃主」，（魏志曹操傳註引魏書），破壞了自然土地制度，而改變了安土重遷的漢縣鄉亭舊法，實行「相土處民，計民置吏」（魏國淵語）的臨時辦法。顯然的，「屯田」以至「戶調」，增加了剝削律，漢之名義上之十五而一稅，增至魏晉名義上的十之六或十之八。兩漢與魏晉，這裡就是基本上的分野。其理由正如毛玠對曹操說：「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廢業，飢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毛玠傳）。因此，遊離失所的部曲農民：被遊離失業的地主豪强領帶着，隨軍事的變動，而暫時和土地相結合，以最高的租佃制度，來養育軍事首長兼地主豪門的生活。這樣世界，和兩漢的鄉亭土地制度相反，必然要使得安固形態下的搢紳禮儀漸形破產，必然要給博士意識下的古典章句之師法以惡夢的打擊，代之而興的意識形態，就是清談玄虛了。經濟上的遊離其業，反映於思想，便成爲浮華任誕。不要說魏晉代表人物，就是漢末經學章句主義的集成者馬融、鄭康成、已經在思想上要變卄，「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了。後漢書馬融傳云（世說新語文學，註引馬融自敘，與下文略同）：

融旣飢困，乃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貲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鄧）騭召。

范曄論曰：

馬融……旣羞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註：莊子曰：曲士不可語於道者，束於敎也，）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原其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學無常師的馬融，不爲經典所束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在游離生活之下，以「生貴於天下」，歸於所安，不能不放下有漢一代的師法，尋出老莊所謂，這不是由漢代師法有常（反映鄉亭制的農村有常不動），轉化而爲天地無常（反映土地財產的流動移變）的意識反動麼？沒有物質條件的浮游，就不會有意識的虛誕。

鄭康成戒子書云（後漢書卷六五）：

念述先聖之玄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未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存羣書，率皆腐敝，不得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

萍浮南北的鄭康成作了袁紹的上賓，同書本傳記着：

玄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并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

焦循解釋謂「蓋以儒者執一不能通，故各爲異端以難之，是爲競設異端。康成本道儒，不執一，故依方辯對，謂於衆異之中而衷之以道也，是即康成之攻乎異端矣。」（論語補疏，卷二，）按「依方辯對」，以駁所難，就是「正始之音」的清談方式（見後說），由這裡可以知道，鄭康成完成了綜合經學諸義之後，在萍浮的環境中，就清談「玄」理，「通」而「達之」，把經學

的。

上面我們說過，魏晉玄學主要在於一「名」字，所以然者，是應從浮離游間的名族豪門的階級性方面來找尋秘密。不要說王謝裴庾之家的人物，即何晏、王弼、山濤、嵇康諸名流代表，那一個不是出生皇親豪門呢？至若王戎和嶠下及石崇王愷，那一個不是在富貴生活中亦善言浮華呢？老莊尙無爲，詭辯尙無不爲，二者結合成了中古名勝的教條，由人性還元於自然，即「天地四時尙有消息，而況人乎？」山濤以此教訓嵇紹就可不至「以人滅天」，做了殺他的父親的晉朝官人，在大自然中（沒有社會法則）無爲而無不爲。其實，紹父嵇康在他的有名的聲無哀樂論所用的名理，是和山濤一致的，又是「合同異」派詭辯的邏輯，他的此一名理，被過江的王大將軍（敦）推崇爲三理之一，他說：「夫殊方異俗，歌笑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懽，或聽歌而戚；然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發萬殊之聲，斯非聲音之無常乎？」在社會制度中（等於自然法則）無不爲而無爲。康紹父子都是名通理勝的名士，在老莊與名辯的綜合復古之下，就有這樣難受實踐撿證的「名」之犧牲者。有間之士煩瑣概念的游戲，地理葬於百萬言訓詁六經章句的考據僞游，更爲遺失個性，那裡有文藝復興的歷史？這樣的「名勝」，對於腐敗的皇帝政權是最有利益的，嵇康之死奪與嵇紹之生予，同於天地四時的消息，均於歌哭哀樂的情緒，非法之法的皇權，頭頭是道的。在不斷的「禪代」無常交替之時，魏晉南北朝的「名」正「言」順祗靠辭句之舖張典麗，上至曹操以來的九錫文，下至貴族交游，都在於名言浮辭。司馬昭之讓九錫表，正出於竹林七賢阮籍「辭甚清壯」的名文。宋葉水心所謂「姦邪者濟其欲」，便因了「名」之方便附麗，而可以歪曲現實。

按魏晉以來的名士，清談老莊與善言名理，二者兼綜的。鍾會、裴頠、衞玠、王敦、謝玄，固皆史稱爲「名理」能手，惟究實言之，「名理」是此時代的思想靈魂，世僅知三玄之於魏晉爲中心思想，而不知名辯更爲其中心思想的指示器。何晏「能清言」，「好辯而無誠」，王弼「通辯能言」、「辭才逸辯」，向秀「最有清辭遒旨」，阮裕「甚精論難」，郭象「言類懸河」，支道林以「支理」名家，殷浩「能言理」，其義與精練名理，實相同訓。正因如此，當時，惠施、公孫龍、墨辯才成爲名勝的寶筏，例如：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裕）道白馬論，爲論以示謝，於時謝不即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嘆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易得。」

——世說新語文學

司馬太傅（道子）向謝車騎（玄）：「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

魯勝的墨辯叙所言，並不合後期墨家之經說，頗曰墨學，實則名辯，請看他如何崇拜古代的詭辯學派：

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名必有形，察形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謂之「辯同異」。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降汙，「名之至」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習，於今五百歲，遂亡絕。……

——晉書卷九四本傳

除名辯而外，更有外來的佛理，助長辯風。例如：

支道林進即色論（按支道林集妙觀章云，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論成，示王中郎（坦之）。……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

支（道林）爲法師，許（椽）爲都講。支道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道一難，衆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

——世說新語文學

上面史料，僅指明名辯在當時的研究，頗爲重要。我們更以爲「兩可」，「辯同異」，「辯同辯異」，以及萬能的「名之至」指導律，實在貫串了當時思想界的主要進程，所謂「正始之音」，就在這裡獲得解答。現在我們特舉當時的代表名辯「四本」，「三理」，「三玄」等，試爲銓釋。王僧虔誡子書云：「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南齊書、本傳），可知四本論和「三理」，是當時的「言家口實」，而「談何容易」？又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苦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世說新語、文學）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嘆曰：「使我解四本，談不翅爾！」（同上）

按四本論爲鍾會所撰，是「正始之音」的代表作，惟此論已不傳，據三國志魏志及世說新語云：

會嘗論易無互體，才性同異。及會死後，於會家得書二十篇，名曰道論，而實刑名家也，其文似會。

——魏志卷二八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康）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

——世說新語文學

魏志曰：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尙書傅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文多不載。

——同上梁劉孝標註

嘏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裴松之註行傳子曰、嘏好論才性，原本精微，尠能及之。又嘏以鍾會明智，交之。又嘏與李豐同州，評李飾僞而多疑，矜小失而時於權利。不與友善。）——魏志卷二一

從上面簡略的史料來研究四本論的內容，實在有些困難。但在可能的推尋範圍之內，有下列二點使我們必須究明：

第一，性才二者，大約是講本體與材用的關係。「性」言本體一元，「才」言事功什多。「性」，和傅嘏相友善的荀粲就如此說明：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秕。——（此說）能言者（亦）不能屈。

——世說新語文學註引粲別傳

何晏論語集解關於此章云：

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之理。

魏晉人善論易繼善成性的天人之際，故性命之學，當作最高義看待。至於「才」，則指事功，漢末以來，多見求「非常之才」之文，劉表、袁紹、曹操，都在利用「非常之才」，以禪非常之代，甚至曹操令求不仁不義而有治國用兵之才術者。史稱三國人才特盛，或稱人才集於洛下，當是所謂「非常之業」的號召所致。一方面史載異才、奇才、雋才、大才、或才學、才文、才識

（二）玄學思想的階級根源

我們知道漢末編戶編民之制破散以來，當時所謂天下戶口不及盛漢之一郡，這些編民大約一部分起而爲流寇，一部分則附庸爲豪右的部曲，在制度上就形成魏之「屯田」勞動力，晉之「占田」勞動力。反之，所有者方面因了遷移流亡，除把漢代「任子」制度更加普及化，又盡量使古代民族制度死灰復燃，這就是魏晉的名門世族，如言「沈爲孔家金，顗爲魏家玉，虞爲長琳宗，謝爲弘道伏」之類。劉知幾所謂「世重高門，人輕寒微，競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史通通釋按云：「都邑則略具於地理，非同輿服之無附……至如氏族一門，自是魏晉相沿四姓尙官之習。」如實言云，祇有縣鄉亭制邑里地望有了式微之徵候，地主貴族競相標榜門閥，作爲魏晉政權的基礎。如當時「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魏志傅嘏傳，註引傅子言）於是漢之「鄉舉里選，」才變爲魏晉之「九品中正，」趙翼陔餘叢考譜學說：

至魏行九品中正法，於是權歸右姓，州有大中正，郡有小中正，皆以著姓士族爲之。有司選擧，必依譜牒，故賈氏王氏譜學出焉。

新唐書柳沖傳云：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冑，卑寒士，權歸右姓已，……；晉宋因之，始尙姓已……；夫文之弊至於尙官，官之弊至於尙姓，姓之弊至於尙詐。

晉自衣冠南渡，江左僑立，地望在習慣上已經成了商標，貼在右姓大族的實際門第之上，其浮漂不實，有如今人在大城市的某姓公舘標以某姓生地者。當時如瑯琊王，新野庾等豪門，以小流亡政府的封建地主資格，紛紛占地。豪族分類，多眩姓氏，「僑姓」，「吳姓」，「郡姓」，「虜姓」，區別至嚴。甚至適應這個事實，東晉王朝，出現了名實相離的僑立州郡，凡幽冀青幷雍涼兗預之名，錯寄南朝。（見晉書地理志）所謂九品中正的擧士法制，即建立於游離的名族著姓之這一史實上。傅嘏衞瓘劉裕范寧反對九品中正，游辭浮說，同時主張安土之實，土斷人戶，就是這個道理。衛瓘說：

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計貲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住爲貴，……爭多少於錐刀之末。……宜蕩除末法，以士斷定。

——晉書本傳

劉毅言九品中正有八條損政，其重要之言論如下：

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愛憎決於心，情僞由於己。用心百態，求者萬端。

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愛憎。

或以貨賂自通，或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憎。……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

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

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給殊方。……旣無鄉老紀行之實，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就遠，背本逐末。

人九品所疎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

——晉書卷四五

懂得了法制的形成，就可以論究名流或名勝的階級來源了。當時土地的兼併，比漢更凶的所在，是附加了軍事的强占，其得其失，依於經濟的買賣者而外，更要靠戰爭的勝敗。范寧所謂「人性無涯，奢儉由勢。同幷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以力厚身者，如祖約本幽州冠族，占奪鄉里先人田地。以祿富家者，如周伯仁母言「吾本謂渡江託足無所，爾家有相，復何憂」！晉人好蒲博，亦一種變態的財產生活，如劉尹謂桓溫必能克蜀，「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爲。」（見世說新語）魏晉六朝，所以形成奢華之風俗，正由於財產的得失太方便了，在得失方便的經濟之上（取給殊方，）產生了高下任意的人品選拔，復以著姓豪族的愛憎品價，產生了依方辯對的巧辭勝理。著者大膽的說，晉代的思想在於一個「名」字，這「名」字在階級方面是離了地著的名門，而反映於思想界則是遺了事實的「名勝」。按「名勝」二字，是魏晉以來方人的最高榮譽，一登「名勝」身價百倍。什麼叫作「名勝」呢？「名」即古代名辯之名，「勝」即名理負之勝，魏晉人稱至理爲勝理或第一理。故「名勝」也者，是名流（有第一流，第二流，第三流之分別）各級人物，清談詰辯，辭喻勝訴，高人一等之謂。例如世說新語中言：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日說一卦。

支道林辯聖人之逍遙，當時名勝，咸昧其旨。

郗超見傅瑗二子，謂瑗曰：「小者才名皆勝。」

王領軍（洽）與法汰周旋行，來往名勝許，輙與俱。

「名勝」以正始中的人物爲代表，茲擧二例如下：

何晏聞王弼「名」，因條向「勝」現語弼曰：「此理，僕以爲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爲屈；於是弼自爲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

傅嘏善言虛「勝」，荀粲談尙玄遠，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喩。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

——世說新語文學

有時亦稱「名通」，或「名達」，例如：

殷中軍（浩）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著地，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時歎絕，以爲「名通」。（按名通所謂，是以天滅人的逐元詭辯。）

——同上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失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屍；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汙。」時人以爲「名通」。（按此名通，爲定義法的詭辯。）

——同上

孫興公許玄度，共商略先往「名達」。

——世說新語

研究魏晉思想者，無例外地說老莊周易三玄，是玄學的主題，這在題目內容方面而言，確無問題，向秀傳所謂「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但在論理方法上而言，魏晉淸談又是「名辯」的復古。此所謂復古，並無諸子復興的性質，不過由漢儒復古於春秋者，變爲名勝名通復古於戰國的神秘唯心論與詭辯唯心論之綜合吧了。老莊與名辯，在戰國，是春秋搢紳與孔墨顯學的批判者，他們代表了奴隸社會統治者物質危機的意義，創出一套形而上學與形式名理。從兩漢到魏晉南北朝，在形式上煩瑣主義的復古流變，亦很順當地搢紳經學的章句，被名流玄學的名理所批判，二者之間都是煩瑣，一在章句，一在概念。其相互遞嬗的歷史，却不同於古代，而是中古封建社會的變動特異情況，爲其背景

與傅嘏一致，嘏以會明智結交，嘏在臨終時，又以「志大其量，而勳業難爲」戒會謹慎。按「志大其量，能合虛譽」，是嘏評夏侯玄的話，似鍾會亦傾向深遠一路，然後因才藝過人而奔競勳業。這裡就是他論才性合的說明，他似乎以性才內外相濟，作體用之合一看。他和傅嘏接近，則如裴松之評曰：

嘏料夏侯之必敗，不與之交，而與鍾會善。愚以爲夏侯玄以名重致患，釁由外至，鍾會以利動取敗，禍自己出。……嘏若料夏侯之必危，而不見鍾會之將敗，則爲識有所蔽，難以言通；若皆知其不終而情有彼此；是爲厚薄由於愛憎，奚豫於成敗哉？以愛憎爲厚薄，又虧於雅體矣！

上面已經指出，傅嘏品鑒玄會皆有「志大其量」之語，故交往正在於厚薄愛憎的名門朋黨，而與何鄧派之「貴同惡異」（此語在世說新語稍異於魏志註，統評何鄧，）毫無區別。

（三）李豐是李衞尉義的兒子，名被吳越，有中國名士之號。歷任魏氏三朝。據魏略所紀，正始中豐還待中尙書僕射，在臺省常多託疾。暫起復臥，如是數歲（時臺制疾滿百日當解祿，故豐未滿數十日暫起而復託疾。）他以這種手法，在曹爽專政時，周旋於曹魏與司馬晉二大勢力之間，「依違二公，無有適莫，故於時有謗書曰：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如游光」。爽殺，遂爲中書令。又據魏志言，豐雖宿爲司馬景王所親待，然私心在夏侯玄。玄爲夏侯淵之孫，曹氏外戚，曹爽之姑子，但以爽抑絀內不得意，爽敗，玄漸徙太常。李豐等謀以玄輔政，爲司馬師所忌，以莫須有之罪名，將玄豐等同族誅。玄豐事爲當時一大疑案，名族深爲不安，故師向許允曰：「自我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爲匆匆乎」此點當讓歷史家尋論，這裡所研究者，是李豐的派系性，使依違兩可的的政治傾向，史載確切，不待考證，故在思想方面便和以上二派不同，他「論性才異，」似爲一種兩面雙棲論，所謂「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兩可，」性才二者兩立皆是，依違適莫，存乎其人了。傅嘏評其「多疑」，世說新語容止篇時人目其「頹唐如玉山之將崩，」可以作爲此一理論的註脚。總之，他的實際生活與他的名門派系以及他的政治路線，決定了他的名辯意識，騎牆派論兩可之說，絲毫沒有折扣的。

王廣是王凌之子，漢司徒王允之姪孫。凌討吳有功爲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封南鄉侯，邑千三百五十戶，遷車騎將軍，與其外甥令狐愚並典兵專淮南之重。爽誅，由司空遷爲大尉。假節鉞。因謀擁立楚王彪，被司馬宣王夷三族，子廣同死，廣有志尙學行。蔣濟曰：「淩文武俱贍，當今無雙，廣等志力有美於父耳。」退而悔之，告所親曰：「吾此言滅人門宗矣！」（魏志卷二八，註引魏氏春秋）當淩謀廢立事，使人告廣，廣答「勿爲禍先」，據註引漢晉春秋言：

廣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今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而不治，丁畢桓鄧雖並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民習於舊，衆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聲振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勝己，……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

由此一段兩面皆有是非利害的話看來，可知王廣對於魏晉兩派之間，對虛高一面與對實利一面，兩皆無肯定或否定的是非，兩皆未能同異，不敢從一面而攻他一面，「勿爲禍先」。因此，這就在他「論性才離」的時候，助長了二元論的取辯，和「論性才異」的李豐比較，李依違兩可，王則依違兩不可，而游離性的立場，是他們的同點。（附表）

政派	人物	論	學派
祖司馬派	鍾會	論才性合	合同派
	傅嘏	論才性同	
魏宗室派	蔣濟		遺事派
	何晏	論性至上	
	曹爽		
	鄧颺		
依違騎墻派	李豐	論才性異	離異派
	王凌		
	王廣	論才性離	

上面是我們研究名勝的四本論所得的結論。因爲正始至嘉平之間，是魏晉政權鬥爭最尖銳的階級，名門豪族對壘森嚴（即章太炎所謂「任世貴」），所以在思想上反應出了四角形的「辯者之尤」，性才同異離合的概念，實在是名族同異離合X性的代數學。名辯一道，亦有不一定如四本論之與現實密切相注者，在複雜的人事中方面有若干角度，未可一言以蔽之。

（上接第十頁）

我於此有一建議，擬請政府文化部藝術局，精選年畫佳幅，請原作者以原稿寫成較大之合式尺寸畫幅；參加每年舉行之全國美展繪畫部門，由政府擇最佳者收購，永久陳列于將來之國立美術館，成爲一代文獻；此可起鼓舞作用，爲獎勵之一法。（那是最有效的提高現有國畫的辦法）亦可指明國畫之用，不限于年畫一種了。

如果以此次年畫展中好的作者，與當年何侯皇帝老子的那些內廷供奉比較，實在高明多了，（比如清代的金廷標）可見爲人民服務，需要更好的畫家；以歷史來說，這不是進步麼？這不過其開端而已，其前途可限量麼？

用寫像傳神描圖生動加上內容充實的年畫形式，來追上一般的古人成績，（不說筆墨）不必太長時間，就能做到。有一天年畫展覽會中，像古一舟這樣作品，達到百分之五十時，中國美術中興，便可能是超唐軼宋的時代了。

有人以爲我讚揚古一舟同志太過，（因爲不能說古一舟便登峯造極，不必再求進步！）況且聽說古同志尙在青年，其實我們正在改造年畫，必須鼓勵其中優秀作者，以示範；倘一定要吹毛求疵，也可以批評古同志這幅面部表情，不十分充分，但我衷心，要對此作者稱賀的。

本刊二卷四期要目

中蘇盟約與世界和平　陶孟和
怎樣認識工商業稅　崔敬伯
新中國農業經濟建設中的幾個問題　關水心
傳達全國勞動局長會議總結　施復亮
論國營公營企業的集體合同（續）　徐　弦
再談中學語文教學　宋雲彬
從土改中學馬列主義　陳體强
我在土改中的學習　汪　瑄
我們的土改工作組　袁　方
土改動員前後　史國衡
參加京郊土改工作的經驗教訓　程厚之
蘇聯四大報紙——述例　畢樹棠譯
危機籠罩着的資本主義世界　巴　魯譯
中國的特種礦產資源　王文魁
察哈爾的水利建設　蕭　離

、才辯、才行兼備，形容當時人物，而他方面「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魏晉志就，易生嫌疑，貴賤並沒」，才之成爲悲劇，實無問題。晉書卷九四孫登傳云：

孫登嘗謂嵇康曰：用才在乎識眞，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少，難乎免於今之世矣。（世說新語，棲逸載略同，云：「君才高矣，保身之道不足。」註引文士傳：「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入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

這裡就發生了問題：性與才二者的同異離合，在名辯方面，「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隆汙」了。天性與人才的天人之際，「是不是，可不可」的「兩可」麼？「同而有異，異而有同」的「辯同辯異」麼：「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的「辯異」麼？這些都是需要解決的重大課題。九品中正舉才的制度，正在取辯的四在論上刻下了是非吉凶的名障。它反映了豪門大族階級內部糾紛的同異離和，而在超現實的概念方面大暢游辭。

第二、我們雖僅知道傅嘏論才性「同」，李豐論才性「異」，鍾會論才性「合」，王廣論才性「離」，而無法知道他們的論旨何在，但傅嘏與鍾會相異而實爲合同派，李豐與王廣相異而實爲離異派，似乎有古代「合同異」與「離堅白」的分野。

這裡面有比周朋黨的內幕。蔣濟所謂「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愼於其朋，」痛謂當時豪門未能和祥。傅鍾二人崇尚事功，走左袒司馬晉的政治路線；曹爽、何晏、鄧颺一系是曹魏宗室派的中心；李豐與王凌王廣父子是騎牆於二者的投機派。他們中間的政權爭奪的同異離合，決定了思想的同異離合。

這三派人除了傅嘏享年僅四十七歲增封至千二百戶善終外，皆死於司馬氏的淫威之下。他最後亦戒鍾會說：「子志大其量，而勳業難爲之也，可不愼哉！」三派在同異離合的勾心鬥角權勢中，僅留下了「四本論」的概念題目，而現實則是歷史的諷刺，所謂同異離合四方形的對角線，操在司馬晉宣王與景王之手，即史稱司馬氏盡誅名族者是也。

（一）曹魏宗室派的曹爽是曹操的族孫，食邑萬二千戶，與司馬宣王爭權，平分秋色。何晏是漢大將軍何進之孫，曹操的養子（其母爲操所納，隨之入室，服飾擬與太子，操謂假子）。曹爽秉政，何晏、鄧颺（鄧禹之後）、李勝等爲心腹，時稱浮華執政，「輕改法度」。「晏等專政，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沭地以爲產業，承勢竊取官物，因緣求欲。」魏志更載其與曹爽等淫樂縱酒，驕侈盈溢。陳壽、裴松之所記，或有偏見，惟世說新語亦載，「何鄧二尙書獨步於魏朝」（言語註），「以官易富鄧玄茂」，「何晏以才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交通，合黨徒，鬻聲名於閭閻」（識鑒一註）。松之註謂何鄧丁（謐）爲爽門三狗，固刻薄之詞，而此輩不長事務，浮華成黨，頗爲事實。何晏在論語集解德不孤章云、「方以類聚，同志相求，」主張亦同。傅嘏恨其「貴同惡異」，不完全是攻擊。爽敗，何鄧等皆被司馬宣王所族。

從史實再回求於思想，按四本論中的才性之辯，沒有此派人參加。原因是「才」主功業，不爲他們所重視，何晏說：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玄）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師景王）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魏志註引魏氏春秋，按云，「蓋欲以神況諸已也。」）

三人年少時東風采齊名，何晏看不起「唯幾也故成天下之務」的事功性格，而以「神」自況，則猶尊「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之理」，勢所當然。例如他謂易窮理盡性，而王弼則說易以「幾」「神」爲教。（見論語集解加我數年章）故何既尊「神」薄「幾」，必言性遺才，而王則神幾合一言之。所謂「何平叔巧累於理」（簡文目）者是也。他註論語「一以貫之」說：

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一以知之也。——論語集解

「善」指易繼善成性之善，事指功業，重善輕事，似有遺事的主張。參證他解論語游於藝章之游，謂不足依據，故曰游，蔑視才藝更明。他與王弼所辯者是性情同異，他主「聖人無喜怒哀樂」，王弼主聖人「性其情」，「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魏志鍾會傳註引何劭作王弼傳）從性情之辯，轉爲性才之辯，似爲四本論的流變，何劭謂何晏之聖人無喜怒哀樂論，鍾會等述之，語雖不明，但既曰不僅鍾會一人，又曰述之，至少在取辯方面有其源流。且鍾會與王弼友善，「會論議以校練爲家，然每服弼之高致」（同上），則弼論性情合的邏輯，當於會論性才合有所影響。

（二）傅嘏，傅介子之後，世爲冠族。正始初爲黃門侍郞，以攻擊何晏「外靜而內銛巧，好利不忘務本」，被何免官，曹爽誅，取得河南尹要職。有功於司馬氏，進封武鄕亭侯。著論難劉劭考課法，以爲選拔重實才，苟非其才則道不虛行。他趨向事功，與何晏派不睦，由他與荀粲之辯論可知：

嘏尙名理，而粲尙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粲嘗謂嘏玄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嘏難曰：「能勝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耶？」粲曰：「功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以能使子等爲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爲也。」——魏志荀彧傳註

傅嘏，陳書評曰：「用才達顯」，近於實才至上主義，顯然與何晏的天性論相左。由於政見的不同，反映在思辯方面，就成了他的才性同論，似乎他以性無本體，才之外現都是性，有中古唯名論的思想因素。因此，他批評他的反對派說：

夏侯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晏）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家之人也。鄧玄茂（颺）有爲而無路，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以吾觀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魏志卷二一本傳註

李豐飾僞而多疑，矜小失而昧於權利，若處庸庸者可也，自任機事，遭明者必死。——同上

鍾會是鍾泰傅繇的小子。蔣濟識會於童年，賞鑒爲「非常人」，及壯有才數技藝，而博學精鍊名理。司馬景王嘆爲王佐之材。正始尙書中書侍郞，後以戰功食萬戶侯。終因謀反遭殺。世說新語註引魏氏春秋云：「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嵇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爲之禮。」紀其二人對答，「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鍾會在名理方面受了王弼的影響，而在事業方面又

東北雜詠

沈鈞儒

翻身樂吟一

李德全先生慰問架行歸談云：有一對青年夫婦，素來不頂和睦，男的要打女的。後來在架行做個事，大家說她好，拿到了分數。因此婆婆送飯，回家時丈夫也來接了。李先生說，從這事看，不但婦女有工作做，一切社會麻煩事情都被解決了。

溝水當門流，
烏鴉樹上叫，
貧家夫妻常打吵。
小媳婦，
淚暗吞，
婆婆眼前有長短，
丈夫拳下難分清。

× × ×

八路軍到來時代變，
婦女持針支前線。
小媳婦，
到架行，
工作認眞分數高，
大家評好有公道。

× × ×

小媳婦，
笑顏開，
手持針，
心奇怪：
婆婆今朝送飯來，
丈夫到行伴晚回。
針眼穿來再穿去，
前後終是一根線，
線不會變人情轉。
呀得兒得喂，
八路軍到來時代變。

× × ×

小媳婦
架行裡出來回轉家，
叫一聲婆婆眼瞪着他，
婆婆送飯心不安，
他接我來算了啥。
呀得兒得喂，
我們的人民翻身眞樂啦！

翻身樂吟二

鄉村已很少流淚兒童

小孩子，
讀了書，
回轉家，
叫一聲爸爸，
叫一聲媽媽，
要不要我來講個故事給您聽？
我們的人民翻身眞樂啦！

翻身樂吟三

年老的爹娘家裡坐，
前線來信，叫小妹子唸，
信裡說：
告訴爹娘教您樂，
孩兒到了錦州啦！
夢也沒想到呀，
像風雨這般快，
像潮水這般猛，
捏緊了鎗桿，忘了身。
敵人繳械啦，
我們的部隊進了城。
老百姓滿街笑臉迎，
家家戶戶點紅燈。
孩兒來時爹娘說，
兒呀你要出力把勝利爭。
孩兒沒有一刻忘了你的話，
進了錦州就好像往家裡行。
快寫信，
告爹娘，
大家子樂呀！
大家子樂呀！
我們人民翻了身。

松江雜詠

捷書如片雪飛來，一月名城萬里灰；敵勢已隨枯葉盡，隔門應共曉雲開。

（開錦州後一連串捷音。）

江心凍後見奔湍，雪意連朝亦欠酣；地氣也隨人事轉，從今北雁不須南。

（松江封後復開。）

一叢寒菊比瓊華，掩映晴窗近綠紗；莫道婆娑春意減，案頭迴盼有名花。

（購盆菊，色作肉裡紅，日光自窗外射入，深籠淺映，光艷動人，愛之，成詩一首。）

十二月十三日夜二時月光射枕上睡不着二首

夜窗見月忽思家，親切如聞喚阿爺。萬里關山緣底事，阿爺身已許中華。

且試安排尋好夢，埋頭力向枕池挨。只愁夢遠飛難返，囑咐天明緩一些。

（些，廣韻瀉，平聲，少也。）

一九四八年除夕，縱飲狂歡。既睡枕上，得詩三句，不能續。翌晨，寫請沫若先生續成之。

一串秧歌扭上樓，神燈枉為日皇留。光明自有擎天炬，照澈千秋與五洲。

（時寓瀋陽鐵路賓館，即前日本大和旅館。入門處廳有神社式之石燈一座，從餐廳走向樓梯，必須經過，詩中第二句故云。）

母心有光明

紀實也。茅盾之郎韋韜，與其母孔德沚，在瀋陽鐵路賓館會晤時，情形如是。旁觀為之感動。

別兒逾三載，迢迢千萬里。忽復入懷抱，驚喜出夢寐。相對忘語默，不覺日移晷。兒今有工作，人民在一起。坐久向母辭，言歸兒所居。母意猶未饜，握手緊難弛，早眠愼饔飯，一言三稱汝。相隨出房闥，徐立俟影逝。兒行應已遠，扣窗眼雙注，窗外滿積雪，街燈隱暗霧。況復音辭寂，兒將在何許？母心有光明，照見兒行路。

我們必須在一淘

為學習俄文班同人作也。去年秋末來東北，隨李德全先生和千里、學範、孟君、之平諸友學習俄文，由賴亞力先生講授。四九年因能力時間關係退出，深覺懊悶。頃李先生謂我：「先生不在一淘，似乎顯得離我們遠了」。因賦此詩。

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

（一）

我們要走上世界的道路，
我們要準備一切，
還是一個最親切的引導。
我們要研究、學習，
我們必須在一淘。

（二）

我們要採取世界的寶藏，
我們要知道一切。
還是一把最急需的鑰匙，
我們要研究、學習，
我們必須在一淘。

年前發見左齒有一蟲牙，冷熱水入口即刺激神經作痛。訪醫治療，醫拔，因循未果。一月二十二日晨決意拔之。安然無事，患始盡去。

一九四九年於瀋陽

有毒除宜急，連根拔勿疑。決心全在已，霈術自需醫。縱有纖微苦，應從久遠思。齒牙何足算，凡事盡如斯。

鴛鴦硯

初梨先生贈硯，端石也。彫鴛鴦池水，製作甚精。有感因作。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九日舊曆元旦記

贈我鴛鴦硯，諦視為躑躅。一鳥赴池急，一鳥伏在池，迴頭如欲語，形影已分離，分離難復合，戢翼長相思。纏綿玉臂句，凄清寶瑟辭。同命四十年，一旦隔塵土。此硯永寶用，此情誓終古。

當今年畫與我國古畫人物之比較

徐悲鴻

我國因歷史悠遠，文明早啓，但久受專制壓迫，思想不得開展；遂養成一種好古的風氣，而忽視現實；於是樣樣想到漢唐，甚至緬懷商周，但不甚究其所以然。考藝術史上文化測量之程度，都以寫實的深刻與淺薄爲標準；我們稱藝術高峯，必舉希臘，爲什麼呢？因爲除掉希臘所遺留與我們古典典型的一切武士不說，就是他們虛無漂渺的神話上的人物，亦完全人化，刻劃到有血有肉，神情生動；如安波羅，爲壯健之美男子，安推娜，爲華美之婦人，皆在當時雅典市上可能見到的體態合乎理想實實在在的眞人，賦以神名，將它神化而已。我國古訓，崇尚儉樸，古時復沒有宗教，而我國文化，又發祥于西北平原，少石刻遺蹟；欲舉我們造型藝術最早出而生動之作品，應推山東武梁祠浮彫中之一圖，「豫讓刺趙襄子」，但亦不過寫出駕車之馬驚躍而已，豫讓與趙襄子兩人之神情還是看不出。現在藏在英倫不列顛博物院舉世咸知的顧愷之「女史箴」中之「馮婦當熊」一幕，亦尚是初期 Archaism 情調，倘使現代人畫到如此，纔算平常；我們目下可能見到的傑作，應推宋代無名氏畫的「朱雲折檻」圖，寫朱雲要進諫漢王，兩個武士力阻之，至于折檻的情形，確實生動傳神。至于吳道子當年聲名喧赫的壁畫，我們既無從窺見考證，想來都是印度中國化的羣神，不會高過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范尼棲亞派諸子。（但可能是極高水準）至於敦煌壁畫能使吾人流連移情之點，倘是當時供養人像；因爲荒誕不經的題材，到底難做得出最好文章！又古今稱道之「清明上河圖」，只敷陳一時之社會形態，無中心主題。所以根據這些，中國畫在人物方面，成就並不太大。

但寫像則不然，故宮博物院所藏宋太祖趙匡胤，這個赤棠色皮膚壯碩漢子，看出是很有權謀的角色；北京張孝彬藏的董其昌陳繼儒像，刻劃出資產階級沾沾自喜小有才的人物，如見其人；此外若明代傳眞，至今留遺的還有不少傑作。惜乎這類善于寫像的畫家，只能寫像，連寫個全身人都不會；通常是另外請人補足完成的。缺少結合，至于如此！

爲人民服務的大前提，是今日一切工作的總方向；就算我們單爲改進繪畫努力，亦必須針對我們的缺點進攻；我當年曾標榜吳友如，金蟾香，（五十年前上海畫家，曾刊載作品于當年點石齋畫報上，多寫時事。）就是這個緣故；現在文藝須配合政治，共同綱領上所載「啓發人民的政治覺悟，鼓勵人民的勞動熱情」，就是我們的依據。凡是募寫生產模範，戰鬥英雄等等，某某眞人創造某件眞的歷史，用繪畫來表現，實在難過于畫出騰雲駕霧的東皇太一，（離騷九詞）撫孤松而盤桓的陶淵明！所以年畫就是最好的形式！每張畫要能夠在大衆中間起一定作用，是件不容易的事！不要看輕牠，許多有名的老畫家，于此未必稱職呢！

全國美協與新華書店此次在中山公園內合辦之新年畫展，集合去年年底各地區所印製之年畫，共三百餘幅，其中以內蒙古、山西兩處，比較精彩；前者爲尹瘦石同志領導；後者爲力羣同志領導，大概因地區不大，指導較易，而從業者又不存在思想問題，觀點準確；內蒙古年畫製作者，爲尹瘦石、邢璉、烏恩、烏力吉國、宮佈扎布、烏勒，作風普遍精嚴；山西則爲力羣之選舉，劉鳴之新年勞軍，張懷信之好副業，田作良之擁軍，但李順達之家一幅中，牛高僅及人之半，與小驢齊大，此係疏忽；作風普遍質樸，印刷條件，殊不甚好，如力羣之選舉，地與牆皆用淨黃色，不如無有。擁軍亦用黃底，太欠考慮。杭州藝專出品中「打到台灣去」「十月一日閱兵式」，皆大場面，結構複雜，而有條不紊。東北區有佳製，但亦有粗製。上海印刷精良，惜乎月份牌格調未除，此因迎合一般未受過教育之大衆不高之趣味，有如廣東戲大好行頭，製圖者不甚注意生活體驗，距離農人眞實情況頗遠，但此缺點並非不可糾正的。石家莊出品中有古一舟同志「勞動換來光榮」一幅，以技法論，可以達到我國古代好的人物畫家水準；單線平塗，前後備鈎線，用墨的深淺，加以區別，就能看出距離及宜點所在，還是極高明的辦法。精美之木刻，既顯得高雅，而又獨運匠心，區別數種藍色，便不同他處石印色彩之單調；鄙意以爲表現中國之現階段農村樸素生活，單綫平塗的畫法，用精美的木板套色印出，實爲最美滿的形式。比如古一舟同志這幅年畫，陳列在世界任何美術館中，毫無愧色。（拿他與相傳閻立本帝王像比較此幅顯然進步）此外個別之佳作有莫樸的「鬥爭地主」，因印刷不好而減色，鄧澍的「歡迎蘇聯朋友」，顧羣的「十月一日」李琦的「拖拉機」（華君武同志極贊賞這幅，以爲可用作提高示範），以及金浪、張仃、吳爲、黃均、姜燕、墨浪、陳綠督、馮眞、王眞，都有良好表現，可說勝利完成他們的任務。尚有王式廓同志「河伯娶婦」十六幅，每幅都異常生動，（蔡若虹同志在人民日報所稱道的），此乃古典型式之賦有生命者。其外在技法上存在着小小缺點者，如鐵生所製之「軍民一家」，在人物上加上陰影，又不精確。收不到立體感的效果，既不科學化，反失掉了民族形式，還在年畫上，是可以討論的。湖北武昌出品，王賓宙同志的「六畜興旺」對于動物形態結構，研究不夠，離古人水準還嫌不足，勿論推進一步了。上海出品中「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熱情洋溢，佈局甚好，可惜人物手臂前段都錯。又如「發展副業冬季伐木」幅中砍樹者，完全抄襲瑞士 HODLER，「養個胖娃娃」幅抱兒女子全仿賴飛爾，生吞活剝，不足爲訓，馮慧清之「慶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所寫工農兵衣服線條，全不中繩，此雖細節，但太輕視法則與中國遺產；又過半數年畫對于毛主席像，未能逼眞。

尚有「生產計劃」一幅，人物與牛作法技巧甚熟鍊；及「摘棉花」一幅，極有裝飾趣味，皆不得其名。

（下轉第九頁）

志，多係清代重修，重修的年代未必就是搜集材料的年代。據天野元之助氏說，他雖然有長期調查農村的經驗，却一次也不曾遇到過耕作時唱作業歌的實例。但從上述衛哈的報導看來，這種作業歌至少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的確流行於農村。總括的說，從前的農民在耕作水田的時候，常常合唱作業歌，其中插秧時唱的歌特稱插秧歌或秧歌，以資區別。(2)

(1)高山日文譯本：勞働とリズム，頁三一〇。

(2)日本古代的「田樂」是農業尤其是插秧的作業歌，關於它的作用有下面一段記載：

『無論萬葉集的歌，或平安前期的歌，都不是報導插秧的勞動方式的。不過插秧這一種作業，要用了多量的勞動，才能發揮高度的效率，這是很明顯的。除了皇太神宮外，在香取神社、住吉神社等的古神社裡，農耕祭祀的中心就是插秧，是聚集了許多插秧女，奏田樂致祭的；插秧的形式伴着這種田樂；可說是構成了插秧的特徵，就是要集中大量的勞動。(中略)插秧這種作業，除了鄉女担任插秧外，與耘田、勻田、取秧、運秧、分秧等的作業，大部同時並進；這些簡單的分工與一定的合作提高了全體的效率。不過插秧是主要作業，在同一耕地內插成一行，有着一定的分配，都是互相牽制的，作業本身是可以監督的。又用音樂鼓舞它的方式，不僅是儀禮和樂，並可看作强制勞動的典型方式。大地主構成最大的家族，其構成可說以奴婢爲主；這種勞動因上述插秧形式的存在，在水田裡顯然是發揮盡致的。』(古島敏雄：家族形態與農業的發展，頁五三——五五。)

(三)

根據上面的說明，我們知道了中國人在插秧和耘田時，唱作業歌，插秧時所唱的叫做插秧歌或秧歌。看了以上諸例第一要注意的，就是農耕時候的歌唱，多跟着互助勞動進行的。農耕上的互助，今日普通叫做「換工」(變工)；換工一詞從古就有，其他種種不同的名稱也從古就流行的。

最早用「換工」一詞的，是陝西洵陽縣志，湖北孝感縣志，湖北宣恩縣志，湖北長陽縣志等書。洵陽縣志說：

今鄉俗薅草時，……通力合作，謂之換工。

孝感縣志說：

有有田之農，有無田之農。有田之農，悉不自爲農。蓋流習漸靡，恆恥躬耨；或付之奴僕，或傭工，或相倩助，曰換工。

宣恩縣志說：

耕種田土，每換工交作，夏時耘耨，邀多人。伴力耘之。

長陽縣志說：

旱用草盛，工忙互相助，爲換工。

換工指倩助、相助、併力或通力合作的關係，無論在耕種時，或除草時，都實行的。

其次，農耕作業時的互助，也叫伴工。適用這個名詞的，是山東登州府、江蘇華亭縣、江蘇烏青鎮、浙江秀水縣、浙江平湖縣、浙江嘉興村、浙江海寧縣等處；登州府志說：

田多人少，彼此相助，曰伴工。

華亭縣志說：

田多入少者，倩入相助，由己還之，曰伴工。

平湖縣志說：

田少者通力合耦，曰伴工。

嘉興府志說：

佃家通力耦犁，曰伴工。

又秀水縣志與烏青鎮志說：

佃農通力耦犁，曰伴工。

所以伴工是彼此相助、倩入助、通力合耦、或通力耦犁的關係；內容是與上述的換工完全相同。通力合耦及通力耦犁二語，不消說是出於周禮：

以歲時，合耦于鋤，以治稼穡，趨其耕耨。

這種文章解說起來，是命令農耕的相互扶助的。合耦的這項解釋也有異說；把通力合耦與通力耦犁用作伴工的說明，其所取立場，顯然是把周禮的合耦當做相互勞動解說的。不過上述秀水縣志，是在明萬曆年間編纂，烏青鎮志也是在萬曆時代增修；足徵伴工一名，至少該溯至明代。又海寧州志說：

芒種前後，鄉村各具牲酒，祭土穀之神，謂之發黃梅。各方聚飲，而後插青，彼此相助，曰伴工。

該地是先祭土穀之神，聚飲後才實行互助，以便插秧。

農耕的互助，在客觀上看來，是所謂勞力的交換關係，換工和伴工照字面來說，也不外乎勞力的交換關係。勞動的互助關係，普通勞力交換一番後便結束了。換句話說，這是臨時結合的關係，以補救農忙期勞力的不足，未必組織成爲永久的團體。換工和伴工，顯然屬於這種範疇。但也有把農耕上的互助關係組織起來，採取持久的團體形式的，叫做工班。如陝西寧陝廳志說：

貧不能雇工者，則於隣近十數家，每家抽壯丁一名，約爲工班，領班者曰包頭。閒時則築堤採薪，忙時則條家耕耨。

陝西孝義廳志也說：

貧無力者，於隣近農家，各抽壯丁一名，約爲工班，領班者名爲包頭。閒時則砌礎採薪，忙時則沿家耕耘。同力合作，尙有古人之風焉。

這幾乎都可以看到同樣的報導。以上都是陝西獨見的例子，這種情形的互助，從農耕上的耕耨推廣到築堤採薪，經過了農閑農忙兩期，而勞力交換的關係是在包頭領導之下，保持於同人間的。不過在這些例子中，互助的基礎在於農忙期的交換勞力，即農耕上的交換勞力，其所含意義，在我們看來，工班也不劣於換工和伴工。

此外，四川大竹縣志說：

四月初，秧長。盡栽插。鄉人通工，彼此相助，曰打暴。

這裡有「打暴」一名，又江蘇常州府志說：

夏至前後……插秧。村落農夫，各各相倩，老幼得休息。

廣東嘉應州志說：

鄉中農忙時，皆通力合作。

江西南城縣志說：

插秧，隣里爲伍。

江西武寧縣志說：

農民插禾，聯隣里爲伍。

湖北來鳳縣志說：

四五月耘草。數家共趨一家，多至三四十人。一家耘畢，復趨一家。

還有河北萬全、懷安、懷來三縣縣志都說：

耕種，以力相助。

像這樣只載互助勞動的事實，而不記明名稱的，在州縣志中也有不少例子。

如此說來，農耕上的相互扶助，盛行於明清時代的各省。不過在歷史上聞名而可引以爲例的，要算元王禎的農書所記的鋤社；文中說道：

秧歌的歷史

清水盛光作
張其春譯

(一)

自從鹿地亘氏介紹中國西北所風行的秧歌劇以後，(1)秧歌的名字突然引起了一般人的注意。據鹿地氏說，中國西北解放區所演秧歌劇，是一種載歌載舞的戲劇，流行於軍隊、工廠和農村，業餘秧歌隊和劇團互相競賽，風靡一時，影響遠及重慶的戲院和舞場。尤其在一九四三年以後，延安一帶從事共同耕作的農民。利用午睡的時間，一人領唱，數人輪舞，這種燦爛的光景，出現於各地，一方面又上演啓蒙的秧歌劇，如「組織起來」，敎導農民互助勞動的意義和必要。

鹿地氏所介紹的秧歌，在西北有着這樣重要的意義，但從文字上看來，秧、就是稻苗。秧歌本來是與農村有關的某種歌詞，內容與西北的學校工廠軍隊裡所流行的秧歌不同，可想而知。秧歌究竟是怎麼樣的呢？

(1)鹿地亘：秧歌隊與插秧隊(民衆之旗二卷三期)

(二)

首先要注意的，就是秧歌另稱「插秧歌」，插秧歌的名稱早在宋代的文獻裡就有了。秧歌其實是插秧歌的簡稱；上面說過，秧指稻苗，所以插秧歌照字面上解釋，就是插秧時唱的歌，在日本叫做「田植歌」。關于這一點，鹿地氏也已指出了；我們知道了秧歌是插秧歌的簡稱，秧歌等于「田植歌」，也就可以認識一半了。

更具體的指出插秧歌即「田植歌」的，是下面的二首宋詩。一首是南宋鄭樵寫的，就叫「插秧歌」：

漠漠兮水田，裊裊兮輕煙。布穀啼兮人比肩，縱橫兮陌阡。

一首是同時代的陸游寫的，題爲「夏四月渴雨，恐害布種，代鄉鄰作插秧歌」：

浸種二月初，插秧四月中；小舟載秧把，往來疾於鴻。吳鹽雪花白，村酒粥面濃。長歌相贈答，宛轉含豳風。日暮飛槳歸，小市鼓鼕鼕。起居問尊老，勤儉敎兒童。何人采此語，爲我告相公。不必賜民租，但願年屢豐。

這二首詩不但以「插秧歌」爲題，內容上也提到了插秧。插秧歌未必以歌詠插秧的情景爲限，不過在插秧歌的題目下描寫插秧的光景時，秧歌之所以爲「田植歌」，也就昭然若揭了。

據李景漢所介紹的河北省定縣的傳統，北宋時，蘇軾(東坡)出知定州，在定縣北部黑龍泉附近的蘇泉村、東板村、西板村、大西漲村、小西漲村等處，看見水田內工作的農民甚爲勞苦，便自編歌曲，敎他們在插秧時歌唱，使他們忘了疲倦。這是秧歌名稱的起源。李景漢所謂秧歌，就是插秧歌，是不能否認的。只是鄭樵和陸游的秧歌，不知在什麼地方做的；假使定縣的傳說可靠，那末插秧歌大約起於北宋的定縣，南宋時代早已流行於定州以外的地方了。

秧歌的起源如此，它的名稱也流傳於清朝。江西萬安縣志說：

四月，農夫蒔田。秧歌遞唱，達於四境。

四川新津縣志說：

農人插秧薅秧，以一人先歌，衆人齊和，謂之秧歌。取其并力忘勞，瞬息一畦。

四川州巴直隸志說：

春田栽秧，選歌郎二人，擊鼓鳴鉦於隴上，曼聲而歌。更唱迭和，纚纚可聽，使耕者忘其疲，以齊功力。有古秧歌之遺，夏耘亦如之。

屈大均的廣東新語說：

每春時，婦子以數十計，往田插秧。一老撾大鼓，鼓聲一通，羣歌競作，彌日不絕。是曰秧歌。

張心泰的粵遊小識說：

春時連村插秧，命一人撾鼓，每鼓一巡，羣歌競作，連日不絕，名曰秧歌。

都可作爲例子；據上述新津縣志的記載，當地亦稱薅秧歌(即耘草所唱的歌)爲秧歌。這無疑是秧歌名稱的轉用，不是秧歌本來的意思。

可是湖北羅田縣志說：

及分秧，彼此通工，田歌互答。

湖北宜恩縣志說：

耕種田土，每換工交作。夏時耘耨，邀多人併力耘之。選善唱田歌者鳴鑼擊鼓，一唱一和，謂之打鑼鼓。

這樣是把耕田、播種、插秧、栽培、耘耨時唱的歌，統統稱爲田歌了。田歌大都指耕作水田時唱的歌，站在這一立場來說，秧歌是田歌的第一種罷了。此外單記載唱歌的，例子也不少。如陝西洵陽縣志說：

今鄉俗薅草時。一人鳴鼓督工，或以鉦配之，歌唱忘疲。

湖北蘄水縣志說：

及栽秧，東西鄰易力助工，擊鼓作歌以相督。

湖北黃岡縣志說：

歲清明，始布種。彌月而栽，比鄰咨助之，鼓歌相催督。

這些例子中的歌唱，雖然沒有加上什麼特別的名稱，却就是田歌，耕作水田時才唱的，不過插秧時唱的田歌就是上述的秧歌，無可懷疑。十九世紀中葉，有個西洋人旅行華西，把他親身的見聞做了一本報告，下面一段是衛哈(Karl Bucher)在勞動與節奏(Arbeit and Rythmus)(1)一書裡所引的：

水田裡往往有二十個或二十多個大人和兒童排成一行，涉足泥中，水深沒膝；足趾薅草，並且一面把秧株踏實了，一面前進。喧嚷的合唱曲，不絕地誘導這種工作。

這本報告中的合唱曲，顯然是田歌吧。上面所引州縣志的記載，都不詳搜集材料的年代。我所寓目的州縣

；不過元代的鋤社由十家組成，陝西的工班由五家組成，又江西南城縣志說：

插秧隣里爲伍。

江西武寧縣志說：

農民插禾，聯鄰里爲伍。

還有兪引湖北來鳳縣志說：「數家共趨一家，多至三四十人；」這樣看來，農耕上合作的範圍，一般戶數是十戶，人數多也不會超過三四十人。不過十戶上下，三四十人，決不算少數了。因規律與統制的必要，顧全共同感情的高揚，這數目也可觀的了。鼓鑼歌唱既與勞動以節拍，使勞動本身娛樂化，尤其與互助勞動相伴，我想大概因此吧。

最後還有一句話，就是方志所載農耕互助，多就水稻栽培區域來說。這倒並非因耕作水田必須集中許多的勞動力（原是事實），却是在耕作水田的全部過程中，最重要的當然是插秧那個階段。歌唱固然在耕作水田的各個階段裡都有，特別造出插秧歌或秧歌的名稱，恐是因插秧在栽培水稻的過程中占重要的地位吧。無論如何，帶着互助的農耕上共同作業，常以鼓鑼和作業歌爲伴，秧歌是插秧歌的略稱，無非是作業歌的一種罷了。

（六）

但據李景漢之說，秧歌至後世性質一變，專指正月、廟會、節日等農民所演的戲劇了。他引述定縣對于秧歌起源的傳說，是在他和張世文合編的定縣秧歌選序文裡，但這本書並非蒐集插秧唱的秧歌的，不過是編纂新興的秧歌即戲劇化的秧歌脚本罷了。從插秧唱的秧歌發展到戲劇化的秧歌，不知道是從那個時代開始的。但陝西道光清澗縣志說：

十五日上元，天官誕辰。……城鄉各演優伶雜唱，名曰秧歌。

那麼至少在陝西，道光時秧歌已用作戲劇的名稱了。又民國二十二年的山西省民政刊要，記述省內各縣的習俗，也說起秧歌是農村的娛樂；這種情形的秧歌，自然是戲劇化的秧歌了。

這樣看來，今日盛行於西北一帶的秧歌劇，是戲劇化的秧歌再加改良發展而成，這是不能否認的吧。這已不是簡單的插秧歌，或作業歌，也不是只供農民娛樂的了。一旦轉化爲戲劇．秧歌就能在工廠裡、部隊裡、學校裡，風行起來。據延安大學校長周揚說：（1）西北當局用了羣衆（包括知識分子和工農兵）底藝術的熱情和創造力，奬勵秧歌，使它成爲羣衆藝術活動的中心。但我們不可忘了秧歌是農村諸條件下的產物，尤其是農民的藝術。秧歌在西北農民間負着重大的任務，秧歌劇的寫作也還是爲了啓發互助勞動的，起首已說過了。

× × ×

爲了啓發解放區的農民寫作秧歌劇，更爲了從事共同耕作的農民利用午睡時間，盛行秧歌舞；這記載指示着自古相沿的戲劇以至作爲作業歌的秧歌的形式，已注入了新的內容，而提高爲民族性的民衆藝術了。不過在秧歌歷史發展的背後，有着農業經營上的根本改革，換工、鋤社、變工等的形態，原爲古時貧農在農忙期的暫時互助，現在站在新民主主義的立場，採取而利用爲向合理的集體農業經營的方式；秧歌的歷史的社會基礎，正在這一點。

（1）周揚：表現新的羣衆的時代，毛澤東：論文藝問題等的意譯摘要。原文載于中國研究第三期，著者清水盛光爲中國研究所所員。

婦女解放的尺度是全人民解放的尺度

——談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

芮沐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在這幾天裡，通過並公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婚姻法。是一個奠定我們新民主主義階段新婚姻制度的大法。除了憲法以外，這無疑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法律。這是牽涉到中國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民一半或不到一半的婦女們的前途，這也是決定了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民另一半或一半有餘的男子的將來幸福的一個文件。女子不論是母親、妻子、女兒，男子不論是父親、丈夫、兒子，一律地都將受到這婚姻法的惠賜。

舊中國的婚姻制度，是舊社會的產物，它組成了幾千年封建社會的骨幹。因爲舊婚姻制度是舊家族制度的骨幹，舊家族制度又是舊社會中最基層的經濟單位，所以那封建的剝削關係，就必須伸張到滲透到整個家族制度的婚姻制度裡面去的。舊的家族和婚姻很明顯地是舊社會經濟的一個堅强的上層建築。

在這建築中，婦女配合着她應有的命運，她深藏在閨閣的深處，與社會沒有直接的接觸，出門要人伴隨，談話要低着頭，彎着背，還不敢正視着人。她們自己認爲不懂得任何事務。有一個時期，還纏了足，站不穩，立不定，她們祇有一個任務，那就是供男子的勞作與歡樂，爲男子系統的家庭生產出若干可以繼承男子財產的另一批男子來。她們管理着極瑣屑的油鹽柴米，照顧着丈夫和子女的衣服，侍養着男子們的父母與家人。她們的任務在嚴格的分工之下是不應有一絲一毫的差池的．服務稍不勤奮，那就有討得嚴格制裁的危險。在性的要求上，她們沒有應有的權利，也更談不上辭去職務，另求生活。甚至在丈夫死亡了以後，甚至在子女死亡了以後，她們的生活仍然是一個悲慘的繼續。她們的來是買「來」的，至少也是兩個門當戶對的經濟關係交換而來的，而她們的去則是趕「出」去的。

這種情況，是不是由於個別男子的有意壓迫呢？倒也許不是。但不容否認的，這是一種極嚴密極有體系的社會制度的安排。恩格斯說：「一夫一妻制是由對偶婚演變

其北方村落之間，多結爲鋤社。以十家爲率，先鋤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飲食，樂事趨功，無有偷惰。間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故田無荒穢，歲皆豐熟。秋成之後，豚蹄盂酒，遞相犒勞，名爲鋤社。甚可效也。

如此，鋤社是農耕上互助團體的名稱，約由十家組成，盛行於元代的北方村落。不過元代的互助勞動，也並不限於北方村落，王楨農書對於南方農家使用鐵搭（農具）時相互扶助一節，也提到的：

南方農家，或乏牛犁。舉此斷地，以代耕墾。取其疏利。……嘗見數家爲朋，工力相傳；日可斷地數畝。

王楨的記錄比較詳細，並且向世人推獎，因此鋤社的名字特別膾炙人口；與鋤社相似的組織也存在於當時的南方，這個事實是值得注意的。我們把鋤社看作農耕生活上相互扶助的歷史典型，把農耕上的互助姑且稱爲鋤社性合作。在這樣的措辭條件之下，上述換工、伴工、工班等，都可規定爲鋤社的關係吧。

不過我們推求鋤社這種性質團體，還可上遡至宋代。蘇軾眉州遠景樓記寫當地農民間「合耦相助」之風道：

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爲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爲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阮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蓋如此。

這是一例，又王禹偁小畜集中序「畬田詞」道：

上雒郡南六百里，屬邑有豐陽上津。皆深山窮谷，不通轍迹。其民力耕火種。大底先斫山田，雖懸崖絕嶺，樹木盡仆，俟其乾且燥，乃行火焉。火尙熾，即以播種之。然後釀黍稷，烹雞豚。先約曰：某家某日有事于畬田。雖數百里，如期而集，鋤斧隨焉。至則行酒啗炙，鼓噪而作。蓋劚而掩其土也。掩畢，則生亦不復耘矣。援桴者有勉勵督課之語，如歌曲然。且其俗，更互力田，人人自勉。

下面是畬田詞的一首：

北山種了種南山，相助力耕豈有偏？願得人間皆似我，也應四海少荒田。

一是四川的例，另一是陝西的例；無論如何，農耕上的互助即鋤社性合作，都保存在當時的記錄裡。

（四）

農民的作業歌（包括秧歌）多和互助勞動相伴，我從這個事實出發，把互助勞動的實例探求到宋代。不過大部分對於秧歌一節或其他歌唱事項，都沒有提到。因此我們雖然承認歌唱多與互助勞動相伴，在共同作業之際採用的，但不能反過來斷定互助勞動是常伴歌唱的。雖然如此，我總認爲秧歌的本質和鋤社的本質在過去有密切關係，前者對於後者發生重要的作用；下節說明鼓鑼與互助勞動的關係及鼓鑼歌唱對農耕作業的作用，聊充旁證。農耕上相互扶助的時候，常常擊鼓鳴鑼，這是我們所要注意的第二點。

農耕上相互扶助時用鼓的例，已見眉州遠景樓記和小畜集的畬田詞。查王楨的農書中，有一幅插圖叫做薅鼓，說明欄引宋曾氏的薅鼓序原文道：

薅田有鼓，自入蜀見之。始則集其來，既來則節其作，既作則防其所以笑語而妨務也。其聲促烈清壯，緩急抑揚，而無律呂。朝暮曾不絕響。

薅是除草的意思，不消說了。所以薅鼓一定是在用裏耘草的時候擊打的。州縣志方面，如湖北來鳳縣志說：

四五月耘草。數家共趨一家，多至三四十人。一家耘畢，復趨一家。一人擊鼓，以作氣力，一人鳴鉦，以節勞逸。隨耘隨歌，自業音節。謂之薅草鼓。

這種情形的薅草鼓是薅鼓的遺風，我想是無疑的。

耘草擊鼓的例子，陝西洵陽縣志、湖北長陽縣志等書也可見到吧。不過耕墾、播種、插秧之際，也使用鼓鑼，始見於眉州遠景樓記及小畜集，前引湖北宜恩縣志、湖北蘄水縣志、湖北黃岡縣志、四川巴州直隸志、廣東新語、粵遊小識等書也都載明的；無論插歌時，或耘草時，或耕墾時，鼓鑼是同歌唱一樣使用的。鼓鑼與歌唱的使用，現在有一類似之點；即據記載，互助勞動未必伴着鼓鑼，反之，鼓鑼多與互助勞動爲伴，在共同作業中敲擊的。從陝西洵陽縣志、湖北長陽縣志、湖北宜恩縣志、湖北蘄水縣志、湖北黃岡縣志、四川巴州直隸志、廣東新語、粵遊小識等書看來，鼓鑼是常與歌唱伴用的。

（五）

根據以上的說明，我們知道了：在中國，農耕上的互助從古就實行，這是第一點；這些互助，有用鑼鼓的，有用歌唱的，更有鑼鼓與歌唱併用的。那麼在農耕的時候，鑼鼓及歌唱負有什麼樣的任務呢？

據湖北來鳳縣志說，擊鼓是爲了作氣，鳴鉦是爲了節勞；據陝西洵陽縣志、湖北蘄水縣志、湖北黃岡縣志等書，擊鼓是爲了督工。又眉州遠景樓記說：設置一個掌鼓的人，使進退作止都跟着他；曾氏薅鼓序也說：集合、始業及其他行規，一聽鼓的指揮。從這些說明看來，鼓鑼的目的與作用，是使勞動有節奏，忘其疲勞，這是明白的。

關于歌唱，也有同樣的情形。陝西洵陽縣志說：「歌唱忘疲」，四川巴州志說：「使耕者忘其疲，以齊功力」，四川新津縣志說：「取其并力忘勞」，都是指此；湖北長陽縣志說：「擊鼓鑼歌唱，節勞逸」，湖北蘄水縣志說：「擊鼓作歌，以相督」，湖北黃岡縣志也說：「鼓歌相催督」，都是說明鼓鑼歌唱有同一的作用。總結起來，在共同作業中演出鼓鑼與歌唱，它們的任務幾乎相同；第一點是使勞動者在行動上保持有秩序的均衡，第二點是使他們忘却疲勞。

對勞動給與規律與統一，使忘却疲勞，這對于提高勞動效率帮助很大，不消說了。鼓鑼歌唱担任着一種重要的任務，原來是勞動娛樂化。廣東新語與粵語小說有「鼓歌競作」的話，又湖南永定縣志說：

農家力作，鼓歌並出，極其歡暢。有擊壤之風。

四川大寧縣志說：

四月……鄉農有貧不能東作者，比鄰約期助工；……以二人鳴金鼓，唱山歌娛之，工作益奮。曰打薅草鑼鼓。頗有助恤之風。

這樣看來，鼓鑼歌唱有刺激勞動者的競爭心，鼓舞他們的精神，樂於勞動的作用，可以無疑吧。勞動的娛樂化，對于勞動的效率當然有重大的影響。上引大寧縣志所謂「鳴金鼓，唱山歌娛之，工作益奮」，就因這個緣故。勞動娛樂化，其本身對于農民的生活也具有很大的意義。那麼，鼓鑼與歌唱多行於互助勞動即勞力交換的時候，是什麼道理呢？這是因爲勞力的交換，是跟着多數人的共同作業的。

農耕上的互助，普通行於近鄰。眉州遠景樓記有所謂「數十百人爲曹」，可以想見村人全體進行協力作業

馬恩列斯論婚姻和家庭

吳家麟輯

一、論婚姻形態底發展
二、論資產階級底家庭
三、反對『一杯水』理論
四、論離婚自由
五、論婦女解放
六、論新社會底婚姻和家庭

一、論婚姻形態底發展

（一）『一開始就插入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第三層關係，是每天要重新製造自己生命的人，開始製造別的人，繁殖。這種夫婦之間、父母與兒女之間的關係即是家庭。』（馬克思、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識形態』）

（二）『要是家族組織上底頭一個進步，是在於除去親子相互的性的關係，那末，第二個進步便在於除去姊妹和兄弟的性的關係。這一進步，由於參加者底年齡的更加相等，比第一個進步要重要得多，但也困難得多。這一進步是逐漸實現的，大概先由性的關係中除去同胞兄弟和姊妹（即母方的）開始的，起初是在個別場合之下，以後漸成為慣例，終於到了甚至禁止傍系間的結婚，用現代的稱謂說，即禁止同胞兄弟姊妹底子女、孫子及曾孫間的結婚；照摩爾根說，這一進步可以作為「自然淘汰原則是在怎樣發生作用底最好例解。」凡用這個進步辦法限制血緣相姦的部落，其發展一定要比那些依然把兄弟姊妹間的結婚當作慣例且為習慣所要求的部落更加迅速、更加完全，這是毫無疑義的。』（恩格斯：『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三聯書店譯本，三九——四〇頁）

（三）對偶家族發生於矇昧與野蠻之間的境界上，大半是在矇昧底最高階段上，在個別場合之下只是在野蠻底最低階段上。這是野蠻時代所特有的家族形態，正如羣婚之於矇昧時代，一夫一妻制之於文明時代一樣。』（恩格斯，前引書五五頁）

（四）『這樣我們便有了三種主要的婚姻形態，在大體上這三種家族形態是與人類發展底三個主要階段相適應的。羣婚是跟矇昧時期相適應的，對偶婚是跟野蠻時期相適應的，補充以通姦與賣淫的一夫一妻制是跟文明時期相適應的。在對偶婚與一夫一妻之間，在野蠻底上期，因男子有女奴隸在手中，遂出現了一夫多妻制。』（恩格斯，前引書七八頁）

（五）『說似乎在社會發展初期女性曾為男性奴婢的意見，乃是我們十八世紀啓蒙時代所繼承下來最荒謬的觀念之一。在一切矇昧人及處在野蠻最低階段、中級階段乃至部分地最高階段的一切野蠻部落中間，女性不僅有自由，而且居於大受尊敬的地位。』（恩格斯，前引書五〇頁）

（六）『母權制底顛覆，乃是女性底全世界歷史的失敗。丈夫掌握了家中的管理權，而婦女失掉了她榮譽的地位，變為僕役、丈夫淫慾的奴婢及生兒育女底簡單的工具了。』（恩格斯，前引書五九——六〇頁）

（七）『一夫一妻制是在大量財富集中於一人之手——並且是男子之手，——底結果，及由依據繼承權而將這種財富傳給這一男子底子女，而不傳給他人底子女之必要所發生的。為了這，則需要妻方面底一夫一妻制，而非男子方面底一夫一妻制，因為，這種妻方面底一夫一妻制決不致妨礙丈夫底公開的或秘密的一夫多妻制。』（恩格斯，前引書七九頁）

（八）『一夫一妻制家族與對偶家族差異的地方，就在於婚姻的約束更來得堅固持久，此種關係已不能由某方任意解除了。這時通例已是只有男子可以解除婚約，離棄他的妻。男子的通姦權，這時至少已為習慣所保證（拿破崙法典曾確定地給丈夫以這種權利，祇要他不帶情人到家中來，）而且隨着社會的進一步的發展，這種權利也愈行得廣；如果妻記起了從前的性的實踐而想恢復它時，那末她就要受到前所未曾有過的嚴酷的刑罰。……奴隸制與一夫一妻制底並存，受男性完全支配的年輕美貌的女奴隸底存在，從一夫一妻制開始之日起，就給了它以一種特殊的性質，使它只是對婦女底一夫一妻制，而不是對男子底一夫一妻制。即到了今日，它還保存着這個特性。』（恩格斯，前引書六五——六六頁）

（九）『我們從古代最開化最發達的各民族探討起來，一夫一妻制的起源，便是如此。這決不是個人性愛底結果，並且是與它全無關係的，因婚姻依然還是以前權衡利害的婚姻。一夫一妻制不是以自然條件為基礎，而是以經濟條件為基礎，即以私有財產戰勝原始的自然生長的共有財產底勝利為基礎。頭一個家族形態，丈夫在家中的支配權與子女底生育（子女只能出於他且須繼承他的財產）——這便是希臘人所公開承認的個人婚姻底唯一目的。……

這樣看來，個體婚姻，在歷史上決不是為和解男女而出現的，更不是當作最高的婚姻形態而出現的。反之，它表示一性底被另一性所奴役，表示以前的全部歷史上所未知的兩性相互仇視底宣佈。在馬克思和我於一八四六年所合寫的一篇舊的未刊的底稿中，我發見了如下的一句話：「最初的分業是為生產子女的男女之間的分業。」現在我可以附加幾句：頭一個在歷史出現的階級底對立，是與個體婚姻中夫妻間的對抗底發展相一致的，而最初的階級壓迫是與男性對女性的奴役相一致的。個體婚姻乃是一個巨大的歷史的進步，但同時與奴隸制及私有財產制並存，它卻開闢了那一直繼續到今日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任何進步都同時表示相對的退步，都表示一些人幸福與發展是用別一部人的苦痛與抑壓底代價以購得的。它是文明社會底細胞，我們根據這種細胞，便可以研究文明社會內部正在完全展開的對立與矛盾

而來的，是野蠻期中期及後期之間的一個產物，它的最後成功，也就是社會文明期開始的標幟之一。它以丈夫的最高權威為基礎，其明顯的目的即在生養一些有明確父系的子女，使他們在適當時候，以天然繼承人的資格，繼承父親的財產。一夫一妻制的家族和對偶婚的區別，乃在前者約束更較嚴格，這種約束，雙方嗣後就無從任意地把它消毀。但一般地講，男子卻可以消毀這約束，而對於婚姻不忠實的權利祇有男子享受着。甚至現在還有某種習慣保障着這種權利（例如拿破崙法典明定：祇要丈夫不帶情人到家，便可以准其有外遇之權）。社會一步步發達，這種權利的行使也一天一天發達起來」。恩格斯又說：「這種婚姻是社會發展史中第一種婚姻的形式，它不是以自然條件為基礎而是建築在經濟條件上的，它建築在私有財產戰勝了原始的、自然的，共同財產的事實上的」。

當然，人類從雜婚到個體婚，在那時情況下，無疑是一種進步的現象。女子為獲取解放而犧牲她們一部分性的要求，卻換來了貞操，這主要是女子的功勞。但因為私有財產的發展，和家庭男女分工的結果，丈夫的責任既在獵取食物和施用必要的勞動工具，於是也就取得了這種東西的私有權。跟着對偶婚即轉變為一夫一妻制，母權制家族也被推翻了。丈夫在家中掌握了一切的所有權，婦女則變成家庭服役的簡單工具。

這樣，「丈夫便成為有產者，妻則成為無產者。」而且，因為家事的處理，也使妻子喪失了她的社會地位。終於也就完全脫離了社會生產。

從社會的發展看，婦女降至今日的地位，這是她的片面的犧牲。也可以說，從她把社會生產中所佔有的地位讓給她丈夫以後，這是必然會發生的結果。這是私有財產發展後，社會再分工時所不能避免的現象。但當這種關係經社會把它制度化，美麗化，歌頌讚揚，或點綴上了貞節牌坊以後，女子本身就再沒有能力從中掙扎出來。除非我們整個地把舊生產關係推翻，把整個封建制度消滅，這種不合理的制度勢將永存在下去。至於這種制度的具體表演為納妾、重婚、買賣、包辦、童養媳、不再醮、溺嬰、墮胎、自殺、「謀殺親夫」，那是十分悲慘的後果。所以婦女解放，顯然不是單純地禁絕這種具體的現象可以足夠做到的，我們還必須向整個舊生產制度作戰爭，庶幾能幫助婚姻原則推進一步，這也就是革命的任務了。

所以說婦女解放的尺度，就是解放全民族的尺度，也就是這個道理。我們推翻封建的婚姻制度，實際上就是打擊了封建本身最重要的一環。這也是推翻封建之理論的實現。

現在稍微舉幾個數字吧！以我們最近調查統計所得，例如關於離婚，上海在解放後，我們看到七十七件案件，女方聲請離異的佔七十件，哈爾濱八十六件，佔八十一件，比之兩處離婚案件總數的百分計，女方聲請離異的，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至於原華北解放區，女方聲請的，也佔了百分之八一強。北京市則佔了百分之六十一強。婦女要求婚姻的自由，從解放以來，無疑是十分迫切地在提出來。我們想一想這是什麼緣故呢？

至於離婚原因，統計材料很明確地告訴我們：最主要的是封建包辦、買賣、強迫等情況所造成的婚中感情不合。因為有着這種原因的感情不合，乃又引起了通姦、重婚、虐待、自殺等情事，這顯然都是從一個基本原因發端的。在中國廣大的農村裏，尤其在許多沒有經過土改的地區裡，買賣子女是常事，她們被弄來生養孩子，傳宗接代，或者服勞役，侍公婆，受盡種種的虐待。又因為經濟的壓迫和封建社會所要求的是男孩子，便有墮胎溺嬰等現象。中國婦女們最大的困難是沒有經濟上的獨立生產能力，這倒不是因為她們本身上有什麼弱點，主要的還是因為從生下地，以至結婚生孩子，死亡，婦女們是始終在封建的生產關係中掙扎着生命。在他們的一生裡，幾乎沒有片刻喘息的機會讓她們站起來掙脫社會的枷鎖。

資產階級對於這個問題是沒有提出任何解決辦法的能力的。雖則隨着資本主義的到來，在路德卡爾文新教思想的提倡下，居然揭出了意志平等，契約自主的命題。但自由契約的因素滲入了婚姻關係，有沒有把問題弄清楚呢？一些也沒有。跟着契約觀念同時到達婚姻範疇裡的，是商品交換的本質。商品買賣是一般契約的原動力，但把這商品化的契約概念套在婚姻關係上，婚姻關係依然脫離不了社會經濟所已經替它決定的基礎。形式上換了一套，婚姻卻依然是階級的婚姻。

在另一面，資本主義一步步發展，勞動力市場天天擴大了，因此女子離和以往不同，又有了和社會生產取得聯繫的機會。但她的新矛盾也隨着產生。為要爭取發展自己生產力的自由，在資產階級社會的矛盾之下，婦女又得犧牲另一種生產力之發展的自由：她得自己決定究竟是否應該停止生養孩子。於是她不是抱着決心做老處女呢，就得用人為的方法摧殘自己的生殖可能，但是這個犧牲是何等痛苦呀！

可笑的是國民黨反動派政府六法全書裡的親屬法，這部法律一面仍然維護了階級婚姻，置中國百分之九十的整個農村男女於不顧；一面抄襲了許多西洋資本主義社會的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空話，同時卻替姦淫雜婚開放了後門。在封建性的買賣包辦和資本主義的買賣包辦雙重壓迫之下，中國的婦女簡直似進了迷陣。「女子苦命呀」的呼聲，繼續不斷的回盪在各城鄉鎮村之中。反之，對照着南京、重慶、上海各地的荒逸淫亂。美軍的集體強姦，大腿戲的一幅幅圖畫出現於社會：因此，「女子往那裡走呀」？每個人都這樣問着。

但在最衰頹的情境中，卻發展了最進步的因素，前進的婦女們作了革命的先鋒隊，跟着人民解放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終於解放了。現在放在面前的任務是：推翻舊的生產關係和發展新的生產力。但要把全國人民從帝國主義的、封建的、官僚資本的剝削制度下拯救出來，佔全國人民一半的婦女，自己謀得解放，是最重要的任務。毛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早已指出：「中國的女子除了受封建的政權，族權，和神權支配之外，還受着封建的夫權的支配」。這也是一個原因為什麼決定了土改。土改的成功乃解決了農村婦女的經濟立場，現在新婚姻法的頒佈，更把婦女解放的任務推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八條不是說嗎：「夫妻有互愛互敬、互相幫助、互相扶養、和睦團結、勞動生產、撫育子女，為家庭幸福和新社會建設而共同奮鬥的義務」，這種任務是艱鉅的。但在彼此地位平等的原則之下，婦女們第一次獲得了物質的基地，她們第一次可以憑愛情、憑自由，選擇她們自己所喜悅的伴侶。女子愛情的純正性決定了男子愛情的專一性。從女子的自由裡，男子同樣獲得了自由。在這樣的幸福的空氣之中，中國男女偉大的生產力自可全部解放出來，新社會的建設就可以進行無礙。

恩格斯說：「結婚的完全自由，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和由它所造成的財產關係消滅，而把那在今日選擇配偶尚有巨大影響的一切經濟動機除去之後，才能達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新婚姻法是有把握把我們帶到這個境地去的。

（四）『革命需要羣衆，需要人物的集中，力量的緊張。它不能容忍頹廢的英雄們所處慣了的酗酒荒淫的狀態。性生活的無節制，這是屬於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解體的徵兆。無產階級是上進的階級，他用不着喝得酩酊大醉，藉此來昏迷自己，刺激自己；它需要清醒、清醒，再加上清醒。所以我再重複的說，不應該再削弱、浪費並消失絲毫的力量。自制與自律，並不是受束縛，就是在愛情上也需要這樣。』（列寧，與蔡特金的談話）。

四、論離婚自由

（一）『並且，那由一夫一妻制從財產關係發生一事而加於它（一夫一妻制）的特徵，亦即第一、男子底支配與第二、婚姻底不可離異性，都要因一夫一妻制而無形地消失了。男子在婚姻上的支配權衹不過是他的經濟支配底結果，故它本身隨着後者的消滅而消滅了。婚姻底不可離異性，是半由於一夫一妻制於以發生的經濟地位底結果，半是這種經濟地位與一夫一妻制底聯繫在被宗教所曲解的觀念中尚未清楚理解的時代之傳統。到了今日，這種不可離異性已經大受破壞了。如果道德的婚姻只是根據愛情的婚姻，那麼惟有戀愛繼續存在的婚姻，才是這種婚姻。不過，各人，尤其是男性的强烈的個人性愛底持久性，是人各不同的。要是感情已經完全消失或由新的熱烈的戀愛把它排擠的話，那麼離婚，無論對於雙方或對社會，都是幸福了。只要把人們從無益的離婚訴訟的泥污中拯救出來就好了。』（恩格斯：『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八七頁）

（二）『就拿離婚問題來說吧。盧森堡在她的論文中寫道，中央集權制的民主國家雖完全可與個分部份自治相容，但它應當把最重要的立法工作，包括關於離婚問題的立法工作，留歸中央國會處理。這樣關心用民主國家底中央政權來保障離婚自由，是完全正確的。反動份子反對離婚自由，號召大家「小心對待」它，而且大聲叫喊，說離婚自由就是「家庭瓦解」。而民主派則認爲，反動份子是有意作僞，其實是擁護着警察官僚專橫，擁護男性享受特權而女性遭受最難堪壓迫的情形；其實離婚自由並不會使家庭關係瓦解，而恰巧會使這種關係在文明社會中唯一可能的堅固民主主義原則基礎上鞏固起來。

罵擁護自決自由，即分立自由的人爲鼓勵分離主義者，也如罵擁護婚離自由的人爲鼓勵破壞家庭關係者一樣愚蠢，一樣虛僞。在資產階級社會裡，只有擁護資產階級婚姻所賴以支持的特權和買賣性的人，才會反對離婚自由，同樣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否認民族自決，即民族分立自由，就不過是擁護統治民族特權和警察管理手段，反對民主制度。』（列寧：『論民族自決權』，『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一卷八四六頁）

五、論婦女解放

（一）『婦女底解放，只有在婦女大量地，社會規模地參加生產事業，而家中工作僅佔有她們很少工夫的時候，才是有可能的了。要使這有可能，只有在現代大工業之下才行，現代大工業不但允許大規模的婦女勞動，而且正面要求婦女勞動，日益力謀把家庭的私人勞動變爲社會的工業。』（恩格斯：『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一七六頁）

（二）『凡使女性操作得要比我們所想像者更多的民族，對於女性的眞正尊敬，實比我們歐羅巴人來得厲害。在文明時代，人們雖對太太小姐們予以外表的尊敬，使她們跟一切實際的勞動隔離，但是文明時代底太太小姐們比起辛苦勞動的野蠻時代的女性來，實處於無限低下的社會地位中；後者在本民族中被視爲眞正的貴婦人（Frowe, Lady, Mistress），而就她們地位性質說來，也確是如此。』（恩格斯，前引書五一——五二頁）

（三）『要吸引勞動羣衆參加政治，如果不吸引婦女參加政治，那是不可能的。因爲在資本主義之下，佔人類半數的女性，是受着雙重地壓迫的。工農婦女受着資本的壓迫；但是更甚於此的，甚至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中，第一，她們仍是處在毫無權利的地位，因爲法律不給她們以與男子平等的權利；第二，這是最最主要的，婦女是處在「家庭的奴隸制」中，他們是家庭的奴婢，她們被那些最瑣碎、最卑微、最辛苦、最使人愚笨的廚房工作及一般單個的家務所壓碎。

布爾塞維克的蘇維埃革命，就深深地剷除了婦女的被壓迫和不平等之根源，世界上任何一個政黨或任何一次革命都沒有敢這樣摧毀過這種根源。在我們蘇維埃俄羅斯，在法律上，婦女與男子不平等的痕跡，連一點兒都沒有遺留下了。那在婚姻與家庭權利上特別下流、特別可鄙、特別虛僞的不平等，那在對小孩關係上的不平等，已經被蘇維埃政權所澈底消滅了。

這只是婦女解放底第一步罷了。但是沒有一個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即使是最民主的也罷，曾敢於採取這樣的第一步。他們之所以不敢作，是因爲顧慮到「神聖的私有財產權」。

第二個步驟，同時也是最主要的一個步驟，便是土地、工廠、作坊私人所有制度廢除。這一點，而且惟有這一點，才能給完全而眞正的婦女解放，——由瑣碎的、單個的家庭經濟，轉變爲大規模的社會經濟，而把她們從「家庭的奴隸制」之下解放出來，開闢一條道路。』（列寧：『國際勞動婦女節』，一九二一年三月）

（四）『在婦女從事於家務之下，她們的地位始終是受壓迫的。要使婦女達到完全解放、和男性的眞正平等，則需要社會經濟，需要婦女參加一般的生產勞動，那個時候婦女將會站到同男性同樣的地位。』（列寧：『蘇維埃共和國女工運動的任務』，一九一九年）

（五）『至於集體農莊對於婦女的作用與意義，應當記着集體農莊女莊員自己，她們應當記着她們衹有在集體農莊裡面才有可能獲得與男子平等的地位。沒有集體農莊就沒有平等；而在集體農莊裡面就有男女平權。請集體農莊女莊員同志們記着這一點，請她們要愛護集體農莊制度。』（斯大林，一九三三年在第一次全蘇聯集體農莊突擊隊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列寧主義問題』五五九頁）

（六）『我現今已經五十六歲了，我看過各種的面相，看過多多少少的勞動男女，可是我還沒有遇到這樣的婦女。這完全是新人物！只有自由勞動，只有集體農莊的勞動才能在農村裡生長出這樣的勞動女英雄。這樣的婦女是過去時代所沒有的，而且不會有的。

在實際上，假使想一想，婦女在以前的舊時代是怎樣一種情形呢。在女孩子時代，她被認爲是勞動者中間的末等貨。她在父親身旁不停手地工作，但是父親還是罵她，說是「我養活了你的」。當她出了嫁，她就在丈夫身旁作工，丈夫叫怎麼做就怎麼做。但丈夫也是照樣罵她：「是我養活了你的」。農村婦女是勞動者中間的末等貨。很顯然的。在這種條件之下，農婦中間不會產生勞動女英雄。那時候勞動被女子認爲可咀咒的東西，她盡力迴避着勞動。

惟獨集體農莊生活才能使勞動變成尊貴的事業，惟獨這種生活才能在農村裡產生出眞正的女英雄來。惟有

底性質了。』（恩格斯，前引書六八——六九頁。）

（十）『不論在那一種場合之下，婚姻都是兩方底階級地位來決定的，所以往往便弄成了權衡利害的婚姻了。這種權衡利害的婚姻，在兩種場合之下，便往往變爲最公開的賣淫了——有時是雙方的，而以妻方面爲更普遍。妻與平常娼婦不同之點，只是在於不像僱傭的女工，一度地出賣肉體，却是當作奴隸而永遠出賣的。傅立業（Fourier）底兩句話，可應用於一切權衡利害的婚姻，他說：「如在法文上，兩個否定成爲一個肯定一樣，在婚姻倫理上，兩種賣淫則構成一種美德了。」只有在被壓迫階級中間，從而今日在無產階級中間，性愛對於婦女才能成爲規則，事實上也確是如此，至於這種關係是否得到公認，則可不論。』（恩格斯，前引書七五頁）

二、論資產階級底家庭

（一）『資產階級，到處在它得到統治的一切地方，破壞了封建的家長制度的醇樸的關係。它無情地撕碎了那些把人們束縛於「天然尊長」的複雜的封建網絡，它使人與人之間，除了赤條條的利害關係與冷酷的「現金交易」之外，再沒有別的什麼關係了。……

資產階級扯掉了家庭關係底動人的一多情的紗幕並使之變爲純粹的金錢關係。』（馬克思、恩格斯合著：『共產黨宣言』，解放社譯本，二二—二三頁）

（二）『消滅家庭！就是極端的急進派也在憤恨着共產黨人底這種可惡的意圖。

現代資產階級的家庭是建築在什麼東西之上的呢？建築在資本之上，建築在私人贏利之上。家庭底充分發展的形態，只在資產階級中才存在着；可是它是在無產者底被壓迫的無家庭狀態與公娼中找到了自己的補充。

跟着它的這種補充底沒落，資產階級家庭將自然地沒落，兩者都跟着資本底消失而一同消失。』（『共產黨宣言』四六頁）

（三）『無產階級中的一切家庭聯繫，由於大工業的發展而愈益趨於破毀，兒童愈益轉成簡單的買賣對象與勞動器具，資產階級關於家庭、教育以及父母與兒童親密關係等等論調便也愈益令人發嘔。』（『共產黨宣言』四七頁）

（四）『但是，你們共產黨人要實行公妻呵，—全體資產階級齊聲向我們叫喊着。

資產階級把自己的妻子看做簡單的生產工具。他聽到生產工具是要供共同使用的，於是，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婦女也要落到同樣的命運。

資產階級甚至想不到，問題是在於消除婦女成爲簡單生產工具的那種地位。

附帶說，我們的資產者對於他們所臆造的共產黨人似乎要實行公開的公妻底這一點表示高尚道德的驚訝，這眞是再可笑也沒有的了。共產黨用不着來實行公妻，它差不多永遠存在着。

我們的資產者並不因爲有共工人底妻女供其支配而感到滿足，更不用說公開的娼妓制度了，他們還以互相引誘彼此的妻子爲特殊的快樂。

資產階級底婚姻在實際上是公妻制。他們最多只能非難共產黨人說他們想把公開的率直的公妻制去代替僞善地隱蔽着的公妻制。可是，顯而易見的，跟着現存的生產關係底消滅，從這生產關係中所發生的公妻，即公開的與不公開的娼妓制度，也便會消滅。』（共產黨宣言』，四七—四八頁）

（五）『依照資產階級的見解，婚姻是一種條約，是一種法律契約，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種契約，因爲它決定了兩個人終身的肉體及精神底命運。故在當時，這種契約在形式上確是自願締結的；沒有當事者底同意，它是不能成立的；不過，這一同意底結果如何，誰在實際上締結了婚約，人人都是非常明白的。』（恩格斯：『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八四頁）

（六）『在婚姻關係上，即最進步的法律，只要當事兩方在形式上證明了他們的自願的結婚，也就十分滿足了。至於在現實生活進行的地方，在法律背景後面情形如何，這種自願的同意底結果如何，關於這些，法律及法律家都可置而不問了。』（恩格斯，前引書七六頁）

（七）『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好似說得很動聽的「民主主義者」和知識份子，似乎爲金錢而出賣於合法婚姻的女子好像是有愛情的妻子。不論這種或那種都是簡單的不同形式的禮節，實際上，都是公開的賣淫。』（列寧：『國會和俄國自由主義者』，一九〇七年）

（八）『大工業把舊家庭組織的經濟基礎及與此相應的家內勞動推翻時，是連帶把舊家庭關係也推翻了。』（馬克思：『資本論』，三聯書店譯本，第一卷四〇〇頁）

三、反對『一杯水』理論

（一）『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失敗，使革命的同路人陷於瓦解和腐化。這種腐化和頹廢情緒在智識界中間顯得特別厲害。……反革命勢力在思想戰線上也大舉進攻。有一羣時髦作家湧現出來，實行「批評」和「譴責」馬克思主義，辱罵革命，譏笑革命，讚美叛變行爲，藉口「崇拜個性」而鼓吹淫亂。』（『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一二七頁）

（二）『靑年對性生活問題瘋狂的態度，不用說，甚至是「原則地」根據理倫的。

許多人都把自己的態度叫做「革命的態度」，「共產主義的態度」。他們眞在想，這個問題就是這樣。這不使我老年人感到興趣。雖然我絕不是陰沉的禁慾主義者，但對於所謂靑年（常常也是壯年人的）「新的兩性生活」，在我看大都是純粹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妓院的變相，這簡直和我們共產主義者所理解的那種自由戀愛沒有絲毫相同之點。當然，你知道有一種有名的理論，說在共產主義社會裏面，滿足性愛的要求，是像喝一杯水那樣的簡單和平淡。由於這個「一杯水」理論，我國的靑年變成了瘋狂，簡直完全變成了瘋狂。這個理論造成了許多靑年和處女的壞命運。信奉這種理論的人，武斷說這個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謝謝這樣的「馬克思主義」。

我以爲有名的「一杯水」的理論，根本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甚至是反社會的理論。表現在性生活上的不僅是人類的本性、而且納入了人類的文化，文化會有高尚或卑劣。……豈有一個正常的人處於正常的情形之下，在街上踩個泥窪，而從泥窪裏去喝水嗎？或者在幾十副嘴唇都沾過邊沿的杯子上去喝水嗎？但是最重要的却在社會的一方面。喝水，實際上是個人的事情，可是愛情却包含兩個人，而且要產生第三個新生命來。這兒就牽涉到全社會的利益，並發生了對於集體關係的責任。』（列寧，一九二〇年和蔡特金女士的談話，見蔡特金著『回憶列寧』）

（三）『共產主義不是要人們去修道，而是要給人們愉快生活和勇氣，並由此以引起充分的友愛生活。可是照我看來，現在常看到的兩性生活，不是給人們以生活愉快和勇氣，而是相反的，減少愉快和勇氣。』（列寧，和蔡特金的談話）

是全國國民的眞正代表。這些學者把國家和政府分開，以爲國家是一種目的而政府才是一種手段。好像國家除了以政府來維護發展利益以外，還有些別的事可作似的。這種看法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是不值一笑的。

有着馬列主義武器的人，都明確知道國家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是人類社會到一定階段必然產生而到另一一定階段又必然消滅的東西。它不代表「全民」而只代表某一定的或某些一定的階級。他們認爲國家和政府就是一個東西，都是某一或某一些階級爲了壓迫其他階級所採用的手段。

這兩種對國家概念截然不同的看法就形成了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間對於國際公法某些基本原則的分歧。

例如國家的繼承問題，資產階級的學者們認爲一個國家的政府以國家名義所訂立的國際義務（如國際債務，國際條約等），不因該政府的被推翻而宣告無效，新政府應該代舊政府起而負責。這就是舊國際公法上最有名的國家繼續性原則（Principle of state continuity）。他們的理由是：國家代表全體國民，以國家名義所負的國際義務該國全體國民都應該負責。縱使政府形式有所改變，但是構成國家三要素的人民，領土，主權却沒有絲毫改變，換句話說，這個國家的本質沒有改變。因此那些國民對於原有的國際義務在新政府之下應和在舊政府之下一樣地負責。這種從保障資產階級既得利益的動機出發用國家政府分立論來掩護的舊國際法規定，蘇聯是不能同意的。

蘇聯認爲國家永遠只是統治階級的國家，在廣大人民未取得政權以前，少數統治者以國家名義所担負的任何有害人民的國際義務，只有那些統治者才應負責而廣大人民是不受其約束的。因此蘇聯主張：所謂「國家繼承」只發生於一個政府（國家）的改變不影響於這個政府（國家）階級本質的場合。它認爲一個國家的是否改變，不是看這個國家的人民領土主權有否改變，而是看這個國家的階級內容有否改變。如果是一個國家的被壓迫階級經過革命取得了政權，那麼舊有的「國家繼承」的原則就不能完全適用。因爲這時候舊的國家已經被打碎了，代之而起的是新的國家，後者對於前者應負的國際義務是不負任何責任的。

根據這個理論，蘇俄政府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八日的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決定廢除帝俄所訂的一切密約。翌年一月二十八日蘇俄中央政府又宣佈取消帝俄所負的一切債務。蘇俄的理由在它於一九二二年向日內瓦會議所提的備忘錄中可以看到。它說：

「在拒絕接受前政府的義務並拒絕滿足那些因國內政策而蒙受損失的人們底要求上，蘇維埃政府的所以這樣做，並不是因爲它不能或不欲担負那些義務，而是基於原則性和政治的需要。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完全摧毀了所有舊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關係，把俄國的政權轉交給一新的不同的階級。這樣，就破壞了所有義務的繼續性，這些義務只有對於已經消滅的階級之經濟生活才是必要的。」

但是我們千萬不要以爲蘇聯這種做法是純然出諸自私自利的動機。它敢這樣勇敢地背叛舊國際公法中反動的規定是爲全世界勞動人民的解放着想的。蘇聯知道全世界人民大翻身的日子就要來了，而那些帝國主義國家又一定會利用「國際義務」來壓迫那些新國家的人民，因此它就甘作先鋒，爲全世界被剝削的人民在國際公法上創下了擺脫舊鐐銬的先例。

事實證明蘇聯確是一個「已所不欲弗施於人」的國家，它在擺脫自已鐐銬的時候，也帮助別人擺脫他們的鐐銬。因此它不但廢除了帝俄所訂的秘密條約，並且自動放棄了帝俄在他國所享有的帝國主義特權 。它自己拒絕負担帝俄的一切債務，也主張那些自帝俄分立而出的國家不負担帝俄的任何債務（根據舊國際公法的規定，一子國自其母國分立而出的時候，該子國必須負担母國的一部分債務，但蘇聯在一九二〇年和波羅的海各國所訂的條約中都明白規定這些自帝俄分出的國家不應担負帝俄的債務。）

出乎若干人意料以外的是：蘇聯在一九二三年成立時曾公開表示它願承担加入蘇聯的各加盟共和國的一切國際義務。舊國際公法規定一國併入他國或數國合組一聯邦時，併存國（Annexing state）或聯邦對於併入國（Annexed State）或分子國（member States）在合併前或聯合前所負有的國際義務，是可以不繼承的，但蘇聯却不這樣做。一九二三年蘇波衝突中蘇聯曾明白宣稱它願負担蘇俄與烏克蘭兩加盟共和國在聯邦成立前與波蘭所訂的里加條約上的一切義務。

蘇聯爲什麼願意承担舊國際公法不要它承担的國際義務呢？原因是那些加盟共和國在未加入聯邦前就已經是由人民掌握政權的國家了。他們所簽訂的條約是眞正代表全體國民意志而應由全體國民共同負責的，因此與他們加入聯邦時，其國際義務也就發生繼承的情形。蘇聯堅信勞動人民必須忠實於自己所肩負的義務，所以對於勞動人民經由自己的政府所承担的國際義務是信守不渝的。連邱吉爾都不能不承認「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政府能比俄國蘇維埃政府更確實地，甚至於有損自己地，履行自己的義務」（邱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在英議會中的演說）。

從上述蘇聯對國家繼承問題的看法中，我們可以認識到無產階級大公無私的國際主義精神。它對於統治階級所負的國際義務堅決拒絕繼承，但對於其他加入蘇聯的國家底無產階級所負的國際義務則願意繼承，因而就發生了舊國際公法上應該繼承的不繼承，不必繼承的却反願意繼承的情形。在資產階級的學者看來這是相當矛盾的，但從無產階級的立場看來，這正是我們所以偉大的地力。

（三）國家的承認問題

其次，和舊國家觀念密切聯繫着的是國家和政府的承認問題。國際法上「承認」的制度，近百年來已經變成爲舊統治階級壓制新興革命力量的武器。根據舊國際公法的說法，一個新國家或新政府之是否可以被承認，須看這個新國家或新政府是否願意繼承舊國家或舊政府的國際義務而定。因此許多帝國主義國家就以「承認」與否作爲要挾的手段，迫使新的國家和新的政府對他們保證他們在這個國家領土上的一切既得利益可以繼續合法地存在。而一切甚楚薄弱的新國家和新政府，爲了急欲得到國際的「承認」來鞏固自己的地位，也就不得不向帝國主義者們屈服。於是獨佔資本家們在國外的投資就鞏如泰山而萬世不斷。

把「承認」的手段運用到最極端的是美國。它不但用它來保障它在國外的既得利益，並且進而用它來干涉他國的內政。例如拉丁美洲的各國，都是政變和內亂最常發生的地方，而美國獨佔資本家們在那些國家中又都有着鉅額的投資和種種的特權。因此每當其中一國發生內亂和政變時，美國政府就分別和競爭的雙方講價錢，看這兩羣火拼的資本家地主官僚集團的那一個願意給美國資本家更大的便利和更多的特權，美

集體農莊能消除不平等，使婦女站直身子。關於這，你們知道得很清楚了。集體農莊實施了工作日，所謂工作日是什麼呢？在工作日面前，不論男女一律平等，誰工作日做得多，誰就得的多，這裏不論父親，不論丈夫，一概不能罵女人說是他養活她的。現在的婦女，只要她勞動，她有工作日，她自己就是個女主人。我想起在第二次集體農莊會議上曾經和幾個女同志談過話，其中有個北方區來的一位女同志說：

「兩年以前，沒有一個求愛的青年願在門頭向我望一眼的。不過是個沒有嫁妝的姑娘！現在我有了上五百個工作日，但是情形怎樣呢？多少求愛的人推都推不開，但我還要瞧一瞧，我將自己來選擇求愛的人。」

集體農莊用工作日來解放婦女，使她們獨立。她們現在已不像在女孩子時代在父親身旁作工，也不像出嫁以後在丈夫身旁做工，她們唯一就是為自己作工。這就是農婦解放的意義，就是造成勞動婦女同一切勞動男子平等的集體農莊制度的意義。』（斯大林，一九三五年對甜菜集體農莊女突擊隊員的談話）

六、論新社會底婚姻和家庭

（一）『資產階級在歷史上給予家庭以資產階級家庭的性質，在這種家庭裏苦悶和金錢是相聯繫的環節，屬於這種家庭的還有資產階級的家庭分化，但這不妨害家庭本身繼續存在。』（馬克思、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識形態』）

（二）『舊家庭組織在資本主義制度內的瓦解，雖顯得可怕並可厭，但因大工業曾在家庭組織範圍之外的社會組織的生產過程中，給與婦女和少年男女兒童以極重要的位置，故又為家庭及兩性關係的較高的形態，創造了新的經濟基礎。』（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四〇〇頁）

（三）『當前的社會革命，至少把牢固的傳授的財富—生產手段—底無限大的部分轉化為社會的財富，將這種遺產傳給何人的顧慮減少至最少限度。然而，一夫一妻制既是由經濟的原因而發生的，那麼當這種原因消滅的時候，它是不是也要消滅呢？

可以不無理由地答道：它不僅不消滅，反之，而且只有那時要充分實現的。隨着生產手段底轉化為社會的財產，而僱傭勞動、無產階級、以及若干婦女—在統計上是可以算得出的—為金錢而獻身的必要，都要歸於消滅了。賣淫消滅了，一夫一妻制不是終止其存在，而對於男性最後也成為現實了。

這樣一來，男子底地位，不論如何，大起變化。即在婦女底地位上，在一切婦女地位上也要發生很大的轉變。隨着生產手段底轉化為社會的財產，個體家庭也不復是社會底經濟單位了。私人的家庭經濟變為社會的產業。孩子底照管及其教養成為一種社會的事情；社會對於一切兒童，無論是合法的或是私生的，都同等地加以養護。……

在這裡，一個新的要素，即個人的性愛；開始發生作用了，這個新的要素到一夫一妻制發展的時候只是一種萌芽而已。』（恩格斯：『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七九—八〇頁）

（四）『今日的性愛，與單純的性底欲望，與古代底戀愛之神（Eros）在本質上大有區別。第一、它是以戀愛者底互愛為前提的；因之，婦女與男子是處在平等的地位，而在崇拜愛神底古代，是決不徵求婦女的同意的。第二、性愛有着這樣強烈性與持久性，即在這種強烈性和持久性之下，在雙方看來，不能得到對手以及與對手分離都是一件大不幸，雖不是最大的不幸；……』（恩格斯，前引書八一頁）

（五）『這樣，結婚底完全的自由，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與由它所造成的財產關係底消滅，把那在今日對選擇配偶尚有巨大影響的一切經濟旨趣除去以後，才能達到的。到那時候，除了相互的愛好之外，再也沒有別的動機存在了。』（恩格斯，前引書八六頁）

（六）『這樣，我們現在關於當前資本主義生產消除以後兩性關係形態所能推想的，主要是屬於消極的性質，大都限於正在消滅着的東西。但是出現什麼新的東西呢？這取決於新的世代長成的時候：男性的一生，再不須用金錢或其他社會權力底手段去買得婦女；女性除了真實的愛情以外，再不須為了其他某種刺激而委身於男子，或因害怕經濟的結果而拒絕委身於她們所愛的男子。』（恩格斯，前引書八七頁）

（七）『工人階級是不會滅亡的，卻正在增加着，堅強着，勇猛着，且要在鬥爭中堅固地團結起來，鍛鍊得更有教化更為剛強。我們對於農奴制度，資本主義和小生產完全是悲觀論者；但是對於工人運動和他們的目的則是熱烈的樂觀論者。我們已經奠定了新建設的基礎，而我們的小孩將完成這個建設。

為什麼？—正因為這個，我們便是新馬爾薩斯人口論者無條件的敵人，這種學說祇可給小市儈夫婦，他們是吝嗇的，利己的，他們驚天驚狂地糊塗地祈求着：上帝，我們自己尚且不能保持，小孩再也不需要了。』（列寧：『工人階級和新馬爾薩斯人口論』，一九一三年）

蘇聯對國際公法的偉大貢獻

薛謀洪

（一）序論

十月革命以後，蘇聯這個嶄新國家對於國際公法的態度是全世界人類所關心的問題。無疑義的，國際公法這個東西在當時完全是舊時代，特別是資本主義時代的產物，它在許多地方和馬列主義的學說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很多人都以為新俄國將不要國際公法了，（尤其在蘇俄做了若干次大胆而公然違反舊國際公法規定的行為以後，這種說法更為普遍。）但是三十二年的歷史證明蘇聯並沒有完全否認國際公法，相反地它卻負起了改造國際公法的責任，使得基於資產階級狹隘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的舊國際公法逐漸變成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相結合的新國際公法。

下面我想把蘇聯對於國際公法的若干最重要的貢獻分別地作簡單的敘述。

（二）關於國家的繼承

在國際公法中最基本的一個概念就是國家。舊國際公法的學者們認為：國家是人民、領土、和主權的混合物，是人類永不可少的一件東西，而不論在任何場合，它都

實把比較空泛的主權觀念具體化，並使其生氣蓬勃起來。

民族自決的原則資產階級的「學者」和「政治家」也常常提到，威爾遜在一九一八年還把它列爲他的十四原則之一。但是事實上資產階級却從來沒有把它忠實地履行過，因爲這個原則是和資本家剝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階級利益正相衝突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那一次巴黎和會，就完全是帝國主義者瓜分殖民地的會議。連威爾遜的「祖國」，在威爾遜死後的三十年也還在肆無顧忌地侵犯弱小民族的利益和主權。

只有馬克思主義者才眞正把擁護民族自決權。在一九一四年，列寧出版了他的名著「論民族自決」，堅主任何民族有國家分立權，贊助波蘭的獨立，並痛斥盧森堡等人的機會主義傾向。在列寧這本著作刊印的前一年，斯大林也發表了他一篇論文「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認爲「世界各國社會民主黨主張民族自決權，自決權是意味着只有民族自身才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誰也沒有權利來用強迫手段干涉這一民族底生活，毀壞它的學校及其他機關，破壞它的風俗習慣，拘束它的語言，削小它的權利……。自決權是意味着民族能按自己意志來佈置本族生活，它有權按自治原則來佈置本族生活。它有權去與其他民族發生聯邦關係。它有權完全分立出去，每個民族都有自主權，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社會民主黨的民族自決權而奮鬥，是要把民族壓迫政策消滅是要使這種政策再沒有立足的餘地，以便毀壞各個民族互相鬥爭的根基，使這個鬥爭減弱下去，使這個鬥爭減少到最低限度。」

蘇維埃政府本着列斯的指示，把民族自決的原則貫澈到蘇聯的外交和內政裡去，使國際公法摸糊不清的一些關於民族自決的紙面文章，不但在理論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而且在實踐中眞正地被體現出來。在十月革命後不久，它就允許俄國境內的許多民族宣告獨立，到一九二三年，這些民族中的若干個又在平等自願的基礎上結成了蘇聯。在這個聯盟中，各加盟共和國的主權是日益鞏固着。蘇聯的憲典保證：「加盟共和國均有自由退出蘇聯之權」，「加盟共和國的領土非經他們自己同意不得變更」，「加盟共和國的主權僅受憲典第十四條所定範圍限制，在此範圍以外，每一加盟共和國均得獨立實施其國家主權，他們的主權，蘇聯皆得保護之，」及「每一加盟共和國均得顧及該加盟共和國的特殊情形並完全適應蘇聯憲典而制定該加盟共和國憲典。」第二次大戰勝利以後，蘇聯又決定：一、「每一加盟共和國均有權與外國發生直接關係，與之成立協定，互換外交代表，與領事」；及二：「每一加盟共和國均得編制本共和國軍隊」。蘇聯這種做法不僅沒有導向民族不和或削弱各個加盟共和國間的聯繫，而相反地，它保證了加盟共和國間友好和牢不可破的合作。由此可見主權觀念如果和國際主義結合起來，透過民族自決的方式，完全可以達到國際公法所要達到的目的。它和國際公法不但不互相衝突，而且是應該彼此密切聯繫着的。

至於各國間的平等互助，在國際公法上也是一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可是儘管文字上口頭上這樣說，要帝國主義者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談平等互助是絕對不可能的。就以國民黨所訂的中美商約爲例，在表面上好像它是基於平等互助的原則而簽訂的，可是誰也不能否認在骨子裡頭它是澈頭澈尾的不平等條約。

那些破壞國家平等權最厲害的國家，現在正在鼓吹一種平等，就是聯合國內投票權的絕對平等。他們想用票數來壓倒人民民主陣線，而把聯合國當作他們奴役世界的工具。因此美國一方面曾嗾使澳州古巴之流的國家出來大唱廢除否決權的謬論，另一方面又在一九四七年的聯大中導演了小型聯大的醜戲。

蘇聯勇敢地指出英美這種平等的虛僞性，它認爲聯合國憲章的基本精神就在於大國一致的原則，這和國際和平之是否能夠永久維持與國際公法之是否能夠正確實施有極密切的關係。斯大林曾經說過：「機合國的力量即在於它是建立於各國平等原則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某些國家統治其他國家的原則之基礎上」。如果安理會在決定有關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最重要的問題時，只追求「多數之原則」以實現「各國投票權的平等」，那麼在聯合國中就必然形成某些國家統治其他國家的現象（因爲單只美國一國，在聯合國中就絕對地掌握了二十票，而這二十票所代表的國家其總人口且不及蘇聯一國的人口）。爲了防止這種以假平等破壞眞平等的陰謀，蘇聯堅決捍衛五強的否決權。正如維辛斯基所說，五強的否決權是和這些強國維持普遍和平保障聯合國一切大小會員國的利益而担負的特別責任完全符合的。」

國際法上的所謂平等，就是反對任一國家在他一國家領土上有任何政治上軍事上或經濟上的特權。但是過去資產階級的國際法學者們却爲這個平等的原則設立了許多「例外」。他們說爲；領事裁判權在一般「野蠻國家」中是必要的，設置保護國和統治值民地是國際法所允許的，爲幫助「合法政府」進行內戰而干涉該國內政是合乎國際法規定的。他們用這些「例外」來爲帝國主義者的破壞國家平等辯護。

只有蘇聯堅決擁護各國家各民族平等的原則。它在十月革命以後即自動宣佈放棄帝俄在各國所取得的不平等特權。它贊助各被壓迫民族的獨立，並極力反對他國的干涉內政。它和許多國家訂立了友好互助條約，宣佈「締約國雙方應互相尊重獨立，主權，及互不干涉他國內政之原則」，並和那些國家訂立商約，在眞正平等互利的基礎上交換貨物。蘇聯的這些做法在國際外交史上是第一次體現了大國與小國間平等合作的精神。

蘇聯自己以平等對待各國人民，也反對其他任何國家以不平等對待他國人民。因此在聯合國中蘇聯痛斥英美在前盟國的領土上駐軍和建立軍事基地，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和英美干涉希臘內政，提議美蘇兩國共同自朝鮮撤兵，（它且自動地先行自北朝鮮撤退）並紛碎英美設立巴爾幹調查團干涉東南歐人民民主國家內政的企圖。蘇聯認爲任何違反平等原則破壞他國獨立損害他國主權的違反國際公法底行爲，都是不能忍受的。

總之，國際公法既不應用來作爲資產階級隨心所欲的玩弄工具，而是爲了維護國際和平與增進國際友好合作，那麼它就應該和主權觀念密切結合起來，而其結合方式則是本着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承認民族自決，與國際平等。在這一方面蘇聯有過具體的事實表現與正確的理論基礎。這是它對於國際公法的偉大貢獻。（未完）

本刊歡迎：批評、投稿、訂閱。

國就承認那一個集團爲「合法政府」。而那兩個集團都想得到美國的靠山來壓倒對方，因此就競相拍賣自已的國家，想博取美國的青睞，於是乎美國就利用他國內亂的機會，「靈活通用」自己承認的手腕，以達到保障擴大美國國外權益的目的。

十月革命以後，帝國主義國家想用同樣的辦法來壓制蘇俄，但結果是失敗的。他們威脅蘇俄說如果蘇俄不願繼承帝俄所担負的一切國際義務，他們將拒絕承認蘇維埃政府。但蘇俄對此置之不理。結果不是蘇聯屈服，而是帝國主義者屈服了。就是最反動的美國，在拖延十五年以後，也終於在一九三三年承認蘇聯。帝國主義者不但撈不到一點油水，却碰到了一鼻子灰。

在一九三〇年曾有墨西哥外長厄斯吐那達（Senor Extrada）因憤於美國的以「承認」干涉墨西哥內政，提出了國際公法上有名的厄斯吐那達原則（Extrada Doctrive）。他主張此後墨西哥政府將放棄承認的觀念，對於新國家或新政府的建立，不作承認與不承認之表示，而只作建立外交關係與否的決定。厄氏此項主張爲英美的國際公法學者所一致抨擊。事實上，墨西哥政府也並沒有堅持Extrada的提議。

把厄斯吐那達原則加以改造，然後具體地予以實踐的是蘇聯。蘇聯認爲承認的觀念對於某些政府還可以適用。它的理由是這樣的：國際公法的所謂承認，是允許一個國家的政府和其他國家的政府建立外交關係的一種手續，這種手續對於某些政府來說是必要的。因爲這些政府要以代表本國人民的名義對外發生關係而在事實上它們並不代表本國人民。因此在和這些政府建立外交關係以前，不得不對它作一法律形式上的假定。假定它們有對外發生關係的能力。這種假定就是承認。

反之，在社會主義國家或人民民主國家，人民已經掌握了政權。政府是代表全國人民的政府，是當然地可以用代表全體人民的名義和外國政府建立外交關係的。所以這些國家就無須乎經過承認的手續。對於這些國家，承認的觀念是不適用的。

因此，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蘇聯給我國的照會中只說到「確信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是絕大多數中國人民意志的代表者，故蘇聯政府決定建立蘇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外交關係並互派大使。」最近蘇聯在給越南政府的覆文中也只說「蘇聯考慮到越南民主共和國代表越南人民壓倒多數，決定建立蘇聯和越南民主共和國間的外交關係。」在這兩個照會中蘇聯從未提到「承認」的字樣，因爲蘇聯認爲對這兩個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與存在，是不發生承認不承認的問題的。蘇聯這種作法已爲各新民主國家所一致效法。無疑義的，這對於國際公法將有很大的影響。

至於蘇聯對於印尼合衆國成立的態度是完全不同的，上個月二十五日維辛斯基給印尼的照會中說「由於向印尼共和國移交主權的儀式已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海牙舉行，蘇聯政府特決定承認印尼合衆共和國爲獨立與主權國家，並建立外交關係。」我們把這個照會把和兩個照會對比一下，就可以明顯地看出蘇聯對國際公法的靈活而又合理的運用。它並不認爲印尼合衆共和國代表印尼人民。所以它和印尼在建立外交關係以前，需要經過「承認」的形式，假定印尼合衆共和國爲獨立與主權國家。這一假定是基於另一種儀式（即荷蘭向印尼移交主權的儀式）而來的。而其目的在使蘇聯得以透過外交方式和帝國主義在印尼的陰謀作鬥爭。

（四）國家主權

此外，我還想談一談國家主權的問題。國家主權是國際法上的一個基本原則，然而過去在理論上它始終爲資產階級國際公法學者所曲解，而在實際上又不斷爲資本主義國家所破壞。

國際公法上的主權原則是在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民主革命的過程中形成的。在這一段資本主義的上升時期，正也是國際公法有顯著發展的時期，所以國家主權原則乃成爲舊國際法中最主要的命題之一。資產階級是利用這一原則來反抗羅馬教皇和神聖羅馬帝國的。但是等到自己革命成功，確立了自己的「民族主權國家」以後，却漸漸反轉來破壞這個原則。

近半世紀來，許多資產階級的國際公法學者都認爲主權觀念是阻礙國際公法向前進步的原因，因此他們竭力鼓吹各個國家放棄他們的主權觀念來擁護國際公法，這種說法的可笑，是無與倫比的。作這樣主張的人有兩種，一種是些愚蠢的傢伙，看不到問題的本質和眞相，另一種則是些狡猾的騙子，想歪曲事實來爲獨佔世界資本家的奴役全世界服務。

如果說主權原則和國際公法的發展發生衝突，那不是因爲主權原則要不得，而是由於有些人把主權觀念和狹隘民族主義或世界主義聯繫起來的緣故，翻開一部近百年史，我們可以發現無數次國家主權被犧牲的例子，而其犧牲者則絕大多數是些弱小的國家。那些侵略者們只看到自己的『主權』，而忽視了（或故意蔑視了）別人的主權。他們要破壞別人的主權來滿足自己的『主權慾』。這就是資產階級損人利己的本質。因此他們或是藉口走失兵丁而發動了侵略戰爭（如日本的發動九一八和七七）或是藉口官兵失縱而實行武裝「報復」（如意大利的掀起一九二三年的科夫事件）。他們把芝蔴大的事誇張爲自己的主權受損害，因而就做出了對他國主權大加破壞的行爲，而在做過以後，他們還要援引舊國際公法來爲自已的行爲辯護。從這些歷史的事實看來，今天的問題絕不是要弱小國家放棄主權原則，而是如何加緊尊重這些弱小國家主權的問題。

英美的「學者」和「政治家」們，現在還是天天在叫囂着主權原則和國際法的不能配合。英國前外長艾登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廿二日的議會演說中，認爲「我看不見有另外一種方法足以保障世界不受原子彈的破壞，除了放棄我們目前對於主權的概念以外。」補充艾登的是他的繼任者貝文，他主張「建立一個由全世界人民直接選舉出來的世界大會，各國政府對它負責，並由它頒佈世界法律，隨着這一大會的成立，國際法本身即將消滅，它將被世界法所代替，而各個國家的主權，亦將爲整個全人類的主權所代替」。這種世界主義的露骨主張，使我們認識到英美帝國主義者們極方主張放棄主權的眞正動機在那裡。

事實上，使主權原則和國際公法對立起來的不是別人，就是這些「學者」「政治家」們所代表的帝國主義者。他們最近又主張主權原則應從屬於國際「合作」，國際機構，和國際公法，其目的不外乎要利用聯合國的投票機器，舊國際公法中的若干反動規定，和馬歇爾計劃之類的東西來奴役其他國家的人民，破壞其他國家的主權。他們知道主權原則是和他們所夢想的世界主義不相容的，所以他們要誣蔑牠，消滅牠。

起來保衞主權原則，使它成爲新國際公法底中心支柱的，是蘇聯。它認爲放棄主權概念，也正如放棄民族獨立與自由的其他法律保證一樣，始終是利於强國而不利於弱國的。因此，它不但勇敢地捍衞主權的基本原則，並且用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來充實它，實踐它，使它結出了「民族自決」和「各國平等互助」的果實。這兩個果

實把比較空泛的主權觀念具體化，並使其生氣蓬勃起來。

民族自決的原則資產階級的「學者」和「政治家」也常常提到，威爾遜在一九一八年還把它列爲他的十四原則之一。但是事實上資產階級從來沒有把它忠實地履行過，因爲這個原則是和資本家剝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階級利益正相衝突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那一次巴黎和會，就完全是帝國主義者瓜分殖民地的會議。連威爾遜的「祖國」，在威爾遜死後的三十年也還在肆無顧忌地侵犯弱小民族的利益和主權。

只有馬克思主義者才眞正把擁護民族自決權。在一九一四年，列寧出版了他的名著「論民族自決」，堅主任何民族有國家分立權，贊助波蘭的獨立，並痛斥盧森堡等人的機會主義傾向。在列寧這本著作刊印的前一年，斯大林也發表了他一篇論文「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認爲「世界各國社會民主黨主張民族自決權，自決權是意味着只有民族自身才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誰也沒有權利來用強迫手段干涉這一民族底生活，毀壞它的學校及其他機關，破壞它的風俗習慣，拘束它的語言，削小它的權利……。自決權是意味着民族能按自己意志來佈置本族生活，它有權按自治原則來佈置本族生活。它有權去與其他民族發生聯邦關係。它有權完全分立出去，每個民族都有自主權，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社會民主黨的民族自決權而奮鬥，是要把民族壓迫政策消滅是要使這種政策再沒有立足的餘地，以便毀壞各個民族互相鬥爭的根基，使這個鬥爭減弱下去，使這個鬥爭減少到最低限度。」

蘇維埃政府本着列斯的指示，把民族自決的原則貫澈到蘇聯的外交和內政裡去，使國際公法摸糊不清的一些關於民族自決的紙面文章，不但在理論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而且在實踐中眞正地被體現出來。在十月革命後不久，它就允許俄國境內的許多民族宣告獨立，到一九二三年，這些民族中的若干個又在平等自願的基礎上結成了蘇聯。在這個聯盟中，各加盟共和國的主權是日益鞏固着。蘇聯的憲典保證：「加盟共和國均有自由退出蘇聯之權」，「加盟共和國的領土非經他們自己同意不得變更」，「加盟共和國的主權僅受憲典第十四條所定範圍限制，在此範圍以外，每一加盟共和國均得獨立實施其國家主權，他們的主權，蘇聯皆得保護之，」及「每一加盟共和國均得顧及該加盟共和國的特殊情形並完全適應蘇聯憲典而制定該加盟共和國憲典。」第二次大戰勝利以後，蘇聯又決定：一、「每一加盟共和國均有權與外國發生直接關係，與之成立協定，互換外交代表，與領事」；及二：「每一加盟共和國均得編制本共和國軍隊」。蘇聯這種做法不僅沒有導向民族不和或削弱各個加盟共和國間的聯繫，而相反地，它保證了加盟共和國間友好和牢不可破的合作。由此可見主權觀念如果和國際主義結合起來，透過民族自決的方式，完全可以達到國際公法所要達到的目的。它和國際公法不但不互相衝突，而且是應該彼此密切聯繫着的。

至於各國間的平等互助，在國際公法上也是一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可是儘管文字上口頭上這樣說，要帝國主義者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談平等互助是絕對不可能的。就以國民黨所訂的中美商約爲例，在表面上好像它是基於平等互助的原則而簽訂的，可是誰也不能否認在骨子裡頭它是澈頭澈尾的不平等條約。

那些破壞國家平等權最厲害的國家，現在正在鼓吹一種平等，就是聯合國內投票權的絕對平等。他們想用票數來壓倒人民民主陣線，而把聯合國當作他們奴役世界的工具。因此美國一方面曾嗾使澳州古巴之流的國家出來大唱廢除否決權的謬論，另一方面又在一九四七年的聯大中導演了小型聯大的醜戲。

蘇聯勇敢地指出英美這種平等的虛僞性，它認爲聯合國憲章的基本精神就在於大國一致的原則，這和國際和平之是否能夠永久維持與國際公法之是否能夠正確實施有極密切的關係。斯大林曾經說過：「機合國的力量即在於它是建立於各國平等原則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某些國家統治其他國家的原則之基礎上」。如果安理會在決定有關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最重要的問題時，只追求「多數之原則」以實現「各國投票權的平等」，那麼在聯合國中就必然形成某些國家統治其他國家的現象（因爲單只美國一國，在聯合國中就絕對地掌握了二十票，而這二十票所代表的國家其總人口且不及蘇聯一國的人口）。爲了防止這種以假平等破壞眞平等的陰謀，蘇聯堅決捍衞五強的否決權。正如維辛斯基所說，五強的否決權是和這些強國維持普遍和平保障聯合國一切大小會員國的利益而担負的特別責任完全符合的。」

國際法上的所謂平等，就是反對任一國家在他一國家領土上有任何政治上軍事上或經濟上的特權。但是過去資產階級的國際法學者們却爲這個平等的原則設立了許多「例外」。他們說爲；領事裁判權在一般「野蠻國家」中是必要的，設置保護國和統治殖民地是國際法所允許的，爲幫助「合法政府」進行內戰而干涉該國內政是合乎國際法規定的。他們用這些「例外」來爲帝國主義者的破壞國家平等辯護。

只有蘇聯堅決擁護各國各民族平等的原則。它在十月革命以後即自動宣佈放棄帝俄在各國所取得的不平等特權。它贊助各被壓迫民族的獨立，並極力反對他國的干涉內政。它和許多國家訂立了友好互助條約，宣佈「締約國雙方應互相尊重獨立，主權，及互不干涉他國內政之原則」，並和那些國家訂立商約，在眞正平等互利的基礎上交換貨物。蘇聯的這些做法在國際外交史上是第一次體現了大國與小國間平等合作的精神。

蘇聯自己以平等對待各國人民，也反對其他任何國家以不平等對待他國人民。因此在聯合國中蘇聯痛斥英美在前盟國的領土上駐軍和建立軍事基地，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和英美干涉希臘內政，提議美蘇兩國共同自朝鮮撤兵，（它且自動地先行自北朝鮮撤退）並紛碎英美設立巴爾幹調查團干涉東南歐人民民主國家內政的企圖。蘇聯認爲任何違反平等原則破壞他國獨立損害他國主權的違反國際公法底行爲，都是不能忍受的。

總之，國際公法既不應用來作爲資產階級隨心所欲的玩弄工具，而是爲了維護國際和平與增進國際友好合作，那麼它就應該和主權觀念密切結合起來，而其結合方式則是本着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承認民族自決，與國際平等。在這一方蘇聯有過具體的事實表現與正確的理論基礎。這是它對於國際公法的偉大貢獻。（未完）

本刊歡迎：批評、投稿、訂閱。

國就承認那一個集團爲「合法政府」。而那兩個集團都想得到美國的靠山來壓倒對方，因此就競相拍賣自已的國家，想博取美國的青睞，於是乎美國就利用他國內亂的機會，「靈活通用」自己承認的手腕，以達到保障擴大美國國外權益的目的。

十月革命以後，帝國主義國家想用同樣的辦法來壓制蘇俄，但結果是失敗的。他們威脅蘇俄說如果蘇俄不願繼承帝俄所担負的一切國際義務，他們將拒絕承認蘇維埃政府。但蘇俄對此置之不理。結果不是蘇聯屈服，而是帝國主義者屈服了。就是最反動的美國，在拖延十五年以後，也終於在一九三三年承認蘇聯。帝國主義者不但撈不到一點油水，却碰到了一鼻子灰。

在一九三〇年曾有墨西哥外長厄斯吐那達（Senor Extrada）因憤於美國的以「承認」干涉墨西哥內政，提出了國際公法上有名的厄斯吐那達原則（Extrada Doctrive）。他主張此後墨西哥政府將放棄承認的觀念，對於新國家或新政府的建立，不作承認與不承認之表示，而只作建立外交關係與否的決定。厄氏此項主張爲英美的國際公法學者所一致抨擊。事實上，墨西哥政府也並沒有堅持Extrada的提議。

把厄斯吐那達原則加以改造，然後具體地予以實踐的是蘇聯。蘇聯認爲承認的觀念對於某些政府還可以適用。它的理由是這樣的：國際公法的所謂承認，是允許一個國家的政府和其他國家的政府建立外交關係的一種手續，這種手續對於某些政府來說是必要的。因爲這些政府要以代表本國人民的名義對外發生關係而在事實上它們並不代表本國人民。因此在和這些政府建立外交關係以前，不得不對它作一法律形式上的假定。假定它們有對外發生關係的能力。這種假定就是承認。

反之，在社會主義國家或人民民主國家，人民已經掌握了政權。政府是代表全國人民的政府，是當然地可以用代表全體人民的名義和外國政府建立外交關係的。所以這些國家就無須乎經過承認的手續。對於這些國家，承認的觀念是不適用的。

因此，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蘇聯給我國的照會中只說到「確信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是絕大多數中國人民意志的代表者，故蘇聯政府決定建立蘇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外交關係並互派大使。」最近蘇聯在給越南政府的覆文中也只說「蘇聯考慮到越南民主共和國代表越南人民壓倒多數，決定建立蘇聯和越南民主共和國間的外交關係。」在這兩個照會中蘇聯從未提到「承認」的字樣，因爲蘇聯認爲對這兩個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與存在，是不發生承認不承認的問題的。蘇聯這種作法已爲各新民主國家所一致效法。無疑義的，這對於國際公法將有很大的影響。

至於蘇聯對於印尼合衆國成立的態度是完全不同的，上個月二十五日維辛斯基給印尼的照會中說「由於向印尼共和國移交主權的儀式已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海牙舉行，蘇聯政府特決定承認印尼合衆共和國爲獨立與主權國家，並建立外交關係。」我們把這個照會把和兩個照會對比一下，就可以明顯地看出蘇聯對國際公法的靈活而又合理的運用。它並不認爲印尼合衆共和國代表印尼人民。所以它和印尼在建立外交關係以前，需要經過「承認」的形式，假定印尼合衆共和國爲獨立與主權國家。這一假定是基於另一種儀式（即荷蘭向印尼移交主權的儀式）而來的。而其目的在使蘇聯得以透過外交方式和帝國主義在印尼的陰謀作鬥爭。

（四）國家主權

此外，我還想談一談國家主權的問題。國家主權是國際法上的一個基本原則，然而過去在理論上它始終爲資產階級國際公法學者所曲解，而在實際上又不斷爲資本主義國家所破壞。

國際公法上的主權原則是在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民主革命的過程中形成的。在這一段資本主義的上升時期，正也是國際公法有顯著發展的時期，所以國家主權原則乃成爲舊國際法中最主要的命題之一。資產階級是利用這一原則來反抗羅馬教皇和神聖羅馬帝國的。但是等到自己革命成功，確立了自己的「民族主權國家」以後，却漸漸反轉來破壞這個原則。

近半世紀來，許多資產階級的國際公法學者都認爲主權觀念是阻礙國際公法向前進步的原因，因此他們竭力鼓吹各個國家放棄他們的主權觀念來擁護國際公法，這種說法的可笑，是無與倫比的。作這樣主張的人有兩種，一種是些愚蠢的傢伙，看不到問題的本質和眞相，另一種則是些狡猾的騙子，想歪曲事實來爲獨佔世界資本家的奴役全世界服務。

如果說主權原則和國際公法的發展發生衝突，那不是因爲主權原則要不得，而是由於有些人把主權觀念和狹隘民族主義或世界主義聯繫起來的緣故，翻開一部近百年史，我們可以發現無數次國家主權被犧牲的例子，而其犧牲者則絕大多數是些弱小的國家。那些侵略者們只看到自己的『主權』，而忽視了（或故意蔑視了）別人的主權。他們要破壞別人的主權來滿足自己的『主權慾』。這就是資產階級損人利己的本質。因此他們或是藉口走失兵丁而發動了侵略戰爭（如日本的發動九一八和七七）或是藉口官兵失縱而實行武裝「報復」（如意大利的掀起一九二三年的科夫事件）。他們把芝蔴大的事誇張爲自己的主權受損害，因而就做出了對他國主權大加破壞的行爲，而在做過以後，他們還要援引舊國際公法來爲自己的行爲辯護。從這些歷史的事實看來，今天的問題絕不是要弱小國家放棄主權原則，而是如何加緊尊重這些弱小國家主權的問題。

英美的「學者」和「政治家」們，現在還是天天在叫囂着主權原則和國際法的不能配合。英國前外長艾登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廿二日的議會演說中，認爲「我看不見有另外一種方法足以保障世界不受原子彈的破壞，除了放棄我們目前對於主權的概念以外。」補充艾登的是他的繼任者貝文，他主張「建立一個由全世界人民直接選舉出來的世界大會，各國政府對它負責，並由它頒佈世界法律，隨着這一大會的成立，國際法本身即將消滅，它將被世界法所代替，而各個國家的主權，亦將爲整個全人類的主權所代替」。這種世界主義的露骨主張，使我們認識到英美帝國主義者們極方主張放棄主權的眞正動機在那裡。

事實上，使主權原則和國際公法對立起來的不是別人，就是這些「學者」「政治家」們所代表的帝國主義者。他們最近又主張主權原則應從屬於國際「合作」，國際機構，和國際公法，其目的不外乎要利用聯合國的投票機器，舊國際公法中的若干反動規定，和馬歇爾計劃之類的東西來奴役其他國家的人民，破壞其他國家的主權。他們知道主權原則是和他們所夢想的世界主義不相容的，所以他們要誣蔑牠，消滅牠。

起來保衛主權原則，使它成爲新國際公法底中心支柱的，是蘇聯。它認爲放棄主權概念，也正如放棄民族獨立與自由的其他法律保證一樣，始終是利於强國而不利於弱國的。因此，它不但勇敢地捍衛主權的基本原則，並且用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來充實它，實踐它，使它結出了「民族自決」和「各國平等互助」的果實。這兩個果

眉目清醒，系統分明，這可比以前簡化多了，對納稅人方便，對征收機關也方便。

（二）依所得額計稅的部份所採的稅率，按理應該用超額累進制，比較合乎科學，但是看起來，算起來，都較為複雜，不容易一下子看清楚。以今日一般工商業發展的程度來說，不必馬上就用超額累進，不如用全額累進的稅率，納稅人可以一目瞭然，純利達到多少數，就按什麼稅率來計算，也不用查計算表，也不用轉腦筋，就曉得所納的稅佔純所得的百分之幾，這可簡便多了。但是有人要講，用全額累進，豈不比超額累進的稅負加重了麼？不錯，有一點，但是條例所訂的稅率，根本不算重（有人主張最高稅率應為百分之五十），就是用全額累進，也沒有多大關係，可是合乎簡化的原則了。

（三）關於簡化稅制最關重要的節目，還是征收方法。按照理想，征收工商業稅，應該採用查帳制度。但在今日的中國，一談到查帳，商人感覺頭痛，稅局也感到棘手。換句話講，是繁苦，而不是簡便。現階段的工商業，既未全面發展到現代化，可以採用科學的會計制度，又因物價波動，幣值未臻穩定，免不了假帳的流行。這時如果採用全面查帳，不用說商人感覺麻煩，即在稅局方面，查了老半天，原來是假帳，眞是白費力氣；但是也不能完全不查，專靠民主評議，更不能專靠「自報實繳」。所以現行條例對於計算征收的方法，照顧全國，分別訂出四個方式，以便各地區斟酌實際情況，機動運用，在條例的第十八條，規定得很明白。這完全是根據「簡化」的精神。

說到這裡，有一點，要分別清楚，不可一概而論。所謂「簡化」，是為納稅人着想，而不是為稅務機關着想。對納稅人，要給他們省事，但是稅務機關自己，可不能怕費事。譬如最進步的罐頭製造，機器的這一端，趕進活牛，那一端出來罐頭，製品是簡得出奇，但是機器本身，可就複雜得出奇了。課稅的道理，也是一樣。要為納稅人求簡，而不是為稅局自己求簡。稅務機關要不怕費事，多方調查商況，統計稅源，各行業的資本周轉率、毛利率、開支率以及純益率，不憚繁勞的多方探索，備之有素，事前進行典型戶調查，事後進行抽查，應用「大數法則」，以求近似標準，所謂「標準計稅」（Standard Ratio）與舊時代的攤派，絕對不是一樣的。同時改良商帳，試用發貨票制度，準備種種查帳計稅的條件，一步一步的，朝着查帳的路子走，而不可無的放矢，一蹴而幾。現行條例的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七條的規定精神，即在於此。

（四）關於納稅的期限，在現行條例第十九、二十兩條，也有「簡化」的規定。有的可以合併征收，有的可以分期預繳。對於營業額計稅所得額計稅兩部份，如果趕到同一時期評議，而且數額不大，似可合併征收。如果稅額甚大，一下子拿不出來，則不如分期預繳之輕而易舉。為什麼光說預繳而不說緩繳呢？這又被支配於保障供給的原則．寧使提早納庫，而不可拖延滯納，這與通貨及時回籠，預防惡性膨脹，也有很大的關係。而且在所得計稅部份，並不是等到年終結帳的時候纔賺錢，而是隨着日月的進行，隨時把錢賺下，那麼，提早一些，分期繳納，於國於民，都是很便利的。

五

第五，從「合理負担」來看，現行工商業稅，也有幾個特點，要我們來認識。打算「實行合理負担」，要從許多角度來着眼。第一個是城市與鄉村的負担平衡，還在本文的第一段，已經說過。其次是工業與商業間的負担平衡，以至——大企業與小企業、座商與行商、行與行、戶與戶之負担平衡，都要作到合理的地步。

（一）關於工業與商業間的負担平衡，在現行條例的稅率與減征規定的條文中，都有相當仔細的考慮。一般的講，在稅負方面，是工輕於商，而在工業之中，製造必需品的廠商，又輕於製造非必需品的廠商。但亦不是凡工都輕，也不是凡商都重，例如出口商業的所得計稅，就可以減征百分之二十，比若干製造業還要輕。所謂「合理負担」之合理二字，該怎樣解釋呢？在主觀上要看納稅者的負稅能力，在客觀上要看國家建設的需要。

（二）納稅人所最關心的，是行與行、戶與戶之間的負担平衡。因為行與行、戶與戶之間，彼此瞭解的很清楚，他的買賣比我大，賺的比我多，為什麼納的稅比我少呢？這樣，他就感覺到負担的不合理了。如果都用查帳的方法，而且查的很確實，多有多拿，少有少拿，自然也沒有什麼不平。但在目前，不能驟用查帳，還得要用民主評議，即須眞能民主，作到合理，纔能獲致行與行、戶與戶之間的平衡。所以現行條例第二十三條，對於評議組織，特別重視，對全國各地稅局的指示，特別強調「各地稅局應與工商管理機關配合，早日改造舊公會、商會的組織，加強對這些組織的領導，使起協助征稅的一個橋梁作用。個別地區暫時沿用原有商人組織，但須更好、加強領導與教育。至使用民主評議，亦必須結合抽查、典型戶調查及側面調查，配合運用。」必須這樣作，纔能充實民主的成份，實行合理負担。

（三）還有一點，要注意，便是公營企業與私營企業之間的合理負担。全國稅政實施要則第八條規定「公營企業，一律照章納稅。」工商業稅暫行條例第一條規定「……不分公私企業……均依本條例之規定，征收工商業稅。」同條例第八條又規定「公營企業應納之工商業稅……應就地照征。」這就是說，公營企業並不能比私營企業享受優待而隨便免稅或減稅。這一點，非常重要，和過去時代，大有不同。在過去時代，只要是官辦，掛上一個國營的招牌，對於國課，便可以不負担。而所謂國營也者，不過操諸幾個豪門或官僚壟斷資本之手，他們享受了種種特權與方便，而且不納稅，這樣，私營企業又怎能和它們競爭呢？其結果，只有豪門資本的橫行，而民營企業則日即於窒息與毀滅！今天，可翻了身了，公營企業和私營企業，一樣納稅，使公私企業之間，得到稅負的平衡合理。從私營企業來講，大家同等負担，並不感受壓迫；從公營企業來講，也可以因納稅之故，作到經營的健全，實現經濟核算制的理想。

（四）最後還有一點，便是各地區之間的負担平衡。稅政實施要則第三條規定「全國各地所施行的稅政、稅種、稅目和稅率，極不一致；應迅速加以整理，在短期內逐步實施，達到全國稅政的統一。」工商業稅暫行條例第二十八條規定「本條例施行後，以前各地區對工商征稅之單行辦法……一律廢止。」這就是說，如果各地區施行着不同的稅種、稅率，這個地方有，那個地方無，那個地方低，這個地方高，在各地區之間，工商業者的負担，可就不平衡、不合理了，所以要統一，普遍推行舉國一致的稅法，這也是「實行合理負担」最重要的表現。

六

共同綱領的稅收政策所臚列的五個要點，相互之間，可能有些鑿枘。例如「保障供給」，和「照顧生產」有時不能合拍。為了增加收入，不免使生產多負担；為了繁

怎樣認識工商業稅（續）

崔敬伯

二

第二，根據人民政協共同綱領稅收政策的第二個原則——照顧生產的恢復和發展——來看現行的工商業稅，該有什麼認識呢？這要從以下兩點來分析：

（一）從稅率來看：現行工商業稅的稅率，分爲兩類，一個是「依營業額計算者」，另一個是「依所得額計算者」（條例第六條）。其依營業額計算者，又分甲乙兩項。甲項的稅率，按營業總收入額（亦即銷貨額）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這個稅率比過去時代，一點也沒有加重。但是在應用上，比過去可要合理的多。參照條例「附表一」分業稅率表甲項所列，按照行業性質，對於經濟生產所發生的作用，分爲五級，適用高低不同的稅率。例如機器製造業、麵粉製造業、紡織工業等，稅率只課百分之一，以次依行業性質，分課百分之一點五，百分之二，百分之二點五，至百分之三止。

乙項的稅率，按營業總收益額（亦即供給勞務或信用之行業所獲取的收益）百分之一點五至百分之六。這和過去時代一律課百分之四相較，對某些行業，高了一些，提高到百分之五或六，但是對許多行業，則又降低了，低到百分之三，百分之二點五，百分之二，以至百分之一點五。這也是按行業性質來分的，例如公用事業，只課百分之一點五，運輸業只課百分之二點五。至於略爲提高的部份，如銀樓業、娛樂業等，稅率爲百分之五，牙行業、房地產代理業等，稅率爲百分之六。有些地方反映對牙行經紀的收益額，課的太輕了，就是提到百分之八，都不重。但是對於牙行經紀，中間經手之流，要嚴密管理而不可單靠課稅，所以稍微提高一些，也可與合理負担相配合。

第二類是依所得額計算的稅率，自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按全額累進，分級計征。這個稅率，並不比過去時代高，而且對於分級的貨幣數額，規定由稅務總局或區管理局，可以按照物價的變動，作適度的調整。例如物價漲了，每一級距的貨幣數額，可以根據本條例的規定標準，比例提高，而稅率則仍是原訂的稅率，這麼一來，工商業者的稅負，就不致於加重了，這也是「照顧」原則的表現。

（二）從減征規定來看：現行條例第七條，就所得部份，專設減征的規定。主要意義，就是配合「生產的發展」，因爲工商業賺了純益（尤其是從事生產的工礦等業）除了公營的提成和私營的分紅而外，要爲次年度的擴大再生產，準備相當的設備資金及周轉資金，所以要從稅收政策上，予以減征，藉以照顧生產的發展。條例規定的減征，按照生產的性質和作用，分爲五項，戊項減征百分之十，丁項減征百分之十五，丙項減征百分之二十，乙項減征百分之三十，減征最多的，如甲項中的機器製造業、車船製造業之類，減到百分之四十，這是在過去時代所沒有的！而且在第七條的第二項，還要補充規定「凡經營對國計民生有特殊利益而爲右列各欵所未能包括者，得呈請中央人民政府分別酌予減征」，這可以說：照顧的更周到了。

此外關於合作事業應納的工商業稅，依照條例第九條的規定「其合於合作法之規定者，得酌予減免」，合作事業爲走向社會主義經濟最有力的成份之一，需要國家從課稅上，特別予以照顧。

三

第三，根據共同綱領稅收政策的第三個原則——照顧國家建設的需要——來看現行的工商業稅，該有什麼認識呢？這要從以下兩個方面來分析：

（一）我們要「照顧生產的恢復和發展」，是不錯的，但是，並不是一切的生產都要照顧，什麼應該照顧？什麼不必照顧？這就要以「國家建設的需要」爲標準了。我們要建設成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就該照着這個理想，來照顧生產。因此，我們最需要第一類機器製造業、礦冶業、電業及車船製造業，所以在所得計稅的部份，要給它們減征百分之四十。但是對於迷信品製造業，可就不必給它照顧了，不能恢復，沒什麼，不能發展，更沒什麼，因爲那不是我們國家建設的需要。（東南沿海一帶，許多居民，從事於迷信品的製造，而可以出口，換取外匯，以購買建設所需的器材，那可又當別論，在減征規定的丙項第五欵「出口貨物製造業」，可以減征百分之二十。）此外在營業額計稅部份，對於「分業稅率表」，所以分出高低不同的稅率，適用到性質不同的行業，也是根據「國家建設的需要」。

（二）以上所述的意義而外，另外還有一個意義，就是：因爲要照顧國家建設的需要，我們要盡其可能，在不妨害正當生產的範圍以內，採用「高度稅收政策」（High Tax Policy），這在蘇聯和若干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建設過程中，都有過這樣的經驗。因爲保障革命戰爭的供給，已經快到完成的階段了，跟着就是生產建設，同樣要憑着我們人民自己的力量，來保障供給。因爲建設資金的來源，第一個要靠着稅收，其次纔數到發行建設性的公債，和進行建設性的外國貸欵，此外如清理沒收物資，吸收海外僑匯，獎勵個人儲蓄，爭取貿易出超，也都是很有效的辦法，但是第一個辦法，還得要靠稅收。今天國家收稅，和過去時代專供寡頭揮霍者不同，並且也不是專供消耗性的行政開支，而是以絕大部份的稅收，投之生產與建設，那麼，我們就是採取「高度的稅收政策」，也合乎「國家建設的需要」。我們藉着稅收政策，將社會上散在多餘的資金很容易隨時浪費了的部份，集收到國家之手，轉入生產建設的途徑，分散着，效用小，集攏起來，效用可就大了。好比江河湖沼多餘無用的水分，藉日光之力，升騰爲雲氣，爲雨露，降落滋潤於田禾隴畝之間，助成更大的生產力，對於整個社會，應該是最有益的事。

四

第四，從「簡化稅制」來看，現行工商業稅，也有幾個特點，要我們來認識。

（一）現行工商業稅暫行條例，是把過去所實行的營利事業所得稅、營業稅、特種營業稅，行商稅以及攤販稅等分立的條例和辦法，綜括到一個稅法裏邊（臨時商業稅稽征辦法和攤販牌照稅稽征辦法，只是本條例的補充，其作用和施行細則一樣），

船中所佔成數，一九一四年爲百分之三・一〇，到了一九三八年就增加爲百分之五二・〇二了。茲列表如下：

全世界用油交通工具發達表：

工具種類	單位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三八年	增加數
使用中汽車數	百萬輛	二・〇	四二・九	二一・五倍
燒油之商用汽船	百萬登記噸	一・三	二〇・六	一五・八倍
商用摩托船數	百萬登記噸	〇・二	一六・九	八四・五倍
燒油船摩托船在全部商船中比例	噸數百分比	三・一〇	五二・〇二	

石油在戰時的消耗量，比平時要增加五倍至十倍以上，在現代機械化的戰爭中，石油已成爲決定勝負因素的主要條件之一，「沒有石油，是不能打仗的——斯大林說——誰能在石油生產上佔上風，誰就能在即將來臨的戰爭中握得勝利的機會」。蘇聯在第二次大戰中能夠擊敗希特勒法西斯匪徒，由於石油產量的豐富，起了一定的作用。

爲了國家工業化，我們必須開採石油，爲了鞏固國防，對付可能的帝國主義侵略，及保衛世界和平，更需要開採石油，還值得懷疑嗎？

三、帝國主義壟斷下的中國石油市場

當我們爲中蘇經濟合作而歡呼的時候，當我們爲國家工業化而奮鬥的時候，回憶起近百年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對人民的統治、壓迫、剝削、斷送了民族工業的生機，完全依存於帝國主義的情況，實不勝憤慨！專就石油來說，本國的石油礦藏無力開採，能開採的也操諸帝國主義之手，如東北鞍山撫順的油區解放前壟斷於日人，石油的供給，全仰給於國外的輸入，石油的輸入量，就等於我們的消耗量，其進口額，僅次於棉布和米粮，據二十年前的統計，幾達一萬萬兩之多：

石油輸入數量與價值表

年份	輸入額(桶)	價值(兩)
一九一二年	四、八五〇、〇六五	二五、二五一、五〇六
一九二一年	四、九二八、六〇九	六六、一八六、二七五
一九三一年	六、六五八、七一六	九四、六七一、六四二

其中以煤油數量最多，約計五百萬桶，價值佔總輸入百分之七十以上，汽油亦達百萬桶，機器油三四十萬桶，各種共計六百五十萬桶左右。最近一次統計，一九四六年僞政府公報石油進口數字：(一)汽油三五五、七五四公噸，(二)煤油二九二、九一八公噸，(三)柴油三三〇、六五九公噸，(四)滑物油六三、六五四公噸，合計一百萬公噸以上。

對華的石油進口，主要是給美國的美孚煤油公司和荷蘭的亞細亞油公司兩大托拉斯所壟斷的，而美國石油的輸華常佔第一位，以一九二八年的進口價值爲例：(一)汽油，美佔百分之四十一，(二)煤油，美佔百分之八十，(三)柴油，美佔百分之五十三，(四)滑物油，美佔百分之七十一。從下表中可以看出美國煤油和他國煤油在中國競銷的情形：

年份	美國煤油 數量(加侖)	美國煤油 價值(兩)	他國煤油 數量(加侖)	他國煤油 價值(兩)	總計 數量(加侖)	總計 價值(兩)
一九一二年	一二三、四四一、七七七	一四、一二七、一三二	七四、四六〇、五八五	一〇、七一八、六六九	一九七、九〇二、三六二	二四、八四五、八〇一
一九二八年	二三一、〇九七、二四五	五四、四四七、三二三	三一、六九五、三六四	七、九三八、五一二	二六二、七九二、六〇九	六二、三八五、八三五
一九三六年	一一八、一五七、四六一	五、三一二、七八九	二七七、一四三、五四六	一三、七〇一、六三二	三九五、三〇一、〇〇七	一九、〇一四、四二一

必須指出美孚和亞細亞兩大石油托拉斯在中國市場雖有着利害上的矛盾，然而他們常常是妥協的，合謀着來霸佔中國的石油市場，在輸入的數量上，銷售的價格上，都成立了默契，這不足爲奇，帝國主義在瓜分殖民地半殖民地市場時所採取的技倆就是如此，我們在上海石油躉售價值上，就得到證明：

油類	公司別	單位	價值(單位元)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三年第四季	平均數
汽油	美孚	五加侖	三、九三八	三、五〇〇	四、三三六
	亞細亞	五加侖	三、九〇一	三、五三〇	四、三三六
煤油	兩公司	十加侖	七、四九六	六、〇一三	六、一七四
柴油		噸	五九、二五四	七四、三〇〇	七四、三〇〇

四、中國的石油資源鳥瞰

石油的輸入額如此驚人，難道我們自己就不出產石油嗎？還有加以考察的必要。

石油在唐代以前，名曰石漆，唐改爲石脂油，五代及宋又改爲猛火油，或石蠟油，石油之名起於宋代，算起來我國用石油已有二千餘年的歷史了。不過用途有限，最初是土人取來供塗料及燃燈之用，後來宮殿內也有用石油瀝青防腐的，直到現代，才漸受重視。惟我國石油蘊藏量究有多少，並無確切的調查，一九二〇年美國地質調查所發表爲一、三七五兆桶，加上油頁岩油量共計三、二七四兆桶；一九四六年有人估計爲七二七、〇〇〇(千公噸)內包括頁岩油五二一、〇〇〇(千公噸)。實際上還得詳細的勘測。

中國石油產區的幅度是相當遼闊的，東北、華北、西北、西南、華南都有礦藏的發現，而產油希望最大的地區，是自新疆北部沿天山南北麓，東行至甘肅玉門，敦煌，復自甘東部行入陝西北部，更越秦嶺而入四川。茲分誌其各產區的概況，以見一斑。

(一)陝西：東自延川、延長、宜川、西至安塞、延安、甘泉、鄜縣，幾佔陝北大半，已知油苗共三十五處。現有延長官礦，粗具規模。

(二)甘肅：玉門東南赤金堡油藏甚豐，祁連山北亦有油苗，土人就油泉採取，年產兩萬斤。

(三)四川：盆地中富順自流井一帶，採油是採鹽的副產品，每月不過百斤，油田遠遜於新疆陝甘。

榮經濟，不免減少當前的收入。現行工商業稅的稅率，在根本上既是相當之低，而且在所得計稅的部份有減征，在營業計稅的部份有分級，豈不照顧得太多，影響保障供給的原則？

須知稅收的多寡，不在稅率的高低，而要看：稅務幹部是否健全，稽征方法是否合理有效，納庫期限是否及時掌握，與納稅人是否確切認識人民立場，帮着政府完成應有的責任。關於稅務幹部是否健全的問題，這是稅務機關的責任，要能作到忠誠、樸實、廉潔、勤能的理想，使人民所納的稅，除了必需很少的征稅費用而外，確能收入國庫，關於稽征方法與納庫期限，也是稅務機關的責任，要能掌握重點，大處着手，鑽研方法，作到及時繳庫。至於納稅人方面所應盡的責任，則應認清：今天人民時代的稅收，完全為人民辦事，和過去舊時代剝削大衆，便利寡頭的對立形態，有着本質的不同。工商業者，有認識，有能力，更應認清此點，把握此點，一洗過去隱瞞逃漏的壞風氣！無論是辦稅人或納稅人，都要「老老實實」地，該課的課，該拿的拿，以完成「人民勝利」的最高使命，樹立「人民稅政」的健全軌範。

——一九五〇年四月九日於北京——

中蘇經濟合作與石油開發

王乃昌

一、中蘇經濟合作的新頁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簽訂關於創辦石油、有色金屬及民用航空公司的協定，已獲得全中國廣大人民的熱烈歡迎。無疑的，是引導中國工業化的一個重要起點，在我們面前展開一幅美麗的遠景。我們堅決相信在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再加蘇聯援助這一有利條件，必將使中國迅速成為强盛的國家。

如所週知，新中國的建設，是以重工業為重點的，人民政協共同綱領第三十五條上說：「關於工業，應以有計劃、有步驟地恢復和發展重工業為重點」。然而中國工業的落後，加以戰爭和災荒的影響，國家元氣損傷，即以恢復新區原有工業生產水平，已非易事，如再談開發經濟落後，交通不便，工業基礎薄弱的新疆，沒有國際友人技術和設備的援助與經濟方面的合作，是不可能的。

而且這種援助與合作，祇有向蘇聯方面去找，也祇有蘇聯才能夠給予我們。請看此次經濟協定的內容吧：第一「按平權合股原則組織成」，就是說權利與義務都是平等的，我方供給地段、工廠房屋及其他建築物的建築材料等項，蘇聯負責股金、各種機械裝備、工業器材、探測器材等項，當然於我們太方便了；第二「公司之產品（指石油與有色金屬）由中蘇雙方平分之，公司之開支及其所得利潤同樣亦由雙方平分之」，就是說股本平等，產品平分，利潤分享，這是完全合理的，我們不能無代價的獨享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第三「公司之領導，由雙方之代表以輪換制之程序進行之」，就是說雙方管理用人權平等。這些特點，是和過去中國同帝國主義的「合營事業」在本質上完全不同的，如與英帝合營的開灤煤礦，與日帝合營的漢冶萍公司，結果全落入英日帝國主義者之手，這種例子舉不勝舉。

最顯明的事實，是蘇聯自一九四五年起，先後與波蘭、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等人民民主國家，分別進行簽訂的各種經濟協定，條件不僅平等，而且更有利於人民民主國家，蘇聯根據這些協定，以大量的機器、工業設備和貴重原料來帮助他們迅速建立起工業化，打下自力更生的基礎。蘇聯技術專家以高度的情誼來為他們工作，帶來的社會主義建設和企業管理的先進經驗，對於各人民民主國家的經濟建設，是極其寶貴的。以羅馬尼亞為例，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則聯合組成的「蘇羅石油公司」，開辦之後，油產逐月上昇，六個月內即達油產目標的百分之一二三・二。

中蘇合股創辦的三個公司，是中蘇經濟合作的良好開始，這種合作，是完全正確的，必要的，符合中國人民利益與願望的。我們歡迎它，我們感謝蘇聯國際主義的眞誠友愛，堅決保證這一任務的澈底完成。根據這個觀點，來研究中蘇三經濟協定中的石油開發問題，就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二、石油在國家工業化中的重要性

為了具體說明中蘇創辦石油公司的重要性，對於石油的性質、種類、用途、以及在重工業和國防工業方面的作用等，不得不有個概念：

石油，是一種有機物的混合體，以碳化氫為主成分，以氧、硫、氮為副成分，此外還有石臘、土瀝青及油酸等固體碳化氫溶含在內。經過提煉以後的製成品，約計有：（一）汽油，供內燃機作燃料，如飛機、汽車、汽油船、汽油火車等，又供煤汽燈、安全燈、煤油爐等作燃料；用於工業方面，供西法洗濯、乾洗、溶解橡皮、浸出油脂、稀釋油漆、洗滌機器等。（二）煤油，供點燈、洗滌用。（三）輕油，供殺虫用。（四）重油（柴油），供軍艦、輪船、鐵路機車、重油內燃機、冶金爐等作燃料。（五）機器油，有車軸油、汽缸油、輪機油、機械油，供電力、紡績、製鐵、製麵粉等機器之潤滑、防腐防蝕等用。（六）石臘，可製成洋臘、固形臘、洗動石臘。（七）土瀝青和瀝青，用於鋪路、塗屋頂、印油，橡皮等的混合劑。（八）天然氣，用於原動力、點燈、提天然揮發油及造碳黑等。

石油用途的廣泛，是難以枚舉的，單是我們日常生活所用的就有二百五十餘種，而以石油作原動力的工業，至少在百種以上。想不到六十年前還是一種無足輕重的礦產品，現在已一躍而為最重要的原料之一，試以第一次大戰時的石油產量為例，就可看出其逐年增加的情形：

第一次大戰時全世界石油產量（單位百萬桶）

年份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五年	一九一六年	一九一七年
產量	三八五、三	四〇七、五	四三二、〇	四五七、五	五〇二、九

單就各種用油交通工具的發達而論，至足驚人，據蘇聯專家桑塔諾夫統計，第一次大戰到第二次大戰間增加的情況是：使用汽車數增加二十一倍半，燒油之商用汽船數增加快到十六倍，商用摩托船數增加八十四倍半。而燒油船、摩托船噸數在全部商

中國漁業的發展

鄭文衛

一

舊石器時代，人類除了採集果實和狩獵之外，即以捕捉水產充爲生活資料。當時的生產方法，尙未發明使用魚網等生產工具，是採取最原始的，竭澤而漁的方法，或者一大羣人，在水中圍繞着摸索而獲取魚類。在不斷的勞動過程中，逐步創造了用纖維質的樹皮和草莖類捻成繩索，編成網罟，如律歷志所載：「作網罟以畋漁，取犧牲。」來網羅魚類了。漁業生產工具經長時期之改進，迄至今日，蘇聯及其他工業發達國家，均已採用最科學之技術和機械化之設備，如廣泛的無線電通訊設備，使用飛機探索魚羣，探檢魚羣的電氣裝置，及捕獲魚類即分別加工的，如活動工廠的遠洋漁船等。迴顧我國之漁業，除少數的使用動力的漁輪，用機械起網卸魚的設備以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漁業生產，尙以近乎原始的生產方法來經營，如沿海較淺地方之由入潛水採捕的裸潛漁業，用餌釣取魚類的手釣漁業，或沿海建築石滬，俗稱「滬堘」，於潮退時，肩荷叉網，在堘內涉水兜捕，以及定置網漁，舢板拖網，較大規模的則是風網、對網、曳網等，這些落後的漁業技術，不但收獲量很低，而且都是以人力來和自然搏鬥，所以常因氣候的突然變化，不僅無法獲取魚類，而且漁民生命也因而犧牲。

技術落後，生產力不發展，這是受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生產關係的束縛，然而，我們國家是具有發展漁業的優越條件：海彊綿長，漁場廣袤，北起安東鴨綠江，南迄廣東防城之北崙河，及台灣省，海南島等，海岸線長達七千餘浬，漁場廣達二十八萬五千餘方浬，雖然一部份漁場地位稍偏南方，但暖寒流交會處，水產非常繁盛，而淡水漁業，也具有可供發展的天然條件，如洞庭湖，鄱陽湖，太湖，洪澤湖，青海，鏡泊湖，及與蘇聯接壤的興凱湖等大小湖泊。以及橫貫大陸之長江、松花江、珠江等大小河流，均盛產魚類。總計全國可供食用的水產約二百餘種，戰前全國產量已達一百二十五萬餘噸（連台灣在內），分佈如下表：

材料來源	省名	海洋漁產 數量(担)	海洋漁產 總值(法幣元)	淡水漁產 數量(担)	淡水漁產 總值(法幣元)
依實業部二十三年七月統計	江蘇	762,256	3,240,955	370,265	2,649,123
同上	浙江	8,044,639	21,215,531	172,974	2,081,879
同上	福建	241,063	2,141,963	22,567	321,443
同上	廣東	95,545	883,206	8,300,108	83,103,816
同上	山東	5,433,950	65,947,558	10,110	108,214
同上	河北	202,297	1,322,709	244,500	2,209,729
同上	安徽			95,505	928,569
同上	江西			579,775	5,625,808
同上	湖北			303,427	2,581,531
同上	新疆			307	4,297
同上	甘肅			6,283	81,893
同上	陝西			631	32,120
同上	山西			10,848	2,266
同上	河南			238,908	4,912,215
同上	綏遠			765	23,911
英文中國年鑑	遼寧		14,633,066		
同上	吉林				241,471
同上	黑龍江				296,875
湖南實業誌	湖南				3,027,000

材料來源	省名	漁撈產量 數量(公担)	漁撈產量 總值	養殖產量 數量(公担)	養殖產量 總值
台灣銀行季刊	台灣	90,900		14,910	

說明：
一、上表所列廣東省漁產數量及總值，恐均失實。
二、上表所列山西省漁產總值，恐係計算錯誤。
三、上表所列遼寧省海洋漁產總值，包括淡水漁產在內。
四、青海、四川、貴州、西康、廣西、雲南等省，尙無統計數字可據。

我國具有如此得天獨厚的物質條件，其產量雖佔戰前全世界總產量的十分之一，但僅及戰前日本產量的三分之一，這表明了，豐富的漁業資源是未能充份利用。同時，每年外國水產品之鉅額輸入，益破壞了我國漁業的生產，抗戰前後數年之輸出入，據海關統計年刊的統

（四）新疆：礦藏爲全國之冠，以烏蘇蝎子山產量最豐，已用新法開採，他如庫車、塔城、綏來、迪化、溫宿也有出產，則未大量開發。

（五）撫順：古城子與柏楊堡間之石油，大體覆於煤層之上，多爲油頁岩油，一九三〇年日人已用機械大量開採。

（六）其他：熱河、山西、河北、山東、廣東、廣西、貴州、西康、浙江、亦有石油蘊藏，多爲油頁岩，而非尋常之油田。

中國石油產量一覽表（單位桶）

產地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延長	一、〇九四	五五二	三五二	三〇五	二八八
甘肅	一四〇	一〇〇	一〇〇		
四川	一七七	一四四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新疆	三〇〇	三〇〇	三〇〇		
鞍山	二二、〇三四	二五、〇〇〇	二三、〇〇〇		
撫順	三三四、七〇二	四二七、五六七	四九四、四一八	六〇九、五三二	六五〇、〇〇〇
本溪	二、八七六	三、二〇〇	二、五四〇	四、九九九	四、八六八
井陘	二、八一四	一、一三六	一、五〇〇	二、四八二	一、九二五
總計	三六四、一三七	四五九、六三二	五一七、九五八	六三六、七〇三	六五四、八六八

上表所列也是不完備的，不過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我國年產石油六十餘萬桶，撫順一處即佔全國產量的百分之九十五，而撫順當時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大都運往日本去了。

五、豐富的新疆石油蘊藏量

中蘇合辦的石油公司，是在新疆省內進行勘測、開採、和提煉的工作，那末關於新疆的石油資源，還得說明一下：

新疆的石油礦藏，中外馳名，石油脈之多，爲其他各省所不及，據一般估計其蘊藏量約有一億六千萬公噸以上，佔全國總蘊藏量的百分之六十。產油區多在塔里木河之北，天山北麓一帶，油泉濆發或流出的有四五十處，油沫浮積厚達二三分，惜多爲土法開採，產量甚微。光緒年間，地方官吏曾以銀十萬兩向帝俄購買採掘機器，旋因人事調動作罷。一九二一年我國與英訂約，給予優先權利，亦未成爲事實。一九二四年美國辛克來耶公司又派技師到新視察，也思染指。日本石油公司不肯後人，也派員調查了一番。

新疆各產油區的情況，有如下述：

（一）烏蘇，獨子山產油最豐，一九一九年開辦獨山油礦，於橫洞子內挖成若干直井，深七尺，深七尺至一丈，全區有橫洞子二，長五丈餘。直井十個分佈橫洞之間。一九三五年得蘇聯協助開鑿，一九三八年開工，到一九四二年每日已產油六七十噸，一九四三年停頓。境內還有四蘇木、將軍溝、安集海河、大石灘均有油礦。

（二）迪化：西境四十里的四岔溝（小名石油泉）曾開東三井，西四井，現東西各存二井，餘皆爲沙土掩沒，油沫浮積不厚，每日採油十餘斤。又蘇達車有油泉五處，夏季每日得油十二三斤。

（三）綏來：境內有油區三處：一爲金河溝之犬子灣，有油井四處，每日取油二三十斤；一爲紅溝之石油岩，油井七處，每日取油四五十斤；一爲鹹水之銅鼓台，有油井九處，最大者每日取油二百餘斤。

（四）庫車：銅廠油井三十餘處，每井每日取油四十公斤，附近又產石腦，溶點甚高。

（五）塔城：東南境青石峽地方曾發現油源甚多，積年沙土迷塞，現存九處，以山頂一泉爲最大，油沫厚四五分，旺時取油二百斤。

（六）莎車：西南境之上窩舖，油質極佳，日產七八十斤。

（七）沙灣：博羅通古，日產油七十斤。

（八）溫宿：塔克拉每日出油百斤左右。

新疆石油成份，據工業試驗所分析，其油量如下：

原油比重	○・八四五
揮發油（百度以下）	一・三〇〇
燈油比重	○・八二〇
燈油（一五〇——三〇〇度）	四三・二
重油（三〇〇度以上）	五五・五
燈油發火點	五〇度

這裡，我們得到一個總結：中國的石油資源，尤其是新疆的石油蘊藏是很豐富的，今天得在蘇聯的援助與合作之下來開發，國家工業化的前途，將更爲樂觀。

（上接第三十二頁）

六

插曲完畢之後，新郎便插花騎馬，吹鼓手打起大皮鼓，吹起淒厲的銅號角，簇擁着新娘正式完娶，但是習俗規定正式圓房後一個月，女的又必須歸寧一月，並且非待生一子後方許還夫家，因此在娘家居住的時期也就是她一生中最浪漫的時期，她熱情奔放，可以同任何男子交往而無人約束。

漢人的習俗多看重長子，而苗胞則看重幼兒，因此財產繼承制度，幼子有優先權，往往小弟良田百担（註六），而大哥僅牛馬數匹而已，這當然是由於長子不一定是直接血統的關係。

苗胞們飲食簡單，因缺鹽，煮菜淡而無味，吃時，只放少許鹽粑摻入紅辣椒末同食，性情一般暴燥易發大怒。富有的苗胞好宴客，客人食量愈大，主人也愈高興，非得將預備下的大肉大菜吃得乾乾淨淨釜底朝天，這宴會才盡歡而散。

秀麗的高原兩個月以後我就離開它了，可是腦海中對誠樸可愛的苗胞却永遠縈繞着深刻的回憶。此時，五星紅旗該已經高高飄揚在古老的山寨上了，苗胞也將從此得到翻身，再不受千百年來腐敗官僚、土豪的壓榨了，我們不能否認關於苗胞的一切太陌生、太隔閡，我們應如何保存他們刻苦耐勞的精神並且進一步友誼地協助增進他們的敎育呢？這是今天我們所應該担負起來的責任。

【註】㊀苗人三日或五日爲市，互相交易，以有易無，恰如北方的趕集。
㊁川滇產鹽大如石塊，便於騾馬馱運專銷苗區，通稱做「鹽粑」。
㊂黑寶即「雅片」。
㊃省城指貴陽。
㊄雲貴多山，雖得有一塊平坦的小型盆地，故凡稍寬廣的平地，西南統稱曰「壩子」。
㊅山地多梯田，無法計其面積，僅以收穫之穀類担數計算之。

在我國擴展其水產企業，另一方面，以飛機軍艦封鎖海面，禁止我漁民出漁，任其本國漁輪縱橫海上，實行其壟斷政策。勝利之後，日本漁輪仍時常在我國領海出現，近在美帝扶植之下，更常侵入我領海偷魚，帝國主義這一貫的侵略破壞，也是我國漁業不能發展的原因之一。

廣大的漁民除了受官僚資本主義反動政權，帝國主義的重重榨取，壓迫和掠奪之外，還得忍受封建勢力的超經濟剝削，被榨取了的貧困的漁民，是每年都要借債的，這就造成了高利貸資本的發展，放高利貸的，有魚行魚商和一些專放高利貸的地主惡霸，漁民如借了魚行魚商的錢，即要受其束縛，出漁所獲魚類，回來必須投入貸主的行中售賣，除了利上滾利，及抽取百分之五至二十的行佣，扣除規費，棧力，駁力，公川費等等苛雜外，更以天平稱司馬稱，會館稱等複雜的度量，來對漁民擺佈剝削。如烟台一個漁民，一年打了萬餘斤魚，等到和魚行算賬時，却只剩了二十五斤是屬於自己的了。欠債結果，往往將自有之房地，漁船漁具賤售於債主，重向債主租船捕魚，其船租更是封建性的，是向例由船主任選一個潮水所獲為船租，而船主都是選了足抵全年產量半數的第七潮水。這種種，使漁民生死搏鬥所得來的勞動果實，都被人剝削去了。並且在漁汛時間，因為魚商的操縱，魚價往往慘跌，使漁民大受損失，同時，工漁產品的不等價，而且差距越來越大，使漁民再無法添置和修補工具，益令漁民生活貧困，生產衰落。在飢寒交迫之下，驅使一些魚民挺而走險，下海為盜，因為匪氛盛熾，重教漁民增加一層痛苦。

……，在這半封建半值民地經濟狀態中，一切對漁民的掠奪和剝削，造成了解放前漁民生產技術的停滯落後和生產的極端貧困，致使單純再生產也難以維持，故具有如此優越條件的我國漁業是一年比一年的衰落和凋蔽了！

三

隨着人民解放戰爭的迅速勝利，大陸上除西藏外已全部解放，綿長的海岸線，除了台灣省、海南、金門、舟山等島以外，也已從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魔掌下解放了，雖然海上殘匪尚以飛機兵艦封鎖我沿海，我國最大漁場之一——舟山，尚由匪寇盤踞，但山東以北至遼東遼西的廣大海洋漁業，各地區的淡水漁業，已在人民政府的多方扶植和建設之下，已迅速恢復，逐步發展。但這些扶助和建設，尚多是斷續式進行和沒有統一計劃的，在二月六日，中央食品工業部在京召開了首屆全國漁業會議，及建立管理全國水產事業的最高組織以後，使中國漁業開始跨入新的階段，成為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中重要的一部門。這艱鉅的建設工作，在全國漁業會議閉幕前，宋裕和副部長總結了各地區從事漁業行政，漁業經營，水產教育等工作代表歷時八天的討論，具體而明確地指出了實施方法和步驟：

一、「要積極地建設國營水產企業，使其在短時期內，由恢復到發展。」

（未完）

黔苗的生活

張頌甲

一

五年前，全國解放戰爭正在風起雲湧的時候，我竟藉着某一個機會到西南山地——貴陽市塵百餘里外的深山苗區中，渡過一段時期靜逸的生活。在起初，剛到達那裡時，很覺得陌生；及至走出寨外更陌生得像在古遠的異域中；四野鄰居們的風俗習慣既不相同，加上服裝的稀奇異樣，還有全難懂得的言語，就因為這一切的一切，眞叫我不敢置信我們是居住在同一國度的西南山地裡！

那裡的風景眞美麗極了，有筆架似的高山，嫩筍樣的岩峯，古老蜿蜒的小徑和荒凉幽靜的四野，另外再添上終年鬱綠着勁的老樹，使時常在濛雨細霧籠罩下變成一幅淡淡濃濃的宋代名畫，也就是這峻峭的峯巒和湍險的溪流，便把這區域隔離得落後三個世紀！

二

苗胞們可大別為兩大種，一種是生苗，另一種是熟苗。

據說，以前生苗永遠散居在高山巔或深山幽谷，吃的是高粱、玉米，從來不見他們的踪跡在「趕塲」（註一）市集中出現，他們好像是與外界斷絕了關係似的，專賴一些能通苗語的單帮、小販背着布疋、「鹽粑」（註二）、鐵器和一些念咒用的黃紙鑽進生苗的村寨，然後以一換十、連偷帶騙地把「黑貨」（註三）運下山來。

生苗們絕跡外出，但也厭惡陌生人侵越他們的境界，他們依舊保持着野蠻、粗魯和嗜殺的性格，常有山中迷路人的屍體被拋在荒僻的路旁，有一次寨裏三個漢人貪走捷徑結果失踪了，另外一個佈道數十年的法國教士也被害死在山中。

會說漢話的熟苗都環山結寨聚族而居，也有少數漢人雜居其間，他們的房屋分成兩層，上層住人，下畜牛馬，因此屋中的薰臭使令人難受作嘔，他們平時與漢人互通耕耘，互換貿易，也有在省城（註四）裏讀書經商的，但有一點即絕少與漢人結婚。

苗胞們除上述二種外，還有很多光怪陸離錯綜複雜的名稱，三百萬苗胞中據貴州省圖書館統計竟有七百多種。

三

談到苗胞的服飾，也是足以令人眼花瞭亂的。他們的服飾男子們穿着與漢人大同小異式樣的短衫、長袍，但特別喜歡黑顏色，苗女們還依舊保持古香古色的歷史服式，不論男女裝飾都是一族具一式樣，甚至隔一山寨就衣裙全異。

我住的地方，名叫高傑的寨中，寨裡除了十五家漢人居住外，其餘皆為苗胞（熟苗），年輕的姑娘們都剃光頭，纏着高高的黑巾，耳朶上穿起大而晶亮的銀環，頸上、手腕、脚踝也都戴着銀圈，走起路來，嗆啷作響，掛得愈多，表示家中愈富有，上身一律是袒胸寬袖描繡花邊的黑色麻衣，下著厚重的百摺黑裙，裹綁腿，麻草鞋。

但翻過山頭的那邊，走進另一山寨，裏面苗胞的裝束和這邊便大大不同了，姑娘們都留髮帶髻，一色素白衣裙、赤脚，頸上、手腕、脚踝也同樣套著幾層銀圈。再越過深谷，也許那寨正逢「趕塲」之期呢，於是塲中便出現了頭戴尖角帽的牛頭苗，打扮得清清爽爽一身青

計數摘錄如下：

進口：

年份	魚介海產品 單位	數量	單位	總值	罐裝及他種裝鮑魚 單位	數量	單位	總值	未列名魚介及海產品 單位	數量	單位	總值
1935			海關金	9,997,501	公斤	417,332	海關金	180,297			海關金	148,939
1936			海關金	7,846,532	公斤	308,689	海關金	127,380			海關金	88,355
1937			海關金	5,822,942	公斤	247,317	海關金	104,470			海關金	72,589
1946	公斤	9,797,400	偽法幣千元	11,679,810	公斤	251,573	偽法幣千元	1,224,256	公斤	358,526	偽法幣千元	850,403
1947	公斤	14,918,099	同上	35,586,940	公斤	33,745	同上	410,601	公斤	131,162	同上	655,952

說明：

一、海關所估進口貨值，均以海關金單位計算，按照全年平均匯價核算，一九三五年每一海關金單位，折合美圓〇・六七六四五，一九三六年折合美圓〇・六七一四九，一九三七年折合美圓〇・六六五五五，一九四六年進口貨值改以偽法幣計算，按照全年平均匯率核算，每偽法幣千元折合美圓〇・四三三五九，一九四七年折合美圓〇・〇八四二八，附錄以供參考。

二、進口以鹹魚，海參為大宗，次之為蝦乾，海帶，魚翅，魷魚，魚肚，鮑魚，干貝等。

三、來源地戰前以日本為首位，次之為香港，星加波等處，鮑魚除從日本輸入外，墨西哥，美國，朝鮮等處輸入也很多，戰後則多自香港輸入，次之為澳門，星加波，美國等處。

出口：

年份	魚介海產品 單位	數量	單位	總值
1936			偽法幣一元	3,179,541
1937			偽法幣一元	2,744,373
1938			偽法幣一元	2,763,043
1946	公担	19,871	偽法幣千元	1,849,798
1947	公担	73,628	偽法幣千元	43,035,058
1948	公担	59,779	偽金圓券	4,556,437

說明：

一、一九三六年偽法幣每元折合美圓〇・二九七一二，一九三七年折合美圓〇・二九三〇五，一九三八年折合美圓〇・二一〇一一，一九四六年每千元折合美圓〇・四三三五九，一九四七年折合美圓〇・〇八四二八，一九四八年偽金圓券每元按全年平均匯率折合美圓〇・一〇一三一。

二、出口以鮮魚（包括冰魚），海蜇等有大宗，運銷地為香港，澳門等地。

除了報關進口的水產品，歷年走私輸入的數量也相當驚人，即以報關輸出入的數量相較。每年漏卮已是非常鉅大，但如將輸入水產品和我國水產品產量合併計算，全國人民之所可平均享受者，數量仍極微少。如每人每日食魚一市兩，四億七千五百萬人全年即需要五百四十餘萬噸。解放後，生產關係改變了，生產力是有了長足發展的餘地，這，除了發展近海漁業外，更要擴展遠洋漁業，獎勵鹹淡水的養殖事業來補充，這不僅是提高了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且使部份勞動力，獲得勞動生產機會，於沿海人口稠密之區，尤有此必要。所以水產事業之發展，在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中，是具有重大的作用和特殊意義的。

二

中國的漁政，始於周代，周設獻人乙官，掌握政令並掌向漁民一歲三時取漁的任務，所以其設官的作用，無非是封建王朝榨取漁民之工具而已。秦時，瀕海措施注重於鹽而略於漁。至漢武帝時，漁業曾經官辦，食貨志：「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給民，魚乃出。」得不償失，沒奈何改為抽稅。唐代曾就廣東漁戶，計丁徵粮。五代至宋「峻法以剝下，厚歛以奉上。」於漁民自無例外，除承襲唐代計丁徵粮的榨取辦法以外，漁民運魚入市，須納值百抽二之過稅，沿途稅卡林立，過卡又須付巡丁事例錢，出賣又要付免行錢等等剝削。到明朝中葉，倭寇時常侵擾海疆，由於沿海衛所空虛，於是編組漁戶，有事時，糾合漁夫民丁防守，乃是徵歛重稅及種種剝削之後，再迫使漁民服力役，於是很多漁民不堪壓迫，間有附寇，或入海為盜。清代瀕海各省也編設漁團，同是用以斂賦征役的，幸亥革命之後，軍閥政府於漁業設施之改造，絕無措意，但於徵稅一道，却匠心獨運，漁稅是以魚介價格的貴賤來定稅率，平均在百分之六左右，此外尚有捕魚船捐，也係分別等第徵收。各省更苛雜繁多，除了漁稅，如黑龍江省復有漁網稅。江西省有魚苗稅，魚油稅。福建者有河溝（蓄魚池）稅。廣東省除漁稅，魚苗稅，魚油稅外，更有魚滷稅，鹽魚稅。國民黨反動政府定都南京後，即將漁稅改為漁業稅，並分沿海漁業稅及內河漁業稅兩種，內河漁業稅歸縣公署徵收，或由釐金局代徵。至沿海漁業稅，則是將舊有鮮魚類之釐金，省稅，統捐，雜捐等由江浙兩省省政府中劃出，改由江浙漁業事務局徵收漁業稅一種。漁業稅是以鮮魚及鮮水產滿一百斤為起徵點，稅率初定百分之三，繼改為百分之二、五。魚價則憑估計，旺月每担估為六圓，淡月每担增至八圓。後擬擴大剝削，添辦蘇魯區，閩粵區，遼寧區漁業稅，終因冗員衆多，加以貪污中飽，以致入不敷出，故於一九二一年春下令停辦。雖然漁業稅停徵了，地方性的苛捐雜稅則仍多如過江之鯽，據李士豪氏之統計，台山縣屬之廣海南灣一處，漁民所要負担的捐稅有二十七種，陽江縣之閘坡一處，漁民所要負担的地方費雜捐有十六種，其中直接由漁民負担的佔了五種。

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國民黨反動政府刼收了敵偽水產事業之捕魚船，拖船，修船塲，冷藏廠組成中華、黃海，海南三水產公司，以及攫取善後救濟總署的漁業物資，成立漁業物資管理處等二大官僚資本系統，混亂腐敗，貪污自肥，並進行密捕濫捕的掠奪摧殘。這種種是使全中國漁業長期落後和凋蔽的主要因素。

從一九一一年以後，日本帝國主義者即開始在我領海侵漁，不但以其具有新式捕魚設備之漁輪在我領海捕魚，而且即以其所捕得之魚，冒充我國漁船或武裝走私入口，廉價傾銷。並且橫行海上，時常擊沉我漁船，衝破我漁民所下之漁網，雖經漁業團體之請求偽國民政府設法制止，但依附帝國主義的國民黨反動政府，是不敢也不可能做到的。一九三一年偽實業部提議禁止侵漁辦法，如令日本漁船限期退出國境，非正式外國商船運來之鹽鮮魚類，一概禁止報國起岸。徒托空言，終未實行。抗日戰爭時期，沿海各地淪陷後，日寇即有計劃的破壞我漁業設備，燒燬我漁船，殘殺我漁民，並輸入資本，攫取我國富饒的水產資源，及就我國低廉的勞動力，